

百岁黄埔老人

- 54 万里赴戎机 淡定度晚年
—— 黄埔抗战老兵王金生忆往事 / 顾少俊

黄埔人生

- 58 张光荣所经历的滕县保卫战 / 赵凤玲

我的黄埔前辈

- 61 父亲和母亲的情感之路 / 边宏

黄埔后代

- 64 晃耀后人 一生光明
—— 追忆我的慈父陈晃明 / 陈正烈

历史

黄埔往事

- 66 鲜为人知的宝鸡抗战荣誉军人教养院 / 蒲元 王翀
70 黄埔军校初创最困难时,张难先做了什么 / 张铭玉

黄埔研究

- 72 关于熊雄与黄埔军校研究的几个问题 / 曾庆榴

黄埔收藏

- 77 浅谈黄埔军校骑兵教育沿革(上)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 84 1926年5月11日,黄埔军校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血花剧社紧要启事》,宣布对血花剧社改组 / 贾晓明

文化黄埔

- 88 孙中山书法艺术探析 / 李务起

黄埔连载

- 92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十三) / 熊子杰



双月刊单月1日出版
2023年第3期总第210期



2 烽烟迭起战长江之畔 气壮山河守鄂西要塞 —— 纪念鄂西会战 80 周年



39 抗战时期的郑洞国将军



44 郑洞国将军鏖战台儿庄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日军向太平洋战场输送兵员和军需品所需要的船舶总量迅速增加，由此分配给中国战场的船舶减少；加之淞沪抗战以来，因中国军队及其潜艇的不断打击，日军原有的船舶损失严重，如此，日军的船舶运输能力日趋不足。1943年5月，为了获取自宜昌至赤壁间长江及其附近河湖的中国船只，打通宜昌至汉口的长江航线，并抢夺洞庭湖畔的粮食和继续威胁陪都门户，日军在宜昌区域内发动了鄂西会战。

鄂西会战从1943年5月4日战斗正式打响到6月18日战斗结束，历时一个多月。会战从洞庭湖以北的南县、安乡开始，然后在长江南岸与澄水之间，向西至公安、松滋、暖水街、渔洋关、枝江、长阳、都镇湾，直至宜昌上游的平善坝、石牌沿江一带，绵亘千里。中国军队在人员装备、防御设施劣于日方的情况下，仍英勇作战，各主要阵地多次易手，最终以14个军的兵力，抗击了日军6个师团和一个旅团的进攻，收复了失守的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参加鄂西会战的中国主要参战部队江防军、第1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中，担任师级以上职务的黄埔师生就有47名。他们以大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志气，在战场上舍身流血，谱写了一曲“爱国、革命”的黄埔赞歌。

以史实为镜鉴，揭露侵略之罪恶；传颂英烈之功勋，弘扬黄埔之精神。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2023年是鄂西会战爆发80周年，值此之际，让我们重温那段难忘的抗战历史，铭记那些为抗战胜利而付出鲜血的黄埔师生，汲取勇毅向前的黄埔力量，勇担时代责任，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烽烟迭起战长江之畔
气壮山河守鄂西要塞

——纪念鄂西会战80周年

鄂西会战综述

□ 马兴达 徐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船舶损失严重，用以运输兵员、军需品、物资原料的船舶严重不足。在中国战场上，内河航运船舶也越来越少，且宜昌到岳阳段长江为中国军队控制，日军在攻占宜昌后掠夺的大量船舶并不能使用。1943年5月，为了达到“争取中国内河船舶”“以供军事运输，藉补目下船舶吨位之不足”并“消灭扬子江右岸第六战区野战军”的目的，日军发动了鄂西会战（日方称之为“江南歼灭战”）。

一、会战双方情况

（一）日军方面

1943年4月间，日军第11军制订作战计划。主要作战目的是为了加强扬子江运输能力、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扬子江右岸地区）的中国军队，使在宜昌附近的船舶向汉口通航。此次作战，日军参战的主要兵力由第11军第3、第13、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野沟支队（由第58师团调出），野地支队（第39步兵旅团），小柴支队（由第40师团调出），户田支队（由第40师团调出），针谷支队（由第34师团调出）和军直辖



/ 鄂西会战中，中国军队伺机杀敌。

部队组成，另有飞行第44战队配合作战。

计划作战步骤如下：

第一期，以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小柴、户田、针谷支队，于5月5日至11日进

攻安乡、南县地区。

第二期，以第3、第13师团和野沟支队，于5月12日至18日南北夹击枝江、公安地区。

第三期，以第3、第13师团，第39师团主力和野地支队，

于5月19日至29日进攻宜昌西方地区。

第四期，于5月31日至6月10日，以一部分兵力留在扬子江右岸地区，第11军主力撤退至扬子江左岸地区。在此期间，船舶部队协同海军开放扬子江，首先使在宜昌的约2万吨船舶向沙市下航，继而向汉口下航。

日军将作战区域大致分为三部分，在三个有限的空间逐次展开，分别对南县、安乡，公安、枝江和宜昌以西等地区实施攻击，企图采用蚕食方式，分区集中优势兵力逐次消灭中国军队。

（二）中国第六战区方面

鄂西属于第六战区的防御范围，当时，第六战区的主要任务是屏蔽川东，保卫重庆。战区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战区以巩固陪都之目的，应确保常德、恩施、巴东、兴山、歇马河（兴山东北约65公里）、南漳各要点，置兵力重点于江南各地。”

1943年5月初，日军按照作战计划，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以及户田支队、小柴支队，先后集结于石首、藕池口、华容，针谷支队集结于城陵矶，兵力达1万余人，摆出一副向我第六战区江南部队进攻的架势。

第六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孙连仲及高参们判断日军定有西犯企

图，立即制定了作战指导方案，即：以王缙绪第29集团军固守安乡亘公安之线，以王敬久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亘枝江之线，以吴奇伟江防军固守宜都亘石牌之间之阵地，以周岩第26集团军之75军和冯治安第33集团军之77军、29军固守三游洞亘转斗湾之间阵地，并令各部队以坚强之抵抗予敌以不断消耗，然后转移攻势，压迫敌人于长江西岸而聚歼之。

鄂西会战中，第六战区参战的部队包括第29、第10、第26、第33集团军，连同上游的江防军及其他警备部队等，共14个军41个师的兵力。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恩施，孙连仲为代理长官（5月17日由司令长官陈诚接替指挥）。

二、会战经过

（一）安乡、南县地区

4月16日开始至5月4日，日军按照作战计划，集中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7旅团和户田、小柴、针谷支队于石首附近的扬子江两岸、华容及其与石首之间地区和岳阳东北。

5月4日下午，日军从藕池口、华容、白螺矶向洞庭湖北岸进攻，鄂西会战的序幕就此拉开。对此，《中央日报》以《洞庭湖北岸激战复起》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华容、石首、藕池口、弥陀寺等处之敌，近由岳阳、沙市增援甚众，于四日午，以数小股，由华容、藕池口分向风口（华容南）、高何场（藕池口西）进犯，经我军迎击，战斗至晚，均予击退。五日拂晓，敌约七八千，在其飞机二十余架轮番轰炸助战下，分路向我侵犯，我军奋勇阻击，战斗激烈。迄六日，我与敌在梅田湖、茅草街、米积台之线附近续战。

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5、6两日激战，日军陈尸遍野，第17旅团步兵第90大队大队长舛尾芳治中佐被击毙，第40师团第234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安村修三少佐重伤。而中国守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第15师伤亡达四分之三；第77师亦死伤逾半；第15师第45团团团长陈涉藩、营长李亚安在反击战斗中英勇牺牲，安乡、南县已处于被半包围的险境。

为了先行击灭从藕池口方面企图深入的敌人，第六战区代长官孙连仲按照预定计划，电令第29、第10集团军坚守和组织反击，同时电令江防军抽出第86军的第67师及第18军两个团策应第10、第29集团军的作战。但就在6日21时，接蒋介石指



中国军队在安乡、南县战斗。

令：

1. 查三峡要塞扼四川门户，为国军作战之枢轴，无论战况如何变化，应以充分兵力坚固守备。
2. 江防军不得向宜都下游使用。
3. 南县、津市、公安、松滋方面，应以现有兵力与敌周旋，并掩护产米区。
4. 特须注意保持重点于左翼松滋、宜都方面，以获得机动之自由。

孙连仲只得速告江防军，收回前令。

由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第六战区沿江防线的右翼，而第六战区又不能抽调沿江防线左翼部队策应，因而在伤亡过重的情况下无力遏制日军的攻势。混战至 7 日晚，日军攻占安乡，9 日

占领了南县。

(二)枝江、公安地区

日军攻陷安乡、南县后，留下部分兵力驻守，并作出向澧县、常德方面进攻的态势，其主力却悄然向公安继而松滋方面转移，准备开始第二期作战，企图捕捉、围歼枝江、公安间的第 10 集团军。

此时，中国守军置于公安、枝江一线的兵力有 6 个师，即第 87 军 43 师、第 118 师、新编第 23 师余部，第 94 军第 55 师、第 121 师和暂编第 35 师。

5 月 9 日，日军第 11 军下达了第二期作战命令，规定 12 日开始行动。12 日晨，日军第 3 师团首先由东港向白洋堤、汪家嘴阵地进攻，并在炮火掩护下强渡长江，在枝江镇、石牌之间与

中国守军展开激战。当夜 20 时，日军在飞机支援下突破白洋堤阵地，并乘势向西急进。与此同时，日军野沟支队从董市西南强渡至长江南岸，攻占了洋溪。日军三路并进，来势凶猛，中国守军虽奋力阻击，但未能成功。

15 日，日军第 13 师团左纵队进入西斋，右纵队进入刘家场附近，几路合围公安。中日双方军队在大堰垱、刘家场、茶园寺亘枝江西侧之线鏖战竟日。守军第 87 军由于四面受敌，陷于孤立，于是放弃公安，逐次向西面转移。防守刘家场至长阳右岸的第 94 军第 55 师、第 121 师和暂编第 35 师与敌激战终日，由于受到日军第 13 师团和东线部队的包抄，处境十分险恶，也逐次撤向五峰渔洋关至长阳资丘一线。

5 月 16 日，日军第 3 师团主力转向松滋，并于 18 日拂晓占领松滋。

(三)清江、石牌地区

日军重创第 10 集团军、完成第二期作战后，即向北转移兵力，企图再次从南北两个方向以钳形攻势捕歼第六战区江防军主力于石牌、清江之间，最后打开宜昌通向下游的长江水路，使其缴获而滞留在宜昌的机动船只得以下航。

1. 渔关拉锯战

渔关，又称渔洋关，上控

鄂西，下通荆宜，北经长阳达石牌，是进山的重要关隘，更兼渔洋河水路入清江直达长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94军军长牟庭芳派第121师在此把守。日军攻陷公安、松滋后，其第13师团全部于5月17日分别向暖水街、刘家场集结，意在西取五峰渔洋关，然后北进，配合第3师团等敌从侧后背攻击我江防军，夺取拱卫重庆的重要门户石牌。

5月17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返回恩施长官部，开始指挥作战。

21日晨，日军第3、第13师团经界碑、城墙口向渔洋关推进。当日午夜，日军先头部队约2000人窜抵渔洋关东北两公里处，中国守军发现后当即予以阻击。然而，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到达。第二天，一场争夺战在渔洋关附近展开。迄22日晚，日军第3师团渡过渔洋河，占领了聂家河、磨市；第13师团进至渔洋河南岸，占领了渔洋关。

要冲渔洋关失守，陈诚为之焦虑万分。他意识到渔洋关之失，恩施门户洞开，石牌也将受到威胁。陈诚当即决定抽调部队赶往建始、野三关布防，以防不测。

5月28日，渔洋关战事重开。随着会战的进展，王敬久第10集团军全部向渔洋关、天柱



中国军队行进在渔洋河河畔。

山方面侧击尾击日军。该集团军87军新编第23师奉命攻克渔洋关。

当时，新编第23师采取“引蛇出洞，三面包围，放弃一面，伏击逃敌”的战术，对日军展开攻势。该师以第68团任主攻，第69团打伏击，并将该团置于渔洋关外6里之有利地形处。5月26日，第68团以第2营为先锋，从驻地出发，为避开白昼日军飞机的侦察，他们星夜行军，28日黎明前到达渔洋关附近，迅即占领山头。

营长姚行中经过一番观察，发现日军并无防守工事，而是困

踞于街内。该营决定立即对敌展开进攻，他们先用重火力居高临下向敌炮击，大约10分钟光景，步兵便发起进攻。尚未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的日军，听到中国军队猛烈的枪炮声，一时惊恐万状，仅与第2营对战约1小时，便仓惶逃命。营长即将战况报告团、师部，师部旋命第69团做好伏击准备。

当溃退的日军逃至伏击圈时，即被团团围住，双方军队在此弹丸之地激战竟日。28日晚，第10集团军收复渔洋关，截断了日军第13师团的后方联络路线。



/ 石牌的中国炮兵阵地。



/ 中国军队开进石牌。

2. 石牌保卫战

古镇石牌在宜昌县境内，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右岸，依山傍水。石牌方圆 70 里：上有三斗坪（当时的军事重镇），第六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等均设于此；下有平善坝，与之相距仅咫尺之遥，是石牌的前哨，亦为中国军队河西的补给枢纽。石牌下距宜昌城仅 30 余里，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

卫陪都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石牌要塞的安危极为关注，他不止一次地给第六战区陈诚、江防军吴奇伟发来电报，强调确保石牌要塞，并指定石牌要塞让一师死守。5月26日，蒋介石从重庆再次传来手令，指出石牌乃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江防军胡璉等

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第11师师长胡璉当即立下遗嘱，决心与石牌共存亡。

为坚决保卫石牌要塞，5月27日，江防军调整部署，决定以长阳、宜昌两县间之稻草坪、高家堰、余家坝、曹家畈、石牌之线为决战线。至此，鄂西会战进入决战阶段。陈诚命第10集团军第94军主力转移到长阳资丘附近，掩护江防军右翼。同时调动空军战机协同地面陆军作战，并对日军后方实施轰炸，切断敌之增援和补给。

5月28日，日军第3、第39师团开始向石牌推进，在高家堰、南林坡、牛场坡和天台观展开战斗。在南林坡战斗中，中国军队第11师31团3营官兵奋勇抵抗，战至黄昏时分，敌军接连发起5次冲锋。右翼9连、左翼8连阵地相继被突破，连长阵亡。然而，配有重机枪排和迫击炮排的中国守军第7连阵地始终坚固，战士以猛烈的炮火向敌射击，至敌陈尸数百。29日，日军对南林坡正面阵地屡攻不下，于上午9时出动飞机和数门直射钢炮，对7连阵地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树木被扫光，山堡被炸平，7连2排排长阵亡，迫击炮炮手全部牺牲，重机枪排伤亡惨重，技术兵所剩无几。日军有了飞机和重炮的支

援，更加疯狂地向第7连阵地攻击，导致7连的掩体和工事破坏殆尽，但该连余部仍顽强坚持战斗。最后，第7连奉命撤离南林坡时，全连官兵仅剩下四分之一。

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播发的消息说：“……石牌全线之战斗已至激烈，每一据点均必拼死争夺……”这是当时战况的真实反映。在石牌激战期间，日军曾一度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第11师师长胡璉当即令其部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半步，他在电话里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让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凭着这股精神，中国军队坚守着石牌要塞。

3. 宜都追歼战

5月31日，日军伤亡惨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

第六战区发现日军有撤退的迹象，于31日下达了追击命令：

令江防军（附第三十军）就现态势向当面日军追击；令第十集团军（附第七十九军）以主力沿渔洋河两岸，以一部沿清江北岸向枝江、红花套方向追击；令第七十四军驱逐王家厂、暖水街一带日军，续向公安、磨盘洲挺进；同时令第二十六、第三十三集团军向当面日军攻击，以策应江



/ 鄂西会战中败逃的日军。

南地区的追击战斗。

6月1日拂晓，第六战区各部队遵照命令，先后发动全面追击。

6月2日，第10集团军新23、第55、第98和第121师包围日军第13师团第104联队的第2大队于磨市，击毙日军第2大队大队长皆塚义昌；第79军主力及第118师、第51师包围日军第13师团第65联队（樱井部队）及第39师团的第233联队（吉武部队）于宜都。

日军第11军得悉其第13师团等被困后，6月3日，日军第13师团停止撤退，以全力反击追击的中国军队，同时令独立混成第17旅团立即从公安出发攻击枝江附近的中国军队。5、6日，独立混成第17旅团在进至磨盘洲西南约10公里的裴李桥附近时，与第74军遭遇，战斗激烈，第74军重创该旅团，先

后击毙其独立步兵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

6月10日，长江南岸的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渡江，全部撤退到北岸。8日，中国军队克复宜都，9日收复枝江城，11日收复松滋城。迄6月18日，第六战区部队收复了所有曾一度被日军侵占的地方，双方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鄂西会战结束。

（四）会战中的空中战斗

5月下旬，战斗日趋白热化，日军猛烈进犯宜昌地区长江南岸的都镇湾、津洋口、渔洋关等地。为有效地打击西犯日军并积极争夺制空权，中国空军及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各型飞机共计165架参与了作战。

5月22日，中国战机炸毁宜昌日军机场，“向宜昌敌高级司令部及军事仓库，以及宜昌城郊敌重要工事俯冲投以巨弹”并

“从容凯旋，安返基地”。5月27日，在江防军固守石牌之时，中国战机轰炸宜昌长阳偏岩、聂家河，并成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新华日报》在5月28日以《宜昌西岸敌攻势顿挫，长阳敌西犯未逞，我空军轰炸长阳敌司令部》为标题报道：“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十分，我中型轰炸大编队群，由强大之战斗编队掩护，冒恶劣天气，对长阳方面敌高级司令部及车马等投下如雨之爆炸弹，均命中目标，我机未遇任何抵抗全部安返基地。”5月29日，《新华日报》又以《我大编队机群轰炸宜昌，渔洋关西北激战》为标题报道：“二十七日在其多架飞机掩护下，分路猛扑，我遂与敌展开极壮烈之战斗，尤以馒头咀、笔尖峰等地争夺达四五次之多，结果仍为我掌握。”

5月30日，中国和美国空军攻击宜昌以东的土门垭日军机场，炸毁日机一架。美国第14航空队轰炸岳阳至宜昌间日军阵地，击沉江面日军军舰1艘，汽艇2只。对此，6月4日，《新华日报》在《我大队空军出动，扫荡败逃敌寇，毙敌一千五百余，美机两日内十次出击》一文中报道：“盟机大编队群三十日午后向宜昌岳阳间长约三百公里之敌阵作广泛勇猛之袭击，又收惊人战果，在宜昌方面，发现敌方舰艇

下移，另有敌机一架停于宜昌机场待发，盟机轮流俯冲扫射，当击沉敌方军舰一艘、汽艇二只，地面敌机亦中弹起火。在蒲圻以北，发现载运敌军火车三列，盟机投以巨弹，将敌兵与列车炸成粉碎，又在岳阳湖面发现敌艇游动，盟机复以枪弹与炸弹，更番自其上空下注，至少有敌艇十只受伤沉没，盟机在敌阵活跃近两小时，未遇敌机起飞抵抗，全部安然返防。”

5月31日，日军伤亡惨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在此阶段，空军不仅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甚至在空中与日机短兵相接，并成功击落日军飞机。这场空中的“肉搏战”，让世界人民对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有了新的认识。过去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的中国空军，终于在这一役扬眉吐气，抗日战场上的制空权开始易手。6月1日，《新华日报》刊发了《鄂西我全线大捷，长阳西南我展开大歼灭战，宜昌空战毁敌机二十余架》文章，文中说道：“今（卅一）日下午我驱逐机掩护盟国重轰炸机大编队群联合轰炸宜昌敌机场，投下巨弹十余吨，将敌机场跑道及场内敌机多架彻底炸毁，返航时敌战斗机数十架前来挑战，我神鹰立予以痛快之攻击，战斗约十五分钟，确实被我战斗机击落者三架，可能击落者三架，

被盟国轰炸队确实击落者二十架，可能击落者五架，我机均安返基地。”

6月2日，中国空军轰炸日军宜昌江面及宜都红花套，“发现败逃之敌主力部队用小火轮拖着木船约百余艘，狼狈渡河逃命，我机当以机关枪扫射，将敌小火轮及木船大部击沉，余亦起火焚烧”。在6月6日的追击战斗中，中国空军与日军发生激烈交战。当日的《新华日报》以《江南北继续进展，我军攻克公安城，我陆空配合猛攻宜都顽敌》为标题报道了战况：“我大队神鹰，今午由某某基地出发，直趋宜都，对据城顽抗敌军予以猛烈轰炸，一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敌方军事仓库及其坚固阵地，炸毁无算，城内外死伤甚多，我神鹰于任务达成后，复在沿江一带对窜退中之残敌以最猛烈之扫荡，毙敌尤众。”在鄂西会战中，中国空军由过去的被动挨打转变成了主动轰炸打击和驱逐敌军，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第六战区抗击了日军6个师团和1个旅团的进攻，并按照预定计划，先凭借长江、山地等有利地形和依托坚固的既设工事阵地实施守势作战，尔后转取攻势作战，追击撤退的日军，恢复了所失阵地。■

参加鄂西会战中国军队师级以上黄埔师生名录

(不完全统计)

□ 张小源

据不完全统计，鄂西会战主要参战部队：江防军、第1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33集团军中，担任师级以上职务的军官有47名是来自黄埔军校的师生。他们以大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志气，在战场上舍身流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而谱写了一曲黄埔赞歌。

第六战区

陈诚，黄埔军校上尉教育

副官。字辞修，号石叟，浙江青田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1924年到黄埔军校，任上尉教育副官、炮科特别官佐，第2期炮兵科区队长，第3、4期炮兵队长。历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等职。鄂西会战时，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江防军

李及兰，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字治方，号自芳，广东阳山人。1936年，任第49师师长。1938年，任第55师师长。1940年，任第94军军长。曾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鄂西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六战区长江上游江防军副总司令。

方日英，黄埔军校第1期步科毕业。广东中山人。毕业

(2) 鄂西會戰中國軍隊戰鬥序列 (1943年5月—6月)

第六戰區		司令長官		陳誠		孫連仲 (代)																																																																																															
長江上游江防軍 總司令 吳奇偉 副司令 曾以鼎 李及蘭		第10集團軍 總司令 王敬久		第26集團軍 總司令 周岳 副總司令 區壽年		第29集團軍 總司令 王績緒 副總司令 廖震		第33集團軍 總司令 馮治安 副總司令 李文山																																																																																													
第32軍 宋肯堂	第8軍 兼巴宜要塞司令 方天	第86軍 朱鼎卿	第87軍 周翔初	第94軍 牟庭芳	第66軍 方靖	第75軍 柳際明	第44軍 王澤浚	第73軍 汪之斌	第59軍 黃維綱	第77軍 馮治安 (兼)	第74軍 王耀武	第79軍 王甲本	第30軍 池峰城	工兵第3團	通信兵第42團	炮兵第12團	憲兵第2團	兵站總監部																																																																																			
第139師 劉雲翰	第141師 孫定超	第1師 林作楨	第2師 唐水良	第3師 胡璉	第4師 吳道善	第5師 吳曉雲	第6師 曹金輪	第7師 羅賢達	第8師 曹金輪	第9師 羅賢達	第10師 羅賢達	第11師 羅賢達	第12師 羅賢達	第13師 羅賢達	第14師 羅賢達	第15師 羅賢達	第16師 羅賢達	第17師 羅賢達	第18師 羅賢達	第19師 羅賢達	第20師 羅賢達	第21師 羅賢達	第22師 羅賢達	第23師 羅賢達	第24師 羅賢達	第25師 羅賢達	第26師 羅賢達	第27師 羅賢達	第28師 羅賢達	第29師 羅賢達	第30師 羅賢達	第31師 羅賢達	第32師 羅賢達	第33師 羅賢達	第34師 羅賢達	第35師 羅賢達	第36師 羅賢達	第37師 羅賢達	第38師 羅賢達	第39師 羅賢達	第40師 羅賢達	第41師 羅賢達	第42師 羅賢達	第43師 羅賢達	第44師 羅賢達	第45師 羅賢達	第46師 羅賢達	第47師 羅賢達	第48師 羅賢達	第49師 羅賢達	第50師 羅賢達	第51師 羅賢達	第52師 羅賢達	第53師 羅賢達	第54師 羅賢達	第55師 羅賢達	第56師 羅賢達	第57師 羅賢達	第58師 羅賢達	第59師 羅賢達	第60師 羅賢達	第61師 羅賢達	第62師 羅賢達	第63師 羅賢達	第64師 羅賢達	第65師 羅賢達	第66師 羅賢達	第67師 羅賢達	第68師 羅賢達	第69師 羅賢達	第70師 羅賢達	第71師 羅賢達	第72師 羅賢達	第73師 羅賢達	第74師 羅賢達	第75師 羅賢達	第76師 羅賢達	第77師 羅賢達	第78師 羅賢達	第79師 羅賢達	第80師 羅賢達	第81師 羅賢達	第82師 羅賢達	第83師 羅賢達	第84師 羅賢達	第85師 羅賢達	第86師 羅賢達	第87師 羅賢達	第88師 羅賢達	第89師 羅賢達	第90師 羅賢達	第91師 羅賢達	第92師 羅賢達	第93師 羅賢達	第94師 羅賢達	第95師 羅賢達	第96師 羅賢達	第97師 羅賢達	第98師 羅賢達	第99師 羅賢達	第100師 羅賢達

/ 鄂西会战中国军队战斗序列。

后任第4期入伍生团连党代表。1942年，任第86军副军长。后任第九战区中将高级参谋、中央训练团总队长等职。鄂西会战时，任长江上游江防军第86军军长。

方天，黄埔军校第2期工兵科毕业。又名天逸、天一，号空如，江西赣县人。1938年，任第94军第185师师长。1940年，任第18军军长兼宜巴要塞区守备司令。1944年，任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鄂西会战时，任长江上游江防军第18军军长兼巴宜要塞守备司令。

滕云，黄埔军校第2期炮科毕业。号云祥，广西南宁人。历任黄埔军校入伍生团队附、高级班教育副官，广东黄埔同学会秘书，广西人民抗日救国军第2纵队第4团团团长，广西国民军训委员会教官、委员，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少将高参等职。1948年授少将军衔。鄂西会战时，任第18军巴宜要塞区指挥官。

金亦吾，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毕业。亦名长年，字亦吾，湖北京山人。历任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江防局少将副局长，湖北第八联防区总团长等职。1943年，任汪伪第6师师长，抗战胜利后开释无罪。鄂西会战时，任第86军暂编第32师师长。

曹金轮，黄埔军校第4期

步科毕业。贵州遵义人。1940年，任第86军第13师师长。1943年，任第九战区第10军第13师师长。1947年授陆军少将衔。鄂西会战时，任第86军第13师师长。

胡琏，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毕业。原名从禄、又名俊儒，字伯玉，陕西华县人。历任第18军营长、团长，陆军第67师旅长，第11师副师长、师长，第18军副军长和军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谋等职。1948年晋升陆军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18军第11师师长，因守石牌要塞有功，获青天白日勋章。

覃道善，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毕业。字仲明，湖南石门人。历任18师52旅旅长、76师副师长、18军第18师师长等职。鄂西会战时，任第18军第18师师长。

吴啸亚，黄埔军校第4期工兵科毕业。字醒民，浙江青田人。历任第5师副师长、青年军第204师副师长、第34师师长、第208师师长等职。鄂西会战时，任第18军暂编第34师师长。

孙定超，黄埔军校第6期少校中队长。字华峰，湖北汉阳人。历任第32军第139师师长、第32军副军长等职。曾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外围保卫战

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32军第139师师长。

刘云瀚，黄埔军校第7期工兵科毕业。江西大庾（大余）人。1939年，任第11师参谋长，后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1944年后，相继任第11师师长、国防部第一厅副厅长。鄂西会战时，任第32军第5师师长。

罗贤达，黄埔军校第三分校第5期炮科毕业。字建三，湖南长沙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14师连长、团附，第18军第11师营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鄂北会战诸役。1948年授陆军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86军第67师代理师长。

池峰城，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毕业。又名凤臣，字镇峨，河北景县人。1936年授陆军中将。1938年参加徐州会战，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汗马功劳。1939年，任第30军军长。后任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长江上游江防军副总司令、第13军军长兼宜巴要塞区守备司令。鄂西会战时，任长江上游江防军第30军军长。

乜子彬，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毕业。字森昌，河北景县人。曾任第30军31师93旅旅长、第30军31师师长、第92军副军长、保定绥靖公署警备司令等

职。先后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均立有战功。鄂西会战时，任第30军第31师师长。

林作楨，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毕业。字干卿，山西安邑人。1936年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忻口战役、鄂北会战和常德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32军第141师师长。

许文耀，黄埔军校高教班第4期毕业。字炳南，河北徐水人。1936年授少将。曾任第55军副军长、第30军第27师师长等职。鄂西会战时，任第30军第27师师长。

第10集团军

王敬久，黄埔军校第1期步科毕业。字又平，江苏丰县人。1937年，任第71军军长兼87师师长。1940年，任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翌年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调任重庆卫戍副司令。鄂西会战时，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

彭善，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字楚珩，湖北黄陂人。曾任武汉分校第6期学员第2步兵大队第5中队中校队长、中央教导3师中校团副。1939年，任第18军中将军长。1940年，任湖北军管区中将参谋长。1942年，任鄂中挺进军总指挥。1943年，任第10集团军中将军副司令兼第

6战区挺进军总指挥。鄂西会战时，任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

牟廷芳（牟庭芳），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贵州朗岱人。1940年，任陆军第94军副军长。1942年，任陆军第94军军长兼三峡警备司令。1943年，获颁三等宝鼎勋章。曾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雪峰山战役等战役。1938年授陆军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94军军长。

王严，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字力行，回族，山东郯城人。1932年，任第11师团长。1936年，任第98旅旅长。1938年，升任第118师师长。1945年，任第18军副军长。曾率部参加南昌会战、桂南会战、常德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87军第118师师长。

向敏思，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毕业。字利锋，土家族，湖南永顺人。1938年，任第18军14师42旅少将旅长。1940年秋，任第79军98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任第79军98师师长。1945年，兼任乐山警备司令。先后参加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及衡阳保卫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79军第98师师长。

赵季平，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字季湘，湖南桃源人。历任第10集团军新编34师副参谋长，70军128师参谋长，新

编第6军暂编第6师副师长，第79军暂6师师长等职。曾率部参加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79军暂编第6师师长。

劳冠英，黄埔军校第5期步科毕业。字方成，广西合浦人。任第58师第174旅旅长，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第1纵队司令，第三战区暂编第35师师长，钱塘江北岸守备指挥官。鄂西会战时，任第94军暂编第35师师长。

吴光朝，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字寄虹，湖南平江人。任国民革命军第55师上校参谋长、副师长、师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军务处长，汉口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重庆第三补给区中将司令。先后参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等。1948年授陆军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94军第55师师长。

戴之奇，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2期步科毕业。又名子奇，贵州兴义人。毕业后终生从军，官至国军整编69师中将师长（正军职）。先后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94军第121师师长。

龚传文，黄埔军校第5期干训班毕业。云南凤庆人。193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98师第

294 旅副旅长。1939 年后，任暂 6 师副师长、第 79 军第 149 师师长等职。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常德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1951 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将多年积存的 150 多两黄金捐献国家。鄂西会战时，任第 79 军第 194 师师长。

王甲本，黄埔军校高教班第 3 期毕业。字立基，云南富源人。1937 年授少将。1941 年晋升为陆军第 79 军军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长沙保卫战、鄂西会战、衡阳保卫战等战役。1944 年 9 月，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79 军军长。

李士林，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 17 期第 13 大队少将总队长。河北蠡县人。1936 年，任第 99 师第 297 旅少将旅长。1939 年，任第 99 师副师长。1941 年，调任军政部第七补训处少将处长。1942 年，任第 87 军 43 师少将师长。1948 年，晋升为陆军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87 军第 43 师师长。

第 26 集团军

柳际明，黄埔军校工兵科上尉教官。又名善，字际明，浙江临海人。历任陈诚系第 14 师参谋长、第 94 军第 55 师师长、第 94 军副军长等职。曾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湘北会战、常德会战

等战役。1948 年授陆军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75 军军长。

方靖，黄埔军校潮州分校第 2 期毕业。字海濂，江苏江都人。历任第 76 师副师长、第 13 师师长、第 18 军副军长、暂编第 9 军军长、第 79 军军长等职。先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桂柳会战等战役。1948 年，授陆军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66 军军长。

王中柱，黄埔军校第 3 期步科毕业。别号震聩，湖南祁阳人。历任第 18 军 11 师少将旅长、湖北应城交通警察司令、第六绥靖区第 75 军副军长等职。1948 年授陆军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75 军预备第 4 师师长。

靳力三，黄埔军校第 4 期毕业。山西安邑人。参加过长沙会战、雪峰山会战等战役。1948 年授陆军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66 军第 199 师师长。

沈澄年，黄埔军校第 5 期步科毕业。字渐之，浙江余姚人。历任第 75 军补充第 1 旅副旅长、旅长，第 75 军第 6 师副师长、师长，第 26 集团军第 75 军副军长等职。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浙赣会战和常德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 75 军第 6 师师长。

唐肃，黄埔军校第 6 期毕业。又名景云，号景纯，湖南邵阳人。历任第 28 军第 16 师副师

长、师长等职。1948 年授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75 军第 16 师师长。

石祖黄，黄埔军校第 6 期毕业。别号次公，湖南邵阳人。历任第 185 师参谋长、第 185 师 546 旅旅长、长江上游江防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鄂西会战时，任第 66 军第 185 师师长。

第 29 集团军

韩浚，黄埔军校第 1 期毕业。原名德照，又名仲锦，号青黎，湖北黄冈人。历任黄埔军校第 1 期、第 3 期上尉区队长，第 4 期学生队步兵第 1 团第 4 连少校连长等职。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任副总指挥，后被捕脱离共产党组织。曾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和雪峰山会战等著名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 73 军第 77 师师长。

许国璋，黄埔军校第 5 期毕业。字宪廷，四川成都人。1941 年，任第 150 师副师长兼第 448 团团。1942 年任该师师长。1943 年 11 月，在湖南常德与日军激战中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944 年 2 月，被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 44 军第 150 师师长。

郭汝瑰，原名汝桂，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第 5 期毕业。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

离中共组织关系。历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第22兵团司令等职。1980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鄂西会战时，任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

王泽浚，黄埔军校高教班第6期毕业。别号润泉，四川西充人，陆军上将王缙绪之子。1937年任国民党第44军第149师第447旅少将旅长。1948年9月晋升中将。鄂西会战时，任第44军军长。

第33集团军

余程万，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号石坚，广东台山人。毕业后历任黄埔军校教导1团排长、连长、营长，教导2团中校团副，上校党代表。1934年，任第49师团长。1936年，晋升少将衔。1940年，升任第57师师长。曾率部参加上高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74军第57师师长。

刘振三，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字育如，河北故城人。历任第113旅旅长、第180师师长。1948年授陆军中将。曾率部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59军第180师师长。

王耀武，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字佐民，山东泰安人。



/ 鄂西会战中，中国军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937年，率部创建第74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74军第51师师长，74军副军长、军长，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等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任受降主官。曾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33集团军第74军军长。

周志道，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原名尚志，字靖方，江西永新人。1937年，任第51师第151旅少将旅长。1942年，任第51师师长。1945年，任第100军军长。曾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74军第51师师长。

张灵甫，黄埔军校第4期步科毕业。原名仲麟，字灵甫，陕西长安人。1940年，任74军第58师副师长。1941年，任第

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战役。1945年授陆军少将。鄂西会战时，任第74军第58师师长。

吉星文，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别字绍武，河南扶沟人。七七事变时，打响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第一枪。率部参加随枣会战、鄂北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77军第37师师长。

李九思，黄埔军校高教班第8期毕业。字子有，河南邓县人。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1938年任第59军38师113旅旅长。1940年任第59军38师师长兼第59军训练处主任。曾率部参加卢沟桥抗战、常德会战、豫西会战和鄂北会战等战役。鄂西会战时，任第59军第38师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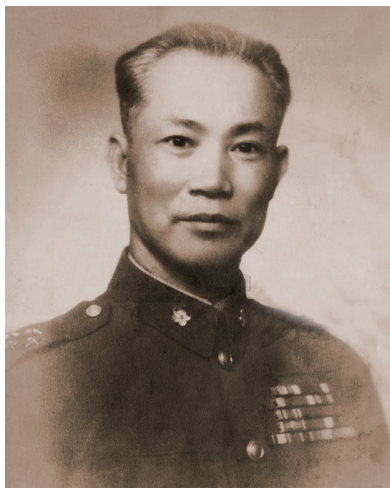
鄂西会战中的陈诚与胡璉

□ 张小源

1943年4月，为打击中国第六战区的主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攫取洞庭湖地区的粮仓，威胁中国陪都重庆的门户，日军第11军抽调6个师团又1个旅团约10万人的兵力，集中各型飞机240余架，向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发动进攻。中国军队第六战区将第29、第10、第26、第33集团军，连同上游江防军及其他警备部队等共14个军的兵力投入战斗。5月28日，在拼死守住防线、力克日军疯狂进攻后，中国军队终于挫败江防正面日军攻势，并且夺回了渔洋关，切断了日军后方的交通线。30日，第六战区各军发起全面反攻。31日，伤亡惨重的日军开始撤退，第六战区下达追击命令。至6月18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宜都，收复枝江城和松滋城，并将长江南岸的日军全部逼退至北岸，鄂西会战结束。

陈诚坐镇指挥鄂西会战

1898年，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县，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6月，黄埔军校建校，经邓演达和严重援引，陈



/ 陈诚。

诚入黄埔军校，为上尉特别官佐，担任教育副官一职。后来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加上东征北伐时期立下的战功，屡屡获得升迁，1929年，便任第11师师长，一年后任第18军上将军长。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他已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成为蒋介石特别倚重的军事将领。在抗日战争中，参加指挥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鄂西会战、豫中会战等重要战役。1948年底，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院长”等职。1965年，因病逝世于台北。

鄂西告急之际，陈诚已调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但他仍

十分关注第六战区的战局，多次急电孙连仲注意江防各据点的守卫，要死守江防，绝不可抽调部队他去。陈诚认为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日军已据有宜昌，极有可能溯江西犯重庆，应以“毋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的原则，重点配置于以石牌要塞为中心的江防。5月初，陈诚再电孙连仲：第一线部队及挺进军严密戒备，痛击来犯之敌，并按轮番袭击计划，不断派遣部队向指定区域积极轮番攻袭破坏，并详侦敌情具报；第二线部队即日完成战备，务能随时参加战斗。根据陈诚的指示，针对日军进攻的路线，第六战区部署了作战计划。

5月17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赶回恩施指挥鄂西会战，并制定以各部队的坚强抵抗，不断消耗敌人，诱敌至渔洋关巨石牌要塞，聚敌于大江西岸而歼之的作战计划。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3日，渔洋关陷入敌手。为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陈诚号召大家，一定要精诚团结，沉着镇定，以不变应万变，指出“敌人这次进犯鄂西，是蓄谋已久的，旨在动摇抗战两个根本（一个恩施一个

重庆)，形势确很危急。但现在政府已有严密部署，前线士气旺盛，装备也较前优良，只要大家坚定抗战信念，加倍努力工作，抗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同时指示按策定计划实施，不论情况如何变化，第18军之第11师固守石牌要塞，准备孤立作战，以5月底至6月2日为预定作战时间，以长阳以南、清江南北两岸地区为决战地区。

5月下旬，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战略要地——石牌。态势焦灼之际，蒋介石电示陈诚：石牌要塞须独力固守10天，希望成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如无命令撤退，即实行连坐法。29日，石牌要塞前，敌军攻势甚烈。陈诚根据敌我军力对比，决心按照1940年预定“待敌深入至山岳地带后，再行截击敌之归路而求歼之”之腹案，令江防军竭力守备原阵地，不得变更。并为减轻江防军正面压力，同时命令各部提前反攻：第94军向都镇湾，第74军向松滋、枝江，第44军向公安，并令第33集团军加紧攻击当阳。30日，敌军攻势已告顿挫。根据各方情报及空军侦察情况，陈诚判断敌军已有撤退迹象，当晚下达追击命令。31日，各部迅速开始反击，于长阳、聂家河、枝江等地先后截断敌人后路，斩获颇多。至6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带外，江南方面

一律恢复原来态势，鄂西会战至此胜利结束。陈诚返回云南指挥远征军。

胡璉奉命守卫石牌

1907年，胡璉出生于陕西华州的一个贫寒农家。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入伍生团训练数月后，胡璉被分配到第4期步兵科第7连学习，与张灵甫、刘志丹、林彪等人成为同学。毕业后，恰逢第一次国内革命，以黄埔师生为主力的北伐军势如破竹，直捣两湖。胡璉因作战勇敢，擢升排长。北伐战争后，胡璉投奔在南京警备司令部里任团长的关麟征，得到关麟征的赏识，任连长。1928年，陈诚任第11师副师长，重用了大批黄埔师生。胡璉随关麟征来到了陈诚麾下，从此深植“土木系”，一路升迁。1942年，胡璉已升任第11师师长。1944年任18军军长。胡璉率军参加的抗战战役中，尤以鄂西石牌和湘西雪峰山战役战功显著。1949年，去台湾后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195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1972年，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77年6月逝世于台北。

1943年，胡璉任师长的第11师接任石牌要塞的防务。胡璉亲自查看石牌要塞的各处工



/ 胡璉。

事，根据附近地形制定筑城计划，包括工事之构筑、改变地形与道路、兵力与工事适当配置、原有兵力布防、粮弹副食品供给、通信设施与联络等，形成了一套以防御为主、相机反击为辅的作战方案。5月12日，第11师开始加固工事，在山隘要道设置层层鹿砦，把主力隐蔽在石牌要塞附近的北斗冲、三官岩、四方湾等山沟里和岩洞中，凭险据守，留下师部机关和部分兵力据守要塞。

5月下旬，日军右路部队因航行受阻，滞留于宜昌以西地区，左路部队推进至渔洋关，因受困于地势险要加上补给断绝，停止前进。横山勇决定孤注一掷，集结中路军6万余人，直扑石牌，企图中路突破。正值敌军攻势最为猛烈之际，陈诚致电胡璉传达蒋介石的手令，即石

牌乃中国之斯大林格勒，是关系陪都安危之要地。并严令江防军胡璉等诸将领，英勇杀敌，坚守石牌要塞，勿失聚歼敌军之良机。胡璉回答：“请放心，我誓与要塞共存亡，以保持 18 军荣誉。”

决战前夕，胡璉祭天宣誓，誓与日军决战到底：

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璉，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

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坚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欽，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

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懦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

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此时，胡璉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他还给家人留下两封诀别信。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



/ 冲锋中的中国军队。

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子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愿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敬叩金安。

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接读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匆匆谨祝珍重。

5月29日，为吸引多数日军于要塞阵地，便于中国野战军作战，第11师师长胡璉命第31团趁夜向要塞阵地转进。日军连日经中国军队打击，斗志低迷，伤亡惨重，已成动摇之势。6月1日，胡璉下达作战命令，部署第31团、第32团、第33团的作战计划，进行反攻。6月3日，在对日军进行连续进攻后，双方态势恢复至5月27日战前态势，石牌保卫战遂告终结。第11师师长胡璉率部固守要塞，顽强抵抗，为鄂西会战的胜局奠定基础。战后，胡璉被提拔为第18军副军长，并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卞子彬与“陆军第三十一师 抗敌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 郑庆元

为英烈立传颂德、立碑纪事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为的是勉励后辈勿忘历史、铭记先烈，从而继承先烈遗志、传承发扬先烈精神。1943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了鄂西会战，中国军队拼死抵抗，其中尤以石牌保卫战最为激烈和残酷，在豫南的第30军奉命紧急驰援。但当担任第31师师长的卞子彬率部到达时，日军已开始总撤退，第31师受命换防石牌。卞子彬为未能提前赶至杀敌而遗憾。

1944年8月，为了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31师将士，激励后人继承先烈抗战报国的遗志，卞子彬在石牌修建了“陆军第三十一师抗敌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卞子彬（卞，音同“聂”），字森昌，1901年3月14日生于河北省景县刘镇卞村。1914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军，当过马夫、勤务兵，后任冯玉祥身边的传令兵。因其作战勇敢，屡立战功，25岁升任营长，被冯玉祥赞为“拼命三郎”。1934年9月，卞子彬从黄埔军校高教班第2期毕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



卞子彬。

爆发，卞子彬时任第26路军第30军第31师第91旅第181团团长，率部随总指挥孙连仲从豫南北上抗日，先后在北京房山、山西娘子关等地与日寇拼杀，表现英勇。1938年初，卞子彬升任第2集团军第30军第31师第93旅旅长。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第31师奉命从豫北千里驰援抵达台儿庄，并担负守备台儿庄重任。为分散日军兵力，卞子彬留一个团守备台儿庄城，便亲自率领第93旅第185团及师部骑兵连为先锋北上诱敌。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卞子彬发出“部队皆凋零，忠勇咸效死”的号召，

率部与日军血战十数日，为最终胜利立下战功，由此荣膺华胄勋章。此后，卞子彬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均立有战功。1940年，升任第30军第31师师长。抗战胜利后，卞子彬任保定警备司令、第92军副军长等职务。1951年，在台湾因病去世。

1943年，石牌保卫战打响后，在豫南的第30军奉命紧急驰援鄂西。卞子彬率部到达时，日军已开始总撤退，第31师受命换防石牌。担任驻防任务的第31师师长卞子彬除在周边山崖留有“还我河山”“争取胜利”等宣传抗战到底的手书石刻外，还曾修建“陆军第三十一师抗敌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以铭记军民的浴血奋战，悼念在抗战中阵亡的将士。现将碑文抄录如下：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首创敌于房山，继告捷于娘子关。廿七年春，台儿庄会战，以训练未三月之兵，挡敌精锐强悍之师，我官兵犹能坚守半城于一壁一室间，火光熊熊中搏斗苦撑，



/ 陆军第三十一师抗敌各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


开巷战未有之先河，遂造成辉煌之战绩。同年秋，敌犯武汉，师再布阵于大别山，孤军苦战，力却强敌，浴血搏斗达十八昼夜，士气之壮，牺牲之烈，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如廿八冬，摧坚破锐，桐枣荡寇，势如破竹。荆当逐北，殄敌于襄水花孝，挺进扬威于淮源。凡此诸役，我忠勇将士为国牺牲者达万余人。三十二年夏，师于豫南受命援鄂，衔枚急趋，冒暑长征，迨达战地，适敌溃窜，而我近万健儿咸以未能参战为憾。旋奉命接防石牌，扼守要塞，肩荷重寄，以惧以荣。十一月十八日，为策应常德会战，

九十一团二营五连攻击中堡山，官兵神勇，力搏敌垒，前仆后继，争相先登，受伤不退，裹创杀敌者几十余人，尤属英烈。三十三年六月，湘省战起，攻势再兴，我九十二团第三营，累取翠福山，九、十两日，先后猛攻，克敌坚堡四座，官兵凯唱，士气鼓舞。方期一举，扫荡□□，直捣宜沙，乃以战略所关，功亏一篑，而官兵殉国者又近百数余。躬亲战阵，靡役不从，袍泽杀敌之勇，牺牲之烈，历历在目。每当风暗晦冢，兀然斗室，缅怀忠良，忧戚无已。爰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择地，鳩工筑公墓于其上，策划经营两

月告成。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上抚中枢崇德报功之意，下酬烈士成功成仁之举。仰树枕戈待旦之风，并作同仇敌忾之气，岂仅以武功彪炳寰宇也哉！谨述颠末，而□是邦人士观感云尔。

师长：卞子彬 谨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立

此碑详尽记述了第 31 师在抗战中所参加的诸次战役，以及建立此纪念碑（塔）的经过，再现了抗日将士的英雄壮举，当下读之仍旧令人震撼。正所谓：“石牌巍峨，江水奔流；黄埔精神，天长地久！”

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中国智慧

□ 钟厚涛

2023年3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实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内容与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对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再动员、再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和国家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出的战略考量，是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使命与新担当的必然要求，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境界，在国际社会广泛获得高度评价。

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新篇章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时，深刻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这一重大理念的论述不断深化。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并提出，到2035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

全过程人民民主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深厚土壤，既是中国传统民主智慧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经验总结，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民主话语体系、民主理论范式和民主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时代意涵、丰厚的理论逻辑和重大的创新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

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023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胜利召开，既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生动写照。3月11日，王沪宁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也特别指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充分彰显了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点优势和生机活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绝非权宜之计，更非空头口号，本质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追求民主、实现民主和发展民主的伟大创造，是党不断推进中国民主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

创新的重要结晶，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领域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标志性成果，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自信和底气。我国的民主实践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础，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又对我们的民主实践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治国国有常，利民为本。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视为自身的使命与职责。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民主政治建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既是对过往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鲜明标志和明确追求，具有政治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前沿性等多种特点。20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样不是理论的装饰品，而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民主，也是与时俱进和不断拓展的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项开放的事业，永无止境，必须坚持不断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的优秀品格，在实践中追求民主、践行民主和发展民主，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部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提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才能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未来中国将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愿景，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理国家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为在实践中全方位推进人民民主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代以来，在全世界很多

国家和地区，民主实践长期被狭隘地限定在政治领域，民众仅参与数年一次的选举投票。在表面轰轰烈烈的投票以后，民主就进入了“休眠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借鉴优秀民主成果基础上，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保证我国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各种民主形式、渠道和手段，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大大拓展了民主实践的发展空间，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牢了民主基石。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无论是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还是百姓日常琐事，人民群众都能够充分参与，有效推动社会民生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得到及时回应和妥善解决，由此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

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具体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并非简单的一次投票行为，而是深度融入到人民整个政治生活、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治理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建立了全面、完整、有机的制度链条，形成了全过程的民主程序闭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多种形式保障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因此可知，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一次性消费”的投票选举，而是全方位、全时段、全民性的民主，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优越性，民主含量最高，民主环节最全，民主气息最浓，民主成色最足，真正做到了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这也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民主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实现的，对于民主的探索和实践永无止境。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同样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理念，未来党和国家会在实践中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的新要求新期盼，深刻吸取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全面总结中国民主发展取得的

显著成绩，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上同步攀登新高峰、携手迈向新境界。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党和国家会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建设、积极拓展生动活泼的参政议政渠道空间，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要求融入完善制度、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实践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最能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最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进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为全世界民主实践贡献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实现民主的方式则多姿多彩，不可能定于一尊，更不可能千篇一律。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霸权地位，否定其他国家的民主方案。实践证明，西方民主并非民主发展的理想典范，也不是民主实现的唯一方式，反而导致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肆意蔓延。

近些年，美西方国家虽然自诩“民主灯塔”，却频频爆发“金钱政治”和“否决政治”等民主失能和异化现象，“唯选举式民主”的表象化、空壳化、劣质化和暴力化态势。全世界很多

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唯选举式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操弄，是为少数人或者少数利益集团（大财团）服务的，已经陷入了“选举至上主义”的迷思，所谓“两党制”或“多党制”，“三权分立”或“宪政”体制等，表面不偏不倚，以票取人，背后却是黑金政治在作祟。经由“唯选举式民主”所产生的执政党，不但无法有效化解所在社会面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难题，反而越来越倾向于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成为少数人的“代言人”，这势必会加剧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导致中下层民众的被剥夺感越来越强烈。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唯选举式民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反思，充分揭示了西方民主的问题根源所在，直指其不是真正的民主，同时充分总结西方民主与中国式民主长期以来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引导广大人民参政议政，既要通过依法选举让代表人民利益的人进行决策，也要通过广泛协商让人民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提出了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

俄乌冲突带给台湾的警示

□ 彭韬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一年两个月时间，数以千万计乌克兰民众面临着十室九空、家破人亡、穷困潦倒、衣食无着的困难境地。2022年12月15日，联合国第八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发表的报告中称，乌克兰总人口4300万，超过18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约783

万人逃离该国成为难民，650万人在境内颠沛流离，150万儿童可能患上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称有10万乌克兰军人阵亡，目前乌克兰已经启动第11轮征兵，但18至60岁男性兵源几乎已经枯竭，大量的女性、老人都成了乌克兰征兵对

象，女兵人数已经达到乌军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乌克兰和俄罗斯本是同胞，如今却如仇人般沙场厮杀、兵戎相见，双方血流成河、伤亡累累。回顾乌克兰局势可以看出，自冷战苏联解体后的30余年，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有着根本的冲突并且无法

(接前页)

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大有可为，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对于摆脱西方话语的桎梏，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揭露西式民主虚假的本质及其根本缺陷，推动民主实践蓬勃发展、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具有非常深远的指引意义。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清晰、结构严密，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有效对冲了西方国家长期把持的国际民主话语的定义权、议题设置权和争议裁量

权，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探索自身的民主道路，在世界舞台上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称赞。

从未来走向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必然会开出绚丽的花朵，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会释放出更大的效能，引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走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泡沫的幻影，提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加快民主探索的信心，引领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启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之路，必将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开放与多元。

结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和推动人类民主政治进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未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必将不断发展完善，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活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强动力，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更多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

调和。乌克兰一直在亲俄与亲西方的立场之间摇摆，而这一局面最终在 2014 年美国等西方势力干预下被打破。2013 年 11 月 21 日，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缓签署旨在强化与欧盟贸易关系的联系国协定，转而寻求同俄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此为契机，在西方势力的煽动下，乌克兰爆发了“颜色革命”。美国和欧洲支持反对派借机掀起抗议浪潮，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事到如今，美国和北约对有可能被拖入战争泥潭都唯恐避之不及。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方求助于美国以及欧洲 27 个国家领导人，但美国白宫发言人却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乌克兰派兵”。而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战争前，美国以乌克兰为跳板大肆在欧洲拓展势力，还是在战争爆发后，借机吸收回流美国的欧洲资本，都让美国受益，但作为“棋子”的乌克兰却只剩下满目疮痍的国土和流离失所的民众。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在持续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言论，为的就是牺牲台湾民众的福祉而谋取对抗中国大陆。台湾民众应警惕美西方国家的言论，搞清楚俄乌冲突的实质，不要成为“台独”的牺牲品。

错误的选择使得乌克兰民众流离失所，成为大国之间博弈的“棋子”。

俄乌冲突摧毁了乌克兰的发展前途。1991 年苏联刚刚解体时，乌克兰人均 GDP 一度高达 4500 美元左右，在欧洲也算得上十分富裕的国家。事情起变化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在乌克兰建立大量的民间文化交流组织，不断培养乌克兰本土文化学者鼓吹美国的民主自由，鼓吹加入北约和欧盟，最后直接爆发了“颜色革命”，原来亲俄的政府被推翻。到了 2020 年，受疫情的影响，乌克兰人均 GDP 降到 3100 美元，这个国土面积欧洲第二的国家沦为全欧洲最穷之国。而在今年，经历一年多炮火侵袭的乌克兰更是雪上加霜，世界银行东欧地区负责人班纳吉预计今年乌克兰贫困人口将增加十倍。曾经的欧洲粮仓，如今的穷困之国。统计数据显示，乌克兰三分之二的公民没有储蓄，多达 50% 的家庭仅用于购买食物的钱。而在物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乌克兰人都被迫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乌克兰想要在战火中浴火重生，重新发展经济，重回以往“欧洲粮仓”的盛况，还要看冲突何时停止，然后在世界政治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对乌克兰而言，此次沦为美西方大国

“棋子”，成为大国博弈的“角力场”教训深刻。

民进党当局包藏祸心，配合“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话术，实质是将民众绑上“台独”战车。

在俄乌战争局势下，不少美西方政客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话术，并且还将支持岛内“台独”一起大肆宣传。民进党当局忘记历史且分不清当前形势，进而对美西方真正目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活在自己所编织的童话中。为配合美国与西方舆论，频频将台湾与乌克兰相提并论进行炒作，甚至声称“对乌克兰的情况感同身受”云云，除此之外民进党当局严格控制报纸、电视等媒体，因此大部分台湾民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西方单方面宣导，例如在新闻中特别强调台湾比乌克兰重要，就算美国现在不救乌克兰到时候也会救台湾，进而台湾民众不断被民进党绑上“台独”战车。民进党当局蠢蠢欲动，不断借机蹭热点、刷存在感。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在阿富汗与乌克兰“前车之鉴”的影响下，依然食髓知味般甘当美国“棋子”；另一方面，以台湾站队所谓“民主阵营”，跟风欧美政客，借机“制裁打压”俄罗斯。

民进党上台以来，对外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

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依附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抗，操弄“抗中保台”，谋求“台独”分裂，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一方面，其两岸政策加码“抗中”，频踩中国大陆红线，使得“台湾成为地球最危险的地方”；另一方面，向美国购买过气军火，又让台湾年轻人延长义务役兵期，造成民怨沸腾。民进党当局给鼓吹“毁台”论调的美国人奥布莱恩“授勋”，将台积电拱手出让，大肆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向美高价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裹挟台湾年轻人当“炮灰”。“倚美谋独”只会把台湾同胞绑上“台独”战车，只会祸害台湾，注定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

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台湾民众需擦亮双眼，切勿成为“台独”牺牲品。


面对美西方势力及民进党的鼓噪，台湾同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区别，没有任何可比性。两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而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乌克兰是联合国成

员，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是地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字叫作台湾。因此，俄乌冲突是国际冲突，而两岸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只能算是国家内战，只能内部解决。以地缘关系来看，乌克兰跟台湾更不能类比。乌克兰是欧洲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周边有七个邻国，外国非常容易给予军援。台湾是海岛，若解放军包围台湾，台湾则毫无招架之力。

虽然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决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也决不允许改变。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包藏着赋予台湾国际法主体地位、将两岸关系曲解为国家间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实质是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如果非要说台湾和乌克兰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在外部势力介入引发军事紧张。美国给台湾定义了诸多角色。台湾是美国用来遏制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中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又是半导体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还是美国打造自由世界的“桥头堡”。但在中美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

从来没有把台湾当作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而是把台湾当成一枚用来实施“以台制华”战略的“棋子”而已。因此，美西方若要拿两者类比，也就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在乌克兰和在台海间蓄意引发战火和军事危机的图谋。

两岸之间不是“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的生存游戏，而是应该平等协商谈判创造共赢局面，维系和加强两岸同胞感情。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素来有着保家卫国、抵御外敌入侵的宝贵精神品质。“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余光中的乡愁不仅道出了他的蚀骨思乡之情，而且反映出两岸有着不能回避，也无法漠视的民族情感。民意不可负，时势不可逆，岛内搅局的“台独”势力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中”的基本事实。台湾民众需擦亮双眼，中国大陆既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同胞，当然也不会纵容任何一个胆敢祸国殃民的分裂者，毕竟现实是残酷的，战争是无情的。希望此次俄乌冲突足以给台湾民众以警醒，切勿成为民进党当局“台独”路线的牺牲品。同时奉劝民进党当局，同为中华儿女，应以百姓苍生福祉为念，千万别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3年2—3月

□ 吴亚明

2月

国台办：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已循既有渠道促请台方恢复两岸直航航点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日答记者问时介绍，2月1日，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已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表示，当前，两岸疫情均已平稳，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有利时机。希望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可优先考虑恢复台胞反映较为集中的广州等16个两岸直航航点。

台湾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

有关恢复两岸直航航点的话题在岛内受到高度关注。台湾社会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采取行动，尽快恢复疫情以来中断的两岸直航航点。

福州台胞公寓社区与台中社区“牵手结对”迎元宵

4日上午，福州市首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晋安区岳峰镇桂溪社区邀请居住在此的300多名台胞欢聚一堂迎接元宵佳节，桂溪社区与台中市北区金龙社区还通过网络，签约结对成为友好社区。

2023年台商新春座谈会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2023年台商新春座谈会，50多位台商代表参会。

星云大师圆寂

6日清晨，台湾佛光山宣布，开山宗长星云大

师5日下午在位于高雄的佛光山传灯楼开山寮圆寂。

“广州60条惠及台胞措施”修订发布，助推穗台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

广州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修订发布“广州60条惠及台胞措施”。修订版着重从惠及台胞政策红利、拓宽台企发展渠道、帮助台企转型升级、支持辅导台企上市、鼓励融入南沙发展、提供精准涉台服务、保护台商合法权益等7个方面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国台办：共同努力尽早尽快恢复两岸正常交往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春节和元宵节期间，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开展一系列走访慰问台胞活动。活动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两岸交流符合两岸民意，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我们要共同努力，尽早尽快恢复两岸正常交往。

江苏台企开足马力忙生产

元宵节刚过，江苏台资企业快马加鞭，抢订单、赶进度、扩产能，呈现繁忙景象，展现强烈的发展信心。

王沪宁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10日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

多项数据衰退，台湾经济开年表现不佳

出口贸易额“五连黑”，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7个月紧缩，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又见“3字头”……台湾当局陆续发布1月经济数据。专家分析认为，台湾经济开年表现欠佳，增长压力不小。

大陆吊唁团在江苏宜兴大觉寺吊唁星云法师

国台办发言人12日应询介绍，12日下午3时，

大陆吊唁团在佛光山祖庭江苏宜兴大觉寺吊唁星云法师。吊唁团团长，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中央统战部有关机构负责同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及星云故乡江苏省各界代表出席吊唁仪式。

国台办：愿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日表示，这段时间，岛内农渔民通过中国国民党，有关县市、团体等多种渠道表达心声，愿意改善产品品质，确保输往大陆农渔产品安全，希望大陆尽快恢复输入。我们愿意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

两岸青年企业家（上海）交流活动聚焦“新机遇新未来”

两岸青年企业家（上海）交流活动13日举行，两岸百余位嘉宾和青年企业家聚焦“共享新机遇共创新未来”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话加强交流合作。

商务部回应使用“不可靠实体清单”对两家对台军售企业实施制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日表示，近年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屡次对台实施军售，严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依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二条等规定，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应措施，是依法采取的正常执法行为。

外销“冷飕飕”，台湾制造业景气走缓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日公布，1月台湾地区外销订单金额475.1亿美元，同比下降19.3%。这是自去年9月以来，台湾外销订单连续

5个月负增长。

国台办：将尽最大努力为两岸交流往来提供便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陆将尽最大努力为两岸交流往来提供便利、节约成本，欢迎台湾同胞多到大陆走走看看，希望广大台商台胞与我们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往来正常化、交流常态化。

国台办：民进党政客混淆视听，为否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脱责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日答记者问表示，“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是有明显区别的两个概念，民进党一些政客却一再张冠李戴、混淆视听，企图欺骗岛内舆论、误导广大台湾同胞，为其否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寻找借口、开脱责任。

国台办：台湾居民洪政军、孔祥志非法进入大陆被公安机关抓获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日答记者问表示，2023年1月，台湾居民洪政军、孔祥志因非法进入大陆被公安机关抓获。为打击犯罪，保障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两岸交流秩序，公安机关对洪政军、孔祥志依法作出稳妥处理。

京台社区发展交流活动在京举办

京台社区发展交流会27日在北京举办，北京市西城区、丰台区的街道社区工作者与来京参访的台湾高雄里长暨基层社团参访团一行座谈交流，两市基层工作者都表示，热切期待两岸界双向交流尽快恢复正常。

“31条措施”发布5周年

28日是《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发布实施5周年，自“31条措施”发布以来，国台办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落实落细，

同胞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越来越方便，享受同等待遇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外交部发言人：奉劝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信口开河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日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奉劝美方悬崖勒马，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切香肠”、搞突破，停止混淆视听、信口开河。

3月

国台办：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日答记者问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美方的售武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是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是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今年涉台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反“独”促统，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同心共创复兴伟业。

王沪宁参加台湾代表团审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9日上午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台湾代表团审议。

2023海峡两岸闽台艺术交流展在台北举行

“两岸山河情——2023海峡两岸闽台艺术交流展”13日在台北举行，来自海峡两岸33位艺术

家的近70幅艺术作品亮相。近百名与会人士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艺术交流，共促两岸文化交流发展。

国台办：自3月15日起恢复台湾地区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5日表示，大陆已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取消所有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环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监测检测等措施。为促进两岸贸易健康发展，海关总署决定自3月15日起恢复台湾地区冰鲜白带鱼、冻竹荚鱼输入。

第17届两岸标准论坛在北京和台北同步举行

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海峡两岸通信交流协会与台湾华聚产业共同标准推动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17届海峡两岸信息产业和技术标准论坛，15日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和台北同步举行，两岸信息产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100余人参加。

台湾各界数十个政党团体举行反“台独”反介入联合抗议行动

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发起、数十个统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台独”反介入联合抗议行动16日在台北举行，近300名各界代表集体表达反对“台独”、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强烈诉求，要求民进党当局及有关部门立即停止所谓“全民防卫动员法”修法进程。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在厦门大学举办

“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17日在厦门大学正式启动。该系列学术活动将由厦门大学与中华文化学院轮流举办，每场次将各邀请一位大陆和台湾学者，就同一个问题展开深度对话，力求呈现两岸同文同种、根叶相连的文化亲缘，唤起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生动诠释“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理念。

台湾电价大涨，舆论批当局错误能源政策冲击产业和民生

台经济主管部门宣布4月电价平均调涨11%，创下近14年来的最高调幅。其中，民生住宅电价每月用电量从700度起涨3%，千度以上跳升10%；工商业大户电价更涨了17%，是此次调价的“重灾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坚持“非核”的错误能源政策冲击产业和民生。

上海举办两岸民间论坛，冀往来正常化、交流常态化

第三届海峡两岸民间论坛18日在上海举行。两岸嘉宾热议“新形势下两岸和平发展与民间交流”，期待两岸往来正常化、交流常态化。

第二期“统一论坛”在厦门举行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与华侨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期“统一论坛”22日在福建厦门举行，部分中国统促会理事、专家学者与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反“独”促统代表人士等80余人与会，围绕“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凝心聚力推进统一大业”主题进行交流。

台湾商业总会访问大陆“收获满满”

台湾商业总会大陆经贸交流团21日抵达北京，在密集拜会有关部门后于25日离京返台。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临行前表示，团员们提出的各项诉求均获有关部门积极回应，此行“收获满满”。期许通过更多良性互动，促成两岸交流合作早日恢复正常。

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

洪都拉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5日下午发表声明，宣布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6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在北京与

洪都拉斯外交部部长雷纳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国台办：洪都拉斯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大势的正确选择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日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洪都拉斯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大势的正确选择。

马英九率团抵达大陆

马英九27日率团抵达上海，并赴南京。中共中央台办、上海市委有关负责人到机场迎接。马英九此次来大陆祭祖、参访，并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前来交流，将到访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地。

台湾数十个政党团体举行联合抗议反对台美勾连

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发起、数十个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台独”反介入联合抗议行动28日在台北举行，抗议蔡英文假借“过境”之名会见美国反华政客的谋“独”行径。

国台办：统一之后台湾同胞将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9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统一之后，台湾同胞将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统计显示：台湾民众阅读热情回升，去年图书借阅量创新高

台湾图书馆日前在台北公布2022年台湾民众阅读风貌年度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台湾民众走入图书馆的热情呈现回升态势，图书借阅量创历年新高，线上阅读热度也在持续升温。



军工解码：战斗机的前世今生

(上)

□ 石稼

人类第一架飞机诞生后，如何将其运用到军事领域很快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意大利将军朱里奥·杜黑的制空权理论，进一步奠定了飞机在战场上的地位，地球的天空从此不再宁静。战斗机作为军用飞机的主战兵器，争夺制空权始终是各国空军的核心使命任务之一。



/ 福克 E 型战斗机。

战斗机的发展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飞机很快被投入战场。随着交战双方投入飞机数量的不断增加，敌对双方飞行员在空中相遇的概率迅速提升，随即爆发了最早的空中交战行动——飞行员用手枪、步枪和机枪等在空中相互射击。



/ 德国 Bf-109 战斗机群。

1915年初，德国福克公司的3名工程师研制出了一种先进的“射击同步协调器”，将其安装在福克 E 型战斗机上，使飞行员能够从发动机顶部操控机枪进行瞄准和射击，极大提高了射击准确性和火力密度。改装后的福克飞机立即成为空中大杀器，开始大量击落协约国的

飞机，使空战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呈一边倒的戏剧性变化。该机也因此被英军认为“残酷虐杀皇家飞机”而名声大噪。

福克 E 型战斗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空战样式和战术思想，提高了飞机空战能力，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款战斗机。

此后，各国均在福克战斗机设计理念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战斗机的速度、高度、航程和火力等关键指标，使得战斗机的作战性能不断提升。

“二战”初期，最著名的活塞式战斗机非德国 Bf-109 战斗机莫属。该机作为一款性能卓



/ 美国 P-51 野马战斗机。



/ 德国 Me-262 喷气式战斗机。

越的战斗机，基本涵盖了“二战”初期战斗机的全部优点，先后发展出十余个改进型号，共计3万多架，是“二战”期间生产数量最多的战斗机。

在这一时期，德国空军凭借 Bf-109 战斗机称霸了欧洲的天空，不论是西线将英法联军赶出欧洲大陆，还是东线闪击苏联后的长驱直入，德国空军始终以碾压性优势将制空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并创造了各种令人瞩目的战绩。

“二战”中，德国空军许多王牌飞行员均是驾驶 Bf-109 战斗机取得了可观的战绩，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空军头号王牌哈特曼少校，他驾驶 Bf-109 战斗机取得了个人击落敌机 352 架的世界纪录。根据战后数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空军总战果的 55% 以上都是由 Bf-109 战斗机获得的。

直到“二战”中后期，随

着英国喷火式战斗机以及美国 P-51 野马战斗机的出现，欧洲大陆上空的空战才变成了势均力敌的拉锯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开始投入新型的 Me-262 喷气式战斗机，该机是人类航空史上第一种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860 千米/小时，比各型活塞式战斗机要快 100—140 千米/小时。该机长 10.6 米，翼展 12.5 米，机高 3.5 米，空重 4400 千克，最大起飞重量 7045 千克，采用了全金属半硬壳结构、后掠式机翼、双发动机布局、半水泡式座舱以及前三点式可回收起落架等一系列最新的航空技术理念。虽然 Me-262 性能不够稳定、故障率高、航程较短，但仍然是一款跨时代的战斗机，为后续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斗机

飞速发展的黄金期，整个战争期间登场的战斗机型号以及后续改进型号层出不穷，各种设计理念、航空技术、导航技术、通信技术等战火中得到反复验证和淬炼，空中格斗、护航编队、掩护攻击等战术随着装备发展不断优化，战斗机担负的使命任务也逐步丰富和细化，双方各自投入成百上千架飞机进行超大规模空战的场景成为常态。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铁幕随即笼罩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进入漫长的僵持与博弈阶段。在战斗机研发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的战斗机型号，特别是美、苏两国在机体设计、机载设备和关键性能指标上更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在互相赶超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设计思路和作战思想。

冷战初期，受“高空制空权”理论中“谁有高度优势，谁



/ 苏联米格-15 战斗机。



/ 美国 F-86 战斗机。

就能控制战斗”的思潮影响，各国不断从速度、高度、火力、机动等方面来改进战斗机的设计。随着风洞技术和空气动力学技术的发展，喷气式战斗机迅速取代了活塞式战斗机。现代航空理论中，开始将喷气式战斗机根据其关键性能指标和作战特性等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等级划分，并在世界上形成了普遍共识。

冷战初期的喷气式战斗机为第一代战斗机，该级别战斗机普遍采用后掠翼设计，使用轴流式/离心式涡轮喷气发动机，最大速度为 0.9 至 1.5 马赫（1 马赫=1 倍音速=1226 千米/小时），武器为大口径航炮，空战方式仍为近距离格斗、俯冲攻击和尾随攻击等。第一代战斗机电子设备非常简陋，主要有无线电罗盘、通信电台和简单的敌我识别等装置。典型代表为米格-15、F-86、米格-19、F-100

等，F-100 是世界第一款具有超音速平飞能力的战斗机，人类自此彻底突破了“音障”。

朝鲜战争后，美、苏空军纷纷提出“2 马赫+2 万米”的高空高速指标，第二代战斗机的划分标准也在此基础上得到确定。由于空气动力学的发展进步，第二代战斗机的机体设计主要应用了超音速面积律技术，或者采取小展弦比的飞翼布局，如六面形翼、菱形翼、双凸面翼等，以便提升整个机体的高速适应性和操控性，但缺点是爬升性能和盘旋性能等不够理想。第二代战斗机普遍使用带加力功能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平飞速度 2 马赫以上，实用升限 2 万米以上。随着导弹技术的发展，第二代战斗机开始携带空对空导弹进行作战，一般采用红外制导或半主动雷达制导等方式，极大提高了命中精度和杀伤射程。在信息技术推动下，第二代战斗机普遍安装

了机载导航系统、通信系统、具备拦射能力的自动火控系统、告警设备以及机载雷达等各型航空电子设备，战斗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中远程打击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大机群编队作战的战术成为历史。

美国为了达到第二代战斗机的标准，F-4 和 F-104 均放弃了机头进气的成熟设计理念，改为采用头部尖锐、两侧进气的全新布局。苏联则认为新的进气技术并没有显著减低机头阻力，因而米格-21 仍然采用机头进气方式，并且选择针对对手的弱点有的放矢，在传统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潜力，力求在关键指标上压倒对方。美、苏两国不同的研发思路很快就在越南战场上得到了检验。

越南战争中，从米格-21 与 F-4 战斗机的交战情况可以看出，F-4 战斗机虽然综合性能优于米格-21 战斗机，能够满



/ 苏联米格-21战斗机。



/ 美国F-4战斗机。

足多任务需求，且具有更远的航程，更强的雷达、通信、电子等机载设备，但是在敌方由防空导弹和雷达等构筑的地面防空体系面前，F-4的高空高速性能无法有效施展，加上机载空空导弹射程近且难以锁定高机动性目标，只能被迫在中低空与敏捷异常的米格-21进行缠斗，因此从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米格-21战斗机虽然在整体性能上不如F-4战斗机，但在加速、爬升、盘旋、减速、滚转等部分指标上均优于对手。因此，米格-21战斗机一般会在地面雷达引导下，采取高空超音速掠袭战术，从敌机侧后方主动发起攻击，一击得手后立即扬长而去。

冷战后期，经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和中东战争等实战检验，美、苏空军认识到第二代战斗机的高空高速性能并不能决定空战的胜负，地空导弹的出现更使得位于高空的战斗机面临极大威胁。新一代战斗机势必需要

利用敌方雷达系统的低空探测盲区寻求突破。第三代战斗机的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推重比的新型涡轮风扇发动机，其冷却技术和耐高温材料使得输出更强，并具有更小的油耗和更大的推力。先进的雷达系统、复合制导的中距空空导弹和发射后就可以不管的红外制导近距离空空导弹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标准配置。在气动布局方面，几何可变机翼、梯形翼和三角翼等成为设计趋势，确保战斗机在中低空飞行时仍能够保持优秀的爬升、盘旋、减速、加速等机动能力。在这些标准基础上，双发重型战斗机逐步成为美、苏两国的研制重点，典型型号包括米格-29、苏-27、F-14、F-15等。

苏联解体后，持续40余年的冷战宣告结束，暂时没有假想敌的北约国家在一个时期曾失去军备竞赛的动力，战斗机的更新换代速度明显放缓，第三代战斗机在不断升级电传系统、机载

电子设备、机载武器和火控系统 etc. 等情况下出现了众多改进型号，典型代表包括“阵风”“台风”、F-15SE、苏-35等。

当时，美国“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是冷战后期为了应对苏联空军下一代战斗机威胁而设立的。早期确定项目需求时，美国空军认为敌方预警机的出现，能够轻松克服地面杂波的干扰，迅速捕获低空飞行的第三代战斗机，从而造成巨大威胁，因此将超隐身能力作为F-22战斗机的首要指标，除此之外还要具备超视距作战、超机动性、超音速巡航能力。上述四种能力英文首字母组成的“4S”标准，在后来也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第四代战斗机标准。

为实现F-22战斗机的“4S”特性，该机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包括低波阻外形设计、超大迎角空气动力学设计、高升阻比设计等，装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加力式涡扇发动机，



/ 米格-29 战斗机。



/ F-14 战斗机。

以及各型先进的雷达、导航、武器、火控、通信、态势感知等航电设备。F-22 还采取一系列雷达波隐身和红外隐身技术，包括进气口设计、发动机尾喷口设计、隐身涂层设计、内置弹仓设计等先进理念。集众多顶级技术于一身的 F-22 战斗机虽然战术指标惊人，但在面对单价 1.87 亿美元的“天价”时，美国也感到力不从心，仅装备 187 架后就关闭了 F-22 生产线。

美国为弥补 F-22 数量缺陷，随即研发出一款相对低配的 F-35 战斗机，该机重量、航程以及载弹量与 F-22 差距不大，但发动机推力和机翼面积远小于 F-22。

近年来，为应对来自美军的空中威胁，俄罗斯和中国也相继发展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第四代战斗机。

总的来看，冷战结束后，各国对战斗机的需求出现了明显差异，察打一体无人机、远程巡航

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的出现，压缩了战斗机的作战使用范围。新型反隐身雷达、预警机和远程防空导弹等武器的发展，增加了战斗机的作战使用风险。敌对双方战斗机之间爆发空战的可能性相对降低，各国更加注重战斗机的多用途能力，这在各国战斗机的后续改进型号上得到印证。

战斗机的分类

现代战斗机主要指世界各国空军目前现役的各型第三代和第四代战斗机，根据各国国防战略、作战需求和发展方向的不同，进一步细分为制空战斗机、高空截击机、多用途战斗机、舰载战斗机等类别。

制空战斗机

有些国家称为歼击机，是空军航空兵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专门担负争夺制空权任务，作战对象是敌方各类飞机或飞行物，主要携带各类空对空武器，负

责与敌机进行中远距离交战和近距空中格斗。制空战斗机的特点是滞空时间长、航程远、机动性强，例如 F-15、苏-27 战斗机等。

高空截击机

专门用于截击入侵的敌方轰炸机、侦察机或巡航导弹，主要任务是保卫本方重要目标、战略要地、指挥中心和交通枢纽等固定设施，具有全天候快速反应的特点，能够迅速奔赴指定空域进行高空高速截击任务，通常采用一击脱离战术。高空截击机速度快、升限高，但机动性和续航能力相对较弱，没有近距离格斗优势。因作用相对单一已逐步被各国淘汰，仅有部分国家少量装备，如米格-31 战斗机。

多用途战斗机

有些国家称为联合战斗机，飞行性能优异，机动性和续航能力强，装有先进的雷达、导航、火控、通信、态势感知等信息化设备，能够挂载和发射



/ F-15 战斗机。



/ 米格-31 战斗机。



/ 苏-35 多用途战斗机。



/ F-35B 舰载战斗机。

多种类型的导弹武器。根据挂载武器的不同，多用途战斗机可以具备对空、对地、对海攻击能力，能够执行制空、截击、对地、反舰、护航、侦察、巡逻等多种作战任务，例如 F-16、苏-35、F-35A 战斗机等。

舰载战斗机

是为满足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的作战需求，具备垂直起降、弹射起降或者滑跃起降能力的战斗机。现役舰载战斗机具备对空、对地、对海打击能

力，属于多用途战斗机范畴。不同的起降方式决定舰载战斗机可以携带的武器和油料，进而决定舰载战斗机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半径。一般情况下，舰载战斗机是陆基现役战斗机的改进强化版本，或者是陆基和舰载版本同步研发的“一机两型”。因此，舰载战斗机的性能具有 80% 以上通用性，如苏-33、“阵风” M、F-35B/C 战斗机等。唯一例外的现役机型，是美国专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研制的

F/A-18 战斗机，该型战斗机的后期改型小批量装备了几个盟国的空军部队。

另外，各国还会根据其国情、军情、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等，对某一型战斗机进行改进升级，使其具备更强的作战能力或能够执行更多样化的作战任务，从而催生出新的版本和型号。一般情况下，没有国家会为了不同的作战需求同时研发多个型号的战斗机，而会选择研发多用途战斗机作为发展方向。■

军语新解

□ 石评



我的剑绝不争权夺利而出鞘。

——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马丁·马托拉斯

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马丁·马托拉斯，出生于1778年2月25日，是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之一、杰出的军事统帅，阿根廷民族英雄。他的重要贡献是将南美洲南部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与西蒙·玻利瓦尔一道被誉为南美洲的解放者。

圣马丁出生在阿根廷白人殖民者的官吏家庭，父亲是西班牙皇家陆军军官。1789年参加西班牙军队。1808年至1811年参加抗击拿破仑军入侵的法西战争。西属美洲独立战争爆发后，于1812年返回阿根廷参战，1813年2月率部在巴拉那河畔的圣洛伦索击败西班牙船队，同年底赴图库曼接任北方军司令。其后，他统帅的军队一路高歌，战无不胜，为南美洲南部的独立和解放扫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他先是领导爱国军队击退殖民军的反扑，维护了阿根廷的独立；后领导了翻越安第斯山的战斗，进军智利，解放了圣地亚哥；之后又率阿根廷、智利爱国联军经海路北上进攻秘鲁，解放了利马，宣告秘鲁独立。1822年7月，他在瓜亚基尔与玻利瓦尔会晤后悄然引退。1824年，圣马丁赴欧洲，一度返回南美洲，最终定居法国布洛涅城。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病逝，享年72岁。

在整个南美洲乃至同时代的世界军事史上，没有哪个政治家和军事统帅能像圣马丁将军那样获得如此高的殊荣和评价，也没有哪个人在全球得到这么多人的称赞。南美人民尊称他为“祖国之父”“美洲历史上无双的英雄”，阿根廷、智利、秘鲁三国称其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尊他为“国父”，智利和

秘鲁称他为“自由的缔造者”。北美各国的政界、军界、学术界把圣马丁誉为“安第斯山的骑士”“新世界最伟大的缔造者之一”。美国政治家威廉·泽布朗·福斯特认为圣马丁“可以放在世界最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之列”。中国学者李春辉在《拉丁美洲史稿》中说：圣马丁被誉为阿根廷的国父，拉丁美洲人民至今还缅怀和敬仰他。

圣马丁身后这些巨大的殊荣，密码就藏在“我的剑绝不争权夺利而出鞘”这句话里，这是他在戎马倥偬的战场生涯中践行的座右铭。圣马丁一生都致力于南美洲的独立和解放，从不掺杂任何个人的私欲和名利。他建立的独立革命核心组织——“劳塔罗”支部，宗旨是“有组织有计划地为美洲的独立和幸福而斗争，以荣誉和正义为行动之准则”。之后他投身革命，亲自组织训练部队，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为的是推翻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统治，实现自己大公无私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当圣马丁的地位和威望如日中天时，为彻底消灭殖民军，也为了消除民众对他可能独裁的担心，他毅然选择与南美洲北部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联手，将南部军队指挥权交给玻利瓦尔，自己则宣布辞去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的职务，悄然隐退。他在国会的辞职演讲中说：“对一个为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战的斗士来说，胜利的喜悦只能使他更加诚心诚意地成为使人民享有权利的工具……在这届国会上，我辞去我所拥有的一切最高权力！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请所有议员先生都不要投我继续执政的选票！”

纵观中外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或军事统帅，但凡身前以悲剧收场、身后褒贬不一的，几乎无一例外是为“争权夺利”的私欲所累。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既是一将历史功业的必然代价，很多时候也是一将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


被称为“战略之父”的汉尼拔在战场上有如战神般百战百胜，最后落得个自杀身亡的悲剧，根本原因是他带领迦太基打了一场本就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战场上的个人英雄气让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了一个拔剑的“崇高失败者”。

曾经让整个欧洲发抖的“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创造了一系列的军政奇迹和成就，但因为野心不断膨胀、一心称雄世界，注定了他在遭遇滑铁卢战役失败后众叛亲离，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作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克伦威尔，曾推动了英国的政治变革，并将国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处死国王、王后，权力也曾达到顶峰。但胜

利后的私欲膨胀，让他走上了军事独裁统治的不归路，最后失去民心，死后被查理二世鞭尸、身首异处，未得善终。类似汉尼拔、拿破仑、克伦威尔等悲剧案例在中外历史上举不胜举。

这些曾经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战神、枭雄的历史悲剧总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不断重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拔出的剑掺杂了太多的名利心和权力欲，让他们在私欲的不断膨胀和争权夺利中迷失方向，最后走向历史宿命式的悲剧。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走向这种悲剧的对立面就可以了，只是人在巨大的名利诱惑面前，要做到遏制住私欲的膨胀、不为名利、急流勇退又谈何容易。

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开国元勋、居功至伟的首位总统乔治·华盛顿做到了，他将公器付之公论、权力回归人民，所以他被尊为美国的国父。圣马丁将军也做到了，他被称为“最有道德的公仆和最无私的爱国者”“南美洲的华盛顿”“佩剑的圣人”。

黄埔百年主题征文启事

1924年6月16日，在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国共合作创办的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黄埔军校培养的一批批革命军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世代传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我们将迎来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本刊特向广大黄埔同学、黄埔后代亲属征文。

征文内容：讲述自己与黄埔的故事，抒发对黄埔的情感，阐述对黄埔精神的理解和传承，歌颂黄埔人对国家人民的贡献，思考新时代黄埔人的历史使命。要求事迹翔实，感情真挚，图文并茂。

征稿时间：2023年3月至2024年6月。

稿件字数：2000—4000字，图片2—5张。

注意事项：稿件、图片请尽量提供电子文件。请在电子邮件主题中注明“黄埔百年征文”字样。手稿不予退还，请自留底稿。

电子信箱：hpzzs88@sina.com

电话：010-58336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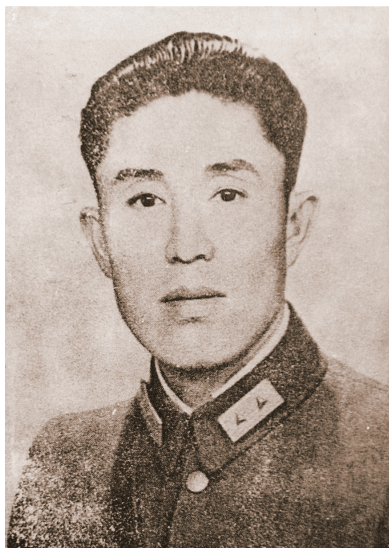
联系人：陆东红、曹燕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抗战时期的郑洞国将军

□ 冯杰



/ 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

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1期毕业。曾参加东征和北伐，1933年率部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七七事变后，相继率部参加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屡创顽敌，战功卓著；1943年调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副总指挥，率部会同盟军收复缅北，扬威国外；1945年回国，历任第三方面军副司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总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等职。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关键

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率部投诚，长春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洞国历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于祖国建设与统一事业。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曾当过郑洞国随从参谋的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这样评价当年的长官：“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从不邀功，听任上级和同僚制定的游戏规则，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聚焦抗战时期的郑洞国，在战火纷飞的岁

月里，这位“以爱国始，以爱国终”的抗日名将与黄杰、裴昌会、杜聿明、孙立人等都结下了生死之缘。

长城御敌友谊浓

1965年秋，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托人转达情治部门负责人，希望了解故旧郑洞国在大陆的情况。彼时的两岸高度隔绝，黄杰动情资源打探一位旧识，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时光回到1933年3月，日军进犯长城，蒋介石抽调部分中央军北上御侮。第17军第2师第4旅旅长郑洞国增援到达古北口，军长徐庭瑶语重心长地说道：“现在前线的情况很紧张，



/ 1933年2月，第2师在潼关举行抗日誓师大会，郑洞国(右一)与师长黄杰(左一)、副师长惠济(左二)、参谋邵平凡(右二)合影。

第2师已经打残了，有情报说日军正向古北口增兵，估计不久日本人的进攻将更为猛烈，现在命令你部即刻出发，务于天亮前接防第25师的阵地。”

当时郑洞国的顶头上司就是第2师师长黄杰。郑、黄二人同庚，一为湖南石门人，一为湖南长沙人，都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鉴于八道楼子地势高出南天门约一倍，郑洞国提醒黄杰加强戒备：“谁占据此处，谁即可以火力控制古北口全镇。”黄杰有点掉以轻心，认为“日本兵穿皮靴，无论如何是爬不上这几座碉楼的”，因此只派出一个连防守。4月20日晚，日军悄悄摸上八道楼子，一夜之间攻占8座碉楼。徐庭瑶怒火中烧：“你们怎样失守，就负责怎样收复！”

黄杰先令第6旅反攻，结果伤亡1500余人。第二天，郑洞国亲自上场，“我指挥部队由八道楼子东面500米以外的光秃秃山坳上，在无地形掩蔽、又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仰攻，整整激战一日，可惜仍未能成功”。5月末，南京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绥东、察北、冀东沦为日军自由出入区。长城抗战结局如此，郑洞国、黄杰彼此感慨：“无数官兵的牺牲，所付出的代价，就被一纸屈辱的协定断送了。”



/ 第17军参加长城抗战的部分将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庭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郑洞国、邱清泉。

1935年6月，何应钦再次屈从日方压力，签下所谓的“何梅协定”，答应中央军、东北军撤离河北全境。黄杰含泪请各旅、团长聚餐：“今天请各位来吃杯告别酒，此番离开北平，尚不知何时才得故地重游啊！”郑洞国泣不成声，多年以后依然记得当时那一幕：“撤军的那天，官兵们在操场上抱头痛哭，最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北平。”黄杰后来调任财政部税警总团长，郑洞国代理师长职务。西安事变发生后，第2师、税警总团组成中央纵队集结潼关，幸好大规模内战得以消弭，后者先行开回连云港。黄杰抓住机会，根据实际情况报告军政部：“受命指挥之部队分驻两省，事实上无法兼顾，拟恳免除第2师师长职务，以郑洞国调升。”

1937年5月，蒋介石核准所请。黄杰第一时间致电道贺，郑洞国回复说：“屡蒙保举，铭感五内，同出师门，不敢言谢，惟有追随学长之后，竭智尽忠，报效国家，以期无负培植。”不久，全面抗战开始，郑洞国实现报国诺言，率部转战河北、山东；黄杰却因豫东作战违令撤退，被蒋介石撤职查办，降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解放战争后期，郑洞国在长春放下武器，率部回归人民阵营，黄杰所部一路溃败南逃越南境内，后撤退至台湾。令人遗憾的是，郑洞国、黄杰分别于1991年、1995年驾鹤作古，生前未能再见一面。

孤困保定见冷暖

1937年抗战军兴，第2师、第25师合编为第52军，昼夜

开赴华北战场。9月22日晚上，军长关麟征电话告知郑洞国：“现在第25师压力很大，有的部队已经垮下去了，我准备转移阵地，将第25师布置在保定以南地区，作为第52军的预备队，第47师协同你师守城。”翌日，第2师官兵在保定北门内外与敌展开激烈肉搏，谁知情况发生变化，城外友军联络不上，第25师又没能在保定以南站稳脚跟。郑洞国为人向来诚恳，为此感到难以理解：“我对关麟征颇有看法，我们共事日久，彼此总该有些关照，但他将我这一师摆在最危险的地方，撤退时竟连个招呼都不打，任凭我们去牺牲，不仅全无一点情义，而且也太不负责任。”

危急时刻，第47师师长裴昌会赶来，郑洞国感动之余颇为意外：“各路友军竞相后撤，唯独裴师长不避艰险，依令而来，此举使我对他十分敬重。”听完战斗情况介绍，裴昌会默然良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眼下死守保定已无希望，只是碍于未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而不好言明”。24日中午，日军穿插渗透保定城内，参谋长舒适存焦急地说：“现在或是死战殉城，或是乘机自动撤退，以全实力，请两位师长速做决断！”郑洞国略加思索：“我们并未奉死守到底的命令，况现已抵抗两昼夜，



1939年11月，蒋介石检阅第5军，左三为郑洞国。

孤军难支，应撤出保定以保全部队，将来若有问题由我承担，不知裴师长意见如何？”裴昌会毫不逃避：“我同意郑师长的决定，此事还是大家共同负责。”

保定一别，裴昌会和郑洞国分属不同战区，始终难有交集。1979年10月，郑洞国、裴昌会同时当选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裴昌会不忘致信台湾友人：“我在北京会见了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许多老朋友，每次谈话都离不开盼望同在台湾的亲友团聚这个主题。”值得一提的是，郑洞国还不遗余力帮助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有段时间，每月仅出具证明耗费的邮资就占到他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民革中央知道后，提出可以实报实销，他执意不肯，希望尽量为国家减轻负担，为过去的袍泽尽到一点心力。

甘任师长克雄关

1938年底，新编第11军副军长杜聿明电报郑洞国，问他是否愿意屈就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一夜未眠，在汤恩伯麾下虽然位居军长，但以这支湖北地方部队的老班底，恐怕难有所为。新编第11军不一样，军长徐庭瑤乃自己老长官，杜聿明“热情豪爽，肯于钻研，处事果敢”，那可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郑洞国道别汤恩伯，到新编第11军任职。不久，新编第11军改番号为第5军，郑洞国担任副军长兼师长。荣誉第1师与众不同，多由伤愈官兵归队拨编，优点是抗日意志坚决，具有一定作战经验，缺点是老兵油子不在少数，统驭起来比较棘手。比如有团长吸食鸦片，屡教不改，只好将其调走。第3团

团长郑庭笈治军有方，个人品行优良，郑洞国大为器重，结果引来闲言碎语，说什么都姓“郑”，可能沾亲带故，也不问郑庭笈是海南文昌人，与湖南隔着千山万水。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锐意整顿，荣誉第1师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11月中旬，日军登陆钦州湾，轻取南宁和昆仑关要隘。白崇禧商得蒋介石同意，调动第5军驰援桂南抗日战场。杜聿明、郑洞国信心十足，毕竟部队整训时间已有年余，全军将士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2月18日凌晨1时，反攻昆仑关战斗打响，荣誉第1师、第200师担任正面主攻，很快夺回一些外围制高点。南宁日军东拼西凑北上支援，第5军各部奋力阻击，不少阵地反复易手。激战至24日，郑庭笈通过望远镜发现公路边上有日军军官集合讲话，立刻集中迫击炮、重机枪一顿猛射，事后方知击伤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次日毙命）。31日，第5军攻克昆仑关，取得抗战以来难得的攻坚战胜利。

1940年4月，郑洞国奉命以荣誉第1师为基础，组建新编第11军。离开第5军之前，杜聿明大摆酒宴饯行，回首合作共事期间，他们可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有些部属惧怕杜聿明的



/ 1943年11月，郑洞国（中）与两位美军准将商议军务。

威严，请准事项往往先找郑洞国，杜知道后不以为忤，还说凡郑副军长批准同意的，便可视同他的意见。韶华荏苒，白驹过隙，1959年12月，兵败被俘改造10年的杜聿明获得特赦，身体养得远比战争年代健壮，郑洞国看了真心感到高兴。往后的一段漫长岁月里，两人时常结伴考察全国各地，出席各种活动。1981年5月，杜聿明病逝北京，郑洞国悲痛不已，携手诸位友人编写《杜聿明将军》一书，用最好的方式缅怀挚友。

扬威异域争立场

1943年元月，蒋介石委派郑洞国去印度，担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郑洞国一下怔住了：“带兵打仗我有些经验，但要在国外独立与洋人打交道，我完全是外行，如果搞得不好，岂不贻误抗战大局。”蒋介石当然

理解郑洞国的难处：“你去那里是会有困难的，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容易，但抗战需要盟国帮助，必须有人担负这项重任，我反复考虑过，你去是最合适的。”显然，蒋介石看重的是郑洞国的温和儒雅，可以耐着性子应付难相处的史迪威。

原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一部分退往印度境内。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主张“要兵不要官”，试图大刀阔斧改革“驻印军”架构。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他的方案，决定电召罗卓英回国，另外成立新编第1军。临行之际，军政部长何应钦叮嘱郑洞国：“罗卓英、杜聿明都同英国人、美国人处不来，你去后务必小心行事，一要以充分的耐心和美英盟军将领打交道，尽量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二要注意维护民族尊严，做好驻印军内部的团



/ 1977年夏,郑洞国(左二)、侯镜如(左一)、杜聿明(右二)、宋希濂(右一)合影于广州黄埔军校孙中山故居前。

结工作。”

是年盛夏,史迪威擅自撤换总部副参谋长温鸣剑,引发驻印军将领集体反对。8月14日,郑洞国转报重庆,“温鸣剑自到职以来,努力整顿,遇事力持大体,成绩斐然,竟为宵小诬陷,全军愤慨,纵使必须更换,亦应报由中央明令处理,并仍以华人接替,方符中美合作之旨,职虽极端忍耐,实无法维系军心”。孙立人、廖耀湘平日言行谨慎,此次亦明确表示碍难接受,“职等事事本中美合作主旨忍辱负重,现美方出此不合理之措置,今后军官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国家体制尊严将何以堪”。最终各退一步,温鸣剑体面调职,史

迪威同意李申之继任总部副参谋长。

1944年夏秋之交,郑洞国升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直接指挥作战的机会明显增多。密支那距离云南腾冲只有一山之隔,对盟军来说,如占领密支那,不但可以打通中印陆上通道,还能成为“驼峰航线”增加飞行安全度。5月中旬,中美混合突击支队兵临城下,奇袭演变为攻坚。史迪威、郑洞国飞抵密支那前线,留下参谋长柏特诺组织前进指挥所,再兴攻势。令人遗憾的是,柏特诺未能听取合理建议,导致伤亡惨重,进展缓慢。所幸史迪威并不故步自封,郑洞国制定“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正确作战方针,从而确

保密支那战役取得最后胜利。

后因与蒋介石的矛盾不可调和,史迪威快快踏上回国之路。10月初,郑洞国放开手脚,多次从列多乘坐美军飞机视察督战,“见到整个八莫城在我强大空军和炮兵猛轰下大火熊熊,浓烟滚滚,日军炮火几乎完全被压制,城内建筑大多崩毁”。当鼓角声远去,孙立人致函郑洞国长孙建邦:“令祖为当代儒将,四十余年不见,积念至深,起居时幸为致意,立人敬爱之忱一如往日也。”由此可见,郑洞国之所以赢得同僚尊敬,除了抗战中的赫赫战功,离不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正如黄仁宇所说:“他的长处在于坚韧不拔,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5]

郑洞国将军鏖战台儿庄

□ 吕东来

今年是台儿庄大捷 85 周年，又适逢郑洞国将军诞辰 120 周年。1938 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 2 师师长的郑洞国将军率领第 2 师浴血台儿庄两个多月，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现撷取将军血战台儿庄的片段，与大家一同回忆将军抗日的丰功伟绩，以此追思缅怀将军。

1938 年 3 月中旬，鲁南前线告急。由于扼守山东滕县之第 22 集团军邓锡侯部兵少械劣，正面薄弱，两翼空虚，难以拒敌。第 20 军团奉命驰援鲁南，于是，郑洞国率第 2 师由火车输送至滕县附近，在利国驿集结投入战斗。

布防大运河 进军抱犊崮

3 月 19 日晨，第 2 师 6 旅在沙沟与敌激战。日军千余由战车 10 余辆掩护自临城奔袭而来，猛攻 6 旅，企图强渡运河。郑洞国即命 4 旅冒着日军的炮火跑步沿运河南岸布防，与敌隔河激战。敌增援部队源源而至，向我军再次猛攻，我重榴弹炮营立即发炮猛烈还击，敌阵地多被摧毁，不敢贸然渡河，双方隔河炮战，至晚方息。



/ 郑洞国。

据《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记载：

运河南岸利国驿一战，实属我军之幸运。倘当时我第一线作战部队未依实际情况而灵活处置或动作迟缓，使日军冲过运河，则徐州势所难保。而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我友军各部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皆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晚，汤恩伯军团长来到郑洞国第 2 师师部视察，对该师战果甚表满意，并转达了第五

战区的战略部署：让开津浦路正面，在峄县东北之抱犊崮山区、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并对峄县方向占领阵地，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进攻台儿庄，即行南下，积极向临枣地区日军之侧背攻击，断敌退路，会同第 2 集团军将敌压迫至微山湖畔歼灭之。

围攻枣庄城 夜袭郭里集

3 月 24 日，第 20 军团所部第 13 军（辖第 110 师）、52 军（辖第 2、第 25 师）、85 军（辖第 4、第 89 师）分别向枣庄、峄县之敌发起进攻，以此牵制进犯台儿庄的日军。25 日凌晨 2 时，第 4 师在 89 师的掩护下，自马山、卓山、黄山三面围攻枣庄。当地矿警 10 余人自动加入我军充当干探，予第 4 师极大便利。经数小时激战，上午 8 时攻克敌据守的中兴煤矿公司水塔及矿场东北的三座碉楼，至此，枣庄的 3 / 4 为我军攻占，仅有南面一座碉楼为敌人控制。

第 4 师乘胜猛攻，在中兴煤矿公司所在地同日军进行猛烈之巷战。第 4 师缩小包围圈，敌死守公司内中兴中学负隅顽

抗。我军当即焚毁该校，同时
在各出入口处架设机枪，防止敌
人突围而出。日军大部被焚毙，
残部突围时，被我军击毙一部，
其余为我军俘虏。

第85军在枣庄传出捷报时，
第52军在枣庄东打响了夜袭郭
里集的战斗。

第52军于22日到达向城，
23日在向城休整一天。24日晨，
以第25师为左纵队，经辛兴
庄沿九顶山北麓向郭里集前进，
到达后即向枣庄方向严密警戒。
军部率第2师和炮7团野炮兵
1营为右纵队，在第25师之后
成梯次沿尚岩、税郭以北高地
边缘向鹁鸽窝地区前进，到达
后与第85军取得联系，准备
协同该军向枣庄攻击前进。当
晚，第25师负责攻略峰县城、
潭山、苗庄、野葛埠一带，第2
师控制于黄山、杜家沟，策应
第25师作战，另派一部对临沂
方向警戒。当日下午4时，第2
师行至税郭东北高地边缘的一
个小村庄旁，忽然听到该村内
有人向我军部警卫连开枪，该
连当即将村庄包围，并派上校
参谋徐幼常进村交涉，发现村
内驻有便衣武装40余人，原
来是一支敌后游击队。游击队
得知第2师是抗战部队后，当
即表示愿意支援前线。当夜，
军部率第2师到达枣庄以东5
公里的郭里集区域。是夜，从

临城出发支援临沂第5师团坂
本支队的“沂州支队”到达郭里
集。午夜时分，第25师第75
旅潜入郭里集，将该村严密包
围，毙敌40余名。

第52军郭里集之役，不但
给濛谷支队以迎头痛击，而且使
他们误以为汤恩伯军团要同他们
决战。为避免遭受我军从东北
面侧击其背，被误导的濛谷支
队主力不敢南下，只得在郭里集、
峰县附近停留了五六天，而先以
一个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向台儿
庄攻击，3天后才令福荣的第63
联队主力南下作战，直到3月30
日，濛谷支队主力始由郭里集出
发向台儿庄前进。

拊敌台儿庄 截击坂本顺

27日，根据情报判断日军
第10师团主力已接近台儿庄，
军团便决心南下全力拊敌之背，
求得决战的胜利。当晚，第52
军星夜由傅山、青山一带向南下
之敌出击，并开抵兰陵镇的西南
地区猛烈攻击台儿庄敌人的左
侧背，以解孙连仲部队之危。第
85军牵制齐村、枣庄、郭里集
一带之敌主力，掩护第52军之
攻击行动。

29日，第52军由女峰山经
兰陵镇向台儿庄东北沙江凹转
进，于腰里徐、柿树园之线展
开猛烈进攻，自峰县南下犯台儿
庄之敌在马庄、大庄、张楼、贾

家埠一带顽抗。其中，第2师在
北大窑附近的战斗最为惨烈，敌
我伤亡很大。日军为保护侧背安
全，从台儿庄抽调有力部队，在
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第2师疯
狂反扑。郑洞国严令各旅人与阵
地共存亡，全线与敌殊死搏战。
以至展开白刃战，敌人的飞机、
大炮失去作用，多处阵地几易
其手。

第2师在峰县城东一带与
敌反复鏖战，并一度突入城内，
但日军依仗其炮火优势，兼以坚
固城垣工事为依托，顽强死守，
使我军几次攻击均未奏效。30
日上午11时，第52军向官庄、
河湾、大庄、马庄之敌攻击，至
下午4时，将以上各村完全占
领。当日，郑洞国亲自到前线指
挥部队攻城，他身边一名参谋
人员手中的望远镜不慎在阳光下
反光，被日军发现，立即招来一
顿猛烈炮击。一发炮弹落在郑
洞国右前方不远处爆炸，他尚
未及躲避，便觉左胸被重重一
击，几乎跌倒，后面两名卫兵急
忙将他扑倒。炮击过后，郑洞
国发现，除衣袋内的一枚银圆
被弹皮击弯外，身体居然丝毫
未受损伤，真没想到这枚偶然
放在衣袋内的银币竟使他幸免于
伤亡。同日下午，据守台儿庄的
第27师在危难之际，终于得到
第2师到达傅山口、冯家湖、张
营、三佛楼向台儿庄北洛攻击的



/ 台儿庄大战中的敢死队。

消息。

31日凌晨，第52军发起总攻，经12个小时激战，至午后3时，先后收复村庄10余座，枣台支线已唾手可得。

此时，军情突变。为援救第10师团濑谷大队，日军派出板垣第5师团坂本支队约3000人自临沂方向前来，于向城附近与我军相遇，威胁我第20军团左侧背。

4月1日，第52军由腰里徐、

柿树园摆脱敌人，急向右旋回约20公里，于拂晓到达洪山镇以东的鲁坊。

2日，第20军团将濑谷支队与坂本支队一起卷入包围圈。此时，军团所属各部秘密神速前进，将作字沟、凤凰山、洪山、前烟头、小洪山、西房前、爰曲、秋湖附近及小王庄、凤落、小锅里一带之敌约四五千人像秋风扫落叶似的，于两昼夜中消灭大半，取得了截击坂本支队的胜

利。4月4日，坂本支队向沂州转进，撤出台儿庄战场。

组织敢死队 血战台儿庄

扫清了来自临沂的障碍后，第2师便继续南下，完成配合孙连仲部歼灭进犯台儿庄之敌的战略任务。4月3日，郑洞国派参谋前往台儿庄与孙连仲部队联络。台儿庄守军告以当面敌情，并请求即时派兵侧击敌背，以解台儿庄之危。自4日开始，

第20军团发起总攻击令，先后各自在台儿庄周边的大顾珊、底阁及杨楼同日军展开了4昼夜的鏖战。

自4日起，我军在洪山镇以西、兰陵镇以南，击破机动应战之敌，当夜收复兰陵镇（距台儿庄东北25公里），再度占领甘露寺至杨楼与陶墩之线。

5日，我军对敌造成合围阵势。底阁、杨楼日军3000余人企图以坦克掩护突围，我军以猛烈交叉火网封锁出口，敌突围不成改变计划，加固村寨阵地，企图死守。我军组织敢死队分批攻击，摧毁敌阵地，并发炮轰塌碉楼，嗣后进入村寨巷战，经反复冲杀肉搏，挫败敌人两次冲锋。我反攻4次，牺牲巨大，最终冲破村寨，于6日大败坂本支队，收复底阁、杨楼，残敌千余后向北退走。

6日夜，我军开始全线总攻。第20军团担任台儿庄外包围任务，孙连仲部负责正面清扫。7日凌晨，我军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残敌向峰县、枣庄退走。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

台儿庄大捷，震惊中外，举世瞩目。这是我国抗战以来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

精兵夜奇袭 乘胜追逃敌

败敌濂谷支队主力仓皇向北逃至峰县附近集结，坂本支

队主力则在峰县东北郭里集附近固守待援。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第五战区于4月7日中午下达追令，以第85军为左翼，应沿枣台支路以东地区，向峰县攻击前进，协同第52军歼灭峰县附近之敌。

第52军由东向西，第85军由东南向西北，对峰县形成包围攻击之势。


郑洞国率第2师在左，向九山（又称九顶山）及其以南攻击，攻击重点乃为被敌占领的九山阵地。九山东西走向，巨石累累，草木不生，敌人多以麻袋装土沙石等构成掩体，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2师在第一天攻击到山脚后，再行仰攻，困难极大。经侦察，郑洞国决定放弃白天仰攻，改用“精兵奇袭”的方法，即挑选优秀士兵利用夜间奇袭，多方进攻。经过一夜激战，九山东半部阵地已被我占领，郑洞国将师部指挥所移至山上，督促所部继续攻击。次日，第52军军长关麟征也率军部主要幕僚和少数通信兵、卫士等，在山上设临时指挥所，亲自指挥炮兵集中火力支援第2师作战。

至4月9日，我军攻占了土山、马山、九山、苏家埠、潘家巷一带，已近迫峰县城。14日傍晚，第2师以主力攻击南安城之敌，并以该师骑兵团向枣庄、郭

里集间袭击，切断敌之联络及增援，为进攻峰县做准备。

阻击连防山 告别台儿庄

4月22日，第2师郑洞国部在右侧占领燕子河、大袁庄一线。从26日起，日军采取重点突破的战术，企图攻破一点，然后再扩大阵地。他们集中火力和兵力，向第25师正面阵地日夜进攻，但是由于该师官兵英勇抵抗，阵地始终没有被攻破。日军只好转而攻击第2师阵地，攻击的目标是大小刘庄，日军每天拂晓，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刘庄猛攻。第2师的勇士们避开日军的炮火，后发制人，用迫击炮专打日军的步兵，打得日军死伤甚多。日军的白天进攻遭到打击后，又变换战术，采取夜间接近，但很快被我军发觉。心有不甘的日军后又在黎明时分趁我军早餐时发动进攻，但均被我守军识破而没有得逞。最后，日军潜伏于麦地里构筑工事企图再犯，第2师利用夜袭破坏其工事，并把他们歼灭。

郑洞国率领第2师在连防山一带坚守战斗20多个日夜，尽管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很大的杀伤，可是自己伤亡也过半。进入5月，由第2军李延年部接替，郑洞国率第2师向徐州集结，完成了在台儿庄地区的作战任务。

黄埔“独臂将军”第一人刘畴西

(下)

□ 陈宇

风雪弥漫怀玉山 回不去的赣东北

1934年底和1935年初的交汇点，也正是红10军团凄风苦雨的最后日子。

红10军团出师不利，损将折兵，北上已无可能。1935年1月初，仅剩3000余人的红10军团余部改向皖浙交界的浙江境内行动。1月9日，红10军团在途中的浙江省遂安县（今淳安县）中洲镇茶山村紧急召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

茶山村是一个跨两省（浙江、安徽）三县（浙江淳安县和安徽的休宁县、歙县）的山区小村落（2007年由原泰厦村和茶山村合并为厦山村）。几十户人家聚居高山半山腰，一条千年古道从村中穿行而过。

军团参谋长粟裕在会上极力主张，要摆脱困境，应当立即分兵，改变大部队集结状况，将正规军转为游击队、正规战转为游击战。并提出，由他和政治部主任刘英率红19师到浙西南活动；方志敏率红21师到赣东北苏区坚持斗争；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率红20师留皖



/ 红10军团怀玉山突围战斗经过要图。

南作战。然而，军团长刘畴西担心兵力分散，更难打破敌重兵“围剿”，坚持全军返回闽浙赣根据地，先休整，再分兵。

方志敏最终采纳了刘畴西的意见，率部南下，由浙江省开化县中村、杨林，到江西省德兴县港首、程家湾，从古井头返回赣东北苏区。由于缺乏情报，方志敏、刘畴西并不知道，此时敌人已经在他们南返的路上布下了多道封锁线。

1月10日，红10军团从茶山村出发，由此离开皖南。方志

敏、粟裕率800余人先行，刘畴西与继任红19师师长王如痴率军团主力殿后。1月12日，红10军团先头部队前进到开化县杨林镇，这里距离赣东北苏区很近。有人认为到此地已经相对安全了，请求休息，被粟裕断然制止。粟裕认为还没有通过封锁线，坚决不同意休息。在粟裕的坚持下，部队踏着冰碴和积雪继续行军。

粟裕的担心是对的，其实他们由杨林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敌人重兵包围圈。后来，在东自杨

林镇附近的南华山，西到古井头（古圳头）、陇首村、金竹坑（今金坪村）一线，红10军团在近百公里的行军途中，遭到20倍强敌的围追堵截，敌人的包围圈正在形成。

1月13日，红军先头部队在杨林镇西南约10公里的徐家村与敌浙江保安第5团交火，这里正处在浙赣交界线上，此战是红10军团在浙江境内最后一战。徐家村之战，歼敌18人，红军牺牲7人、被俘29人，失步枪24支。

1月14日，红10军团经仍属浙江省开化县的王山村，到朱浆坞宿营，这里已属江西省德兴县境内。15日，红10军团到达港首村。此地临近赣东北苏区边缘，敌第289团、补充第1旅已经在这里布置了夹道封锁线。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白区群众基础薄弱，给养补充困难，加之地形不熟、敌情不明，红10军团在回师闽浙赣边的途中损失甚大。方志敏记述说：“大家都已走的筋疲力竭，同时又买不到米煮大锅饭吃，各人找到了一点儿米，就各用洋瓷缸煮饭吃，这样就更造成队伍的涣散，而无法指挥。这时，真是到了弹尽粮绝人疲乏的地步，队伍差不多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港首村之战，红军被俘50人，失轻机枪1挺、步枪25支。

红10军团在港首村附近被敌人阻断成了两截，首尾不能相接。先头部队800余人由方志敏、粟裕和红19师师长乐少华、政委刘英率领；后面的主力部队此时还剩约2000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

粟裕深知形势险恶，必须赶在敌人包围圈合拢前冲过封锁线，越靠近赣东北苏区越安全。他将先头部队编成3个战斗连队，在荒山野岭中疾速前进。从港首村经长棚、源头、陈家湾、港头村，于16日晚到达程家湾，粟裕这才下令休息。这时，他最担心的是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来。

走在后面的刘畴西显然疏忽大意了，他见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决定在港首村暂且休息一晚后再行军。港首村距程家湾10余公里，粟裕对方志敏说：“情况这样紧急，绝不能再延误，部队今天晚上必须通过封锁线。”这时，敌军刚完成防线部署，立足未稳，况且在夜幕中不清楚红军有多少人，不敢贸然走出阻击阵地。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一面写信通知刘畴西抓紧时间跟上来，一面让粟裕带先头部队先走。粟裕心里很不踏实，建议由方志敏亲自回去劝说刘畴西率部连夜通过封锁线。

当晚，粟裕、乐少华、刘英依依不舍地与方志敏握别，

谁知这竟成了他们与方志敏的永别。“程家湾惜别”后，粟裕立即率部南行。突围中遇到敌人阻击，粟裕兵行险着，只派出了两个班的战士迎敌，集中所有轻重武器同时开火，虚张声势佯攻，掩护部队突破封锁线，进入赣东北苏区。

刘畴西接到方志敏的手令，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仍坚持在港首村停留一晚再走。慈不掌兵！刘畴西的这番不忍心和迟疑，贻误了战机。当方志敏返回与主力会合后，仍没有说服执拗的刘畴西。

1935年1月16日夜，铭刻在红军历史上。风雪弥漫中，红10军团主力被包围在浙赣边界纵横10余公里的怀玉山区，敌军第49师、第21旅和浙江保安纵队等共有14个团的兵力尽数赶到，围成了铁桶阵，这里成为红10军团主力的最后战场。

同是这个时间，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展现出新的曙光。历史的大开大合中，惨烈的“怀玉山血战”在这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展开。

军团长刘畴西指挥部队反复冲杀，浴血苦战。16日，红19师、红20师在引浆村与敌第41团激战，红军被俘128人，失轻机枪1挺、步枪85支。17

日，红 21 师在刺窝与敌补充第 1 旅激战，歼敌 25 人，红军被俘 362 人，失轻重机枪 6 挺、步枪 281 支，红 21 师解体。18 日夜，红 19 师、红 20 师向金竹坑发起突击，碉堡里的敌军火力异常猛烈，冲在最前面的刘畴西不幸被击伤仅有的右臂。在被俘后的照片中，他用白色绷带包裹的右臂尤为扎眼和令人心酸。

方志敏后来记述道：“我们决定通过金竹坑的封锁线，这是一个生死关头！这次如果通过去，队伍可以保存，不致损失；但当时，我们对被敌包围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没有下最大决心，硬冲过去。在金竹坑敌人打枪拦阻之下（敌只一排人），仍旧折回，这就算是决定了我们的死命！”（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或许是刘畴西的这次重伤，挫伤了部分指战员从正面继续突围的斗志，他们作了缩回原路的选择。刘畴西率红 19 师、红 20 师余部从金竹坑经玉峰村向东退去。1 月 19 日，他们在云盖峰东侧的玉山县八礑（今简写为八际）作最后一次突围未成，红军被俘 165 人，失轻机枪 4 挺、步枪 152 支，被迫退回怀玉山防守线内。

1 月 21 日至 23 日，红 19 师、红 20 师余部在冷水坑、马山遭

到敌第 291 团和第 294 团的围堵，红军被俘 1127 人，失轻重机枪 18 挺、长短枪 569 支。此役是红 10 军团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冲杀出的红军从八亩村经三亩村退往分水关。坚持到 1 月 25 日，在三亩村、葫芦坑之东约 2 公里的王家坞附近，红 19 师、红 20 师残部被敌补充第 1 旅包围击溃。红军被俘 445 人，失迫击炮 4 门、轻机枪 2 挺、步枪 148 支。王家坞之战，是红 10 军团残部成建制在怀玉山区的最后一战。

刘畴西、方志敏率红 10 军团主力的最后战地八礑、王家坞、分水岭，就在今日三清山风景名胜西麓山脚下。

对此，方志敏记述：“第三天，我们就在八礑、分水岭之间被围。开始，我们分兵抵御八礑来堵我们之敌及怀玉山来追我之敌。激战 5 小时，八礑之敌几次冲锋都击退了；怀玉山之敌没有击退，冲上来了，我军向另一条路退走时，敌 49 师又从三亩、八亩地方拦头打来。”已经失去战斗力的红军残部，四处躲进树林。“晚间，我站在山头大声叫喊，并烧着两堆大火，喊藏躲着的红军出来，被我喊出 80 余人。其余，因疲劳过度又饥饿无力，都睡着不起来。次日，敌四处搜山，所有躲在树林里的战斗员，大部分搜了出来。就在那一天被俘去 800 余人，缴去枪

400 余支。”（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第 95 页）

怀玉山区山脉纵横，主峰云盖峰海拔 1538 米，峰险壁峭，沟深路窄，人烟稀少，食物更是罕见。寒冬腊月，冰冷刺骨，红 10 军团残部在山区内如作困兽之斗，意义已经不大。于是，刘畴西与方志敏商议：只有分散突围，也许能多活几个人。1 月 26 日拂晓前，他们向来路即粟裕带队突围出去的程家湾、古井头方向撤退，显然是寄希望于这个方向上的敌军薄弱，并或有部队接应。

刘畴西、方志敏在突围中走散。重伤的刘畴西行动不便，便与同行的红 20 师参谋长乔信明等人说：“不能拖累你们，你们突围走吧。我不愿当俘虏，给我一枪吧！”乔信明回应道：“老刘呀！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共产党员。我们绝不能丢下你不管，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

敌人地毯式的大搜查更加密集。刘畴西在突围中因饥寒交迫、伤势发作，几次昏迷。这天夜里，刘畴西在程家湾附近被敌人发现并抓捕。

1 月 27 日 8 时，在德兴、玉山两县交界处从高竹山铜钱坑到枫树岭陇首村北的山道上，方志敏被抓捕。他被押送到敌营部，再押解到陇首村敌团部，在这里得知刘畴西已经被捕。



/ 刘畴西被捕后的照片。

伸硬脖子挨一刀 捷报飞来当纸钱

1月28日，刘畴西、方志敏等被用绳子绑缚分批押解到玉山大水坑敌旅部集中。1月29日，敌人使用脚镣手铐，将他们关在装甲车里送上饶国民党第8军军部暨赣东“剿匪”总指挥部。刚到上饶的这天晚上8时，方志敏草草写了240余字的《自述》，“以免他们问东问西的讨厌”。他们在这里被关押了3天4夜，多次被劝降、审讯和示众。2月2日晨，被押送南昌。

1935年2月3日，江西《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南昌二日电 赵观涛押解匪首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曹仰三（山）等四人，用装甲车四辆，二日晨七时由上饶解省，于下午四时半抵达。方匪等迳解赣绥署军法处，



/ 刘畴西(左)、方志敏(中)、王如痴在被捕后的合影。



/ 江西《中央日报》上刊登方志敏、刘畴西等被捕后押送南昌的消息。

赵观涛旋亲赴顾祝同宅谒见，报告歼灭方匪经过。”

关于刘畴西、方志敏的被俘时间，多年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主要有方志敏1月29日被

捕之说，其实这是忽略了他们被捕后依次被押送到敌营部、陇首村敌团部、玉山大水坑敌旅部的时间。刘畴西、方志敏被押解到上饶敌军部的时间，方志敏

在《自述》中署明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九日晚八时”，由此即可前推。本文依据档案文献资料和考证，作如上说。

刘畴西被俘后，由于他是黄埔1期毕业生，曾任黄埔同学会总务科长，特别是在东征中棉湖之役的断臂英勇表现，让蒋介石产生了爱才之心。他嘱咐部下极力争取刘畴西，特意让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时任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第五次“围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出面劝降，企图用师生之谊感化刘畴西“归诚”，为国民党效力。刘畴西丝毫不为所动，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背叛革命，在生死抉择间，他一如既往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方。

专事负责闽浙赣皖边“追剿”红军的总指挥、国民党军第74军军长俞济时，与刘畴西同是黄埔1期毕业生，在得知刘畴西被俘后，马上提出会见这位黄埔老同学。当身着破烂单衣、冻得瑟瑟发抖的刘畴西走进第74军前线指挥部时，正在烤火的俞济时连句客套的话都没有，直接进行劝降。刘畴西虽然饥寒交迫，但仍义正词严地加以拒绝，这也惹恼了俞济时，直接让人把重伤的刘畴西拖了出去。

一些黄埔同学都觉得俞济时如此无情的做法有些不地道，应当有点人情味。黄埔1期同学黄维曾气愤地当面质问俞济时：

“天寒地冻的，我们大家一场，你怎么也该给他吃顿饱饭，穿一件棉袄。”黄维的这番黄埔同学情谊论，在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响。

1935年1月底到2月初，在刘畴西从怀玉山、上饶，再到南昌被押解的路上，劝降的人纷至沓来。有国民党军第43旅旅长刘振清、玉山县县长王振寰、弋阳县县长张抡元、南昌行营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等，仅顾祝同就亲自劝降了3次，一些担任要职的黄埔同学也纷纷前来狱中探望、劝降，但刘畴西都不为所动。世人可以责怪他在最后的战斗中骄傲轻敌、犹豫不决，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始终令人敬佩。

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刘畴西与方志敏、王如痴、曹仰山等被囚于一室，由于是看守所的“要犯”，都被戴上了10斤重的脚镣。

刘畴西入狱后，右臂枪伤未愈，又患上了伤寒，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但他仍坚强地与敌人作斗争，挫败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他还曾积极策划越狱，因敌人看守严密，未能成功。

方志敏在狱中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事》等著作中，多处记载了他的战友“田寿”或“畴”与敌人进行不屈斗争的英雄事迹，这位战友便是始

终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刘畴西。

一天晚上，刘畴西又被提审了。狱警对刘畴西说：“你是黄埔1期生，蒋委员长很器重你。你原来的那只假肢还是委员长批款给你装上的。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失败了，何必固执呢？”

刘畴西义正词严地回答：“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不要希望我给你们办任何事情。”

狱警狡黠地劝道：“对你直说了吧，上峰要重用你呀！不然，为什么还留着你不杀呢？再说，你们的主义也不见得会成功，即使成功，恐怕也要等500年。你何必这么傻，为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去拼命呢？”

刘畴西坚定地回答：“共产主义的实现，谁也不可能阻挡。”

狱警气得号叫起来，威胁说：“经我的手判决枪毙的，连我自己都无法计数了，你也要放明白点！”

刘畴西听罢哈哈大笑，昂起头来，大义凛然地说：“你能砍下我的头颅，但你能动摇我的信仰吗？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

刘畴西、方志敏等在狱中毫不畏惧，坚持斗争，使得敌人无计可施，不得不在报纸上特别点名：“刘、方二匪，则至死不悟，倔强异常……对匪军内

部情形，不愿吐露。”

刘畴西自知必死，心里很坦然，有时还在囚室里下象棋。他对方志敏等人说：“死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什么时候死，我不知道，因为生命已经握在最凶恶的敌人掌心。”说到这里，他使劲地伸出脖子，斩钉截铁地说：“脖子伸硬些，挨他一刀！临难无苟免！”

刘畴西等在被关押的6个月中，敌人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诱降也遭到了失败。于是，蒋介石下达了“秘密处死”的手令。

刘畴西与方志敏、王如痴等一起兵败被俘，又一起走上刑场。

1935年8月6日凌晨，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打开牢门，方志敏、刘畴西等被押往南昌市百花洲下沙窝的秘密刑场。他们拖着沉重的铁镣，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大义凛然。刘畴西与战友们连声高呼：“中华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一阵排枪之后，左臂衣袖空荡、右臂因重伤用绷带挎在胸前的刘畴西，饮弹扑倒在地，英勇就义，时年38岁。

刘畴西参加过五四运动，1922年入党，黄埔1期毕业，东征时失去左臂成为“独臂将军”。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中



/ 厦山村的红军壁画。


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之一，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多次反“围剿”作战中屡建战功，后任军团长。如此经历，在红军将领中堪称翘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沙县人民政府为刘畴西家送上“伟大英烈”的金字牌匾，以褒扬刘畴西的光辉业绩和精神。在长沙烈士公园革命烈士纪念塔内，陈列着刘畴西的遗照和事迹简介。

为纪念英烈刘畴西，原望城县靖港乡曾改名为“畴西乡”。刘畴西只有一个女儿，遗孀后来过继了一个儿子，名叫刘应华。刘畴西的女儿远嫁岳阳汨罗市，



/ 栗裕之子栗戎生题写的“红色茶山”石碑。

继子刘应华仍留在金星村。刘畴西在家乡留下的遗物，有一张黑白照片、一盏马灯和一只皮箱。2016年，在距长沙市区约40公里的靖港古镇芦江社区，刘畴西故居修复后对外开放。

万里赴戎机 淡定度晚年

——黄埔抗战老兵王金生忆往事

□ 顾少俊

黄埔抗战老兵王金生，出生于1922年，现住山东沂水。

万里行路入黄埔

1938年2月，沂水沦陷，日军到处抓捕民工在县城周围修筑碉堡。碉堡修好后，日军担心这些民工泄露军事秘密，就给他们打致命毒针。一天，被日军抓去修碉堡的邻居朱秋林毒发身亡，眼看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伏在朱秋林尸体上痛哭，王金生内心充满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3月，王金生听说山东省政府在沂水县西北东里店收容失学青年，他赶到东里店，见到省主席沈鸿烈。沈鸿烈鼓励学生到成都报考军校，学好本领，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听了沈鸿烈的讲话，青年学生们踊跃报名。经过省政府的甄别考试后，王金生获得了去成都报考黄埔军校的机会。当时，山东各县城都有日军。沈鸿烈派人护送学生们过青州后，怕目标太大引起敌人注意，只好将他们分成一个个小组行动。王金生这个组5个人，刘光欣年龄最大，任组



／ 王金生。

长。

有一次，在枣庄境内，王金生他们碰到一伙伪军。领头的伪军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刘光欣说：“我们走亲戚。”随即说出一个大汉奸的名字，便被放行了。事后，王金生才知道，刘光欣在路上看到一个告示，随即记住了告示下面一个大汉奸的名字。

一天晚上，他们路过一栋房子，里面没有人，但有床和被子，他们太困了，就睡到床上。第二天早上，王金生嗅到一股臭味，这才发现隔壁房间里有一具死尸。路上，一个老百姓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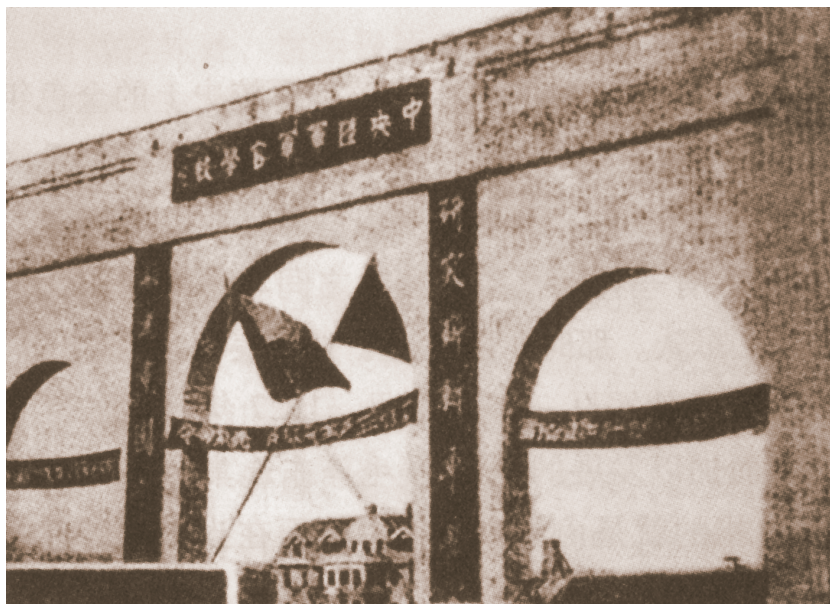
他们，这一带闹饥荒，饿死好多人。一开始，村里人死了，还有人将他们抬出去埋。后来，再有人饿死，就没有人管了，因为活着的已经饿得抬不动了。王金生问：“地里收的粮食哪去了？”那人说：“全被鬼子抢走了。”王金生听了，更是坚定了考军校学本领杀日本鬼子的决心。

经过兰考铁路时，日军碉堡上的探照灯来回不停地照射。刘光欣趁探照灯的光束过去时，赶紧带着大家跑。谁知，探照灯晃了一下，又照了回来，5个人顿时暴露在灯下。日军碉堡上的枪响了，两个同学被击中倒在王金生旁边，王金生一个踉跄滚落到铁路下面的壕沟里，侥幸逃过一劫。

好不容易走到了河南境内，但由于蒋介石以水代兵，6月刚下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开封以西全被黄河水覆盖，无法通行。王金生他们犯了难，这时他们碰见一支国民党部队，刘光欣拿出沈鸿烈开的证明，请求帮忙。部队长官看过证明后，派船送他们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们找到山东省政府驻洛阳办事

处休息了3天，然后由办事处的人安排他们乘火车到陕西宝鸡。由于宝鸡到成都的铁路被日军飞机炸坏了，他们只能步行。但好不容易到了绵阳，却又被通知军校暂时不招生，让他们先在绵阳六中上学，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等待。

1940年春，听说黄埔军校第17期招生，报国心切的王金生坐不住了，赶到成都报名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后，王金生被录取并编入步兵科学习。



/ 黄埔军校(成都时期)校门。

宁玉碎、勿瓦全的刘茂恩

1942年春，王金生军校毕业后分到第9军辎重团2营5连，先后任排长、连长。第9军隶属14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打仗不但有计谋，而且不怕死，参加过太原会战、中条山战役等，在军中威望很高。1943年，第9军奉命调往灵宝阻止日军过黄河。那时，日军飞机经常轰炸黄河。有一次，王金生押送一批物资去前线，突然飞来几架日机。王金生立即命令士兵下车隐蔽，但还是躲避不及，只见日机俯冲扫射，然后扔下炸弹，当场炸死士兵12人、炸伤3人。

1944年初，王金生调14集团军军部，任刘茂恩的少校侍从副官兼参谋。王金生调军部不久，日军攻打洛阳，刘茂恩率部抵抗，指挥部设在洛阳外一

个小山村里。战斗打响后，指挥部里立即忙了起来，王金生帮助刘茂恩处理各部队发来的战报和电文，并及时传达刘茂恩的一道道指令。战事最危急的那几天，王金生陪刘茂恩几天几夜没有出过屋、合过眼。

日军动用飞机、大炮、坦克、骑兵、步兵日夜攻击不止，刘茂恩的部队伤亡惨重，指挥部被迫退入城内，最后被日军包围在洛阳城太庙路一块很小的区域里。

中午，军部通讯员费晓华报告：“刘司令，指挥部周围全是鬼子。”话音刚落，一颗重磅炮弹直接命中指挥部上面的掩体，随着一声巨响，泥土“哗啦啦”地被震了下来，落在刘茂恩办公桌的军用地图上。刘茂恩抬起头，问警卫营长宋辉：“手上还有多

少兵？”宋辉说：“1连在洛阳中心街阻击，我刚从那里回来，他们那个连伤亡过半。2连、3连分别防守指挥部两翼，伤亡也不少。”

刘茂恩说：“收缩阵地，晚上突围出去！”“是！我这就去准备。”宋辉敬了军礼转身出去，刘茂恩低下头，继续看地图。宋辉回头向王金生使了个眼色，王金生点点头：“你放心吧！”王金生刚调到刘茂恩身边，宋辉就向他介绍刘茂恩的秉性，还给他讲了刘茂恩在中条山战役中的事。当时，刘茂恩的指挥部被日军包围，宋辉发现一条小路可以突围，劝刘茂恩夜间穿便衣逃出。刘茂恩不同意：“我堂堂国军司令，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可换便衣偷生，让倭寇耻笑。”日军敢死队快冲到指挥部时，刘

茂恩不愿做俘虏，欲拔枪自杀，被宋辉死死抱住。后来，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刘茂恩侥幸脱险。所以，王金生明白宋辉给他使眼色的意思，那是让他保护好刘茂恩。

是夜，宋辉将警卫营还能战斗的150多名官兵分为3组。宋辉带50人的敢死队打头阵，每人携带手榴弹、轻机枪和冲锋枪等武器。第2组保护刘茂恩及司令部文职人员，第3组断后。宋辉带队悄悄抵近西门日军阵地前，一声令下，50个敢死队员同时把自己手中的4颗手榴弹全部扔出去。硝烟未尽，50名敢死队员呐喊着向前方冲去，轻机枪和冲锋枪组成的交叉火力在日军包围圈上撕开了一个口子，第2组士兵保护刘茂恩疾走，前面就是城门口了。

这时，城墙上日军的机枪突然响了，敢死队员倒下了一片，刘茂恩身边也栽倒五六个士兵，王金生紧跟刘茂恩，尽量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茂恩。刘茂恩火了：“敢向老子开枪！”随手拿起身边一个士兵手中的轻机枪，推开挡在前面的王金生，对着城墙上的日军打出一个长点射，日军的机枪哑了。

刘茂恩一行刚走没几步，“哒哒哒……”城墙上又冒出一个日军火力点。“卧倒！全体卧倒！”宋辉回头大声吼叫。“谁还有手

榴弹？”一个士兵递给宋辉3颗手榴弹。宋辉用绑腿布捆好，匍匐前进一段后，突然从地上跃起，手中的集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径直飞到城墙上日军机枪手的头上，随着一声巨响，前进的道路打通了。突围出来的部队在内乡县丹水镇集合。

想念战友徐泽滨

1944年底，刘茂恩任河南省主席兼河南省警备总司令，王金生负责保管他的大印。1945年2月，日军欲攻占四川，计划先占领老河口。蒋介石命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死守老河口。刘峙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参会人员有驻河南南阳的刘汝明、陕西的胡宗南、一战区司令长官范汉杰，还有刘茂恩。

刘茂恩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带着王金生和一个中校从丹水镇开车过去。大家到达老河口，刚进会议室，防空警报响了。刘汝明建议转到南阳开会，刘峙同意。路上，日军飞机追着车队轰炸。刘茂恩说：“小鬼子鼻子怎么这么灵，肯定有内鬼。”转身对王金生说：“通知密电组3天内破案。”刘茂恩手下密电组里有几个得力干将。老河口战役正式打响前，刘茂恩破获隐藏在老河口的日军秘密电台。王金生在缴获的一张日军地图上看到，我军指挥部、弹药库、炮兵阵地等的

位置被标注得清清楚楚。看来这伙日军在老河口潜伏很长时间了。

老河口战斗打得非常惨烈。王金生的同学徐泽滨营长守马山口阵地。白天阵地被日军抢去，夜里徐泽滨组织敢死队再把阵地夺回来。马山口阵地反复易手。一天，由于刘茂恩指挥部通往各师团的电话线被炸断，王金生奉命到前线送信。路上，王金生看到两个老百姓抬着一副担架，走得很匆忙，后面一个士兵还在不断地催：“快走！快走！”王金生问：“谁负伤了？”“守马山口的徐营长。”王金生赶紧上前，士兵告诉他，徐营长是在白刃战中负伤的，徐营长捅死了两个鬼子，但被第三个鬼子从背后往他腰上捅了一刀。徐泽滨微微睁开眼，看着王金生，有气无力地说：“我对得起国家，死而无憾……”王金生摆摆手，不让他讲话，转身对士兵说：“战地医院在前面不远，你们赶紧过去。”

战后，王金生碰到战地医院的一位医生，他告诉王金生，徐泽滨因伤势严重，后来转到西安陆军伤兵医院抢救了。此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徐泽滨的消息。

在军校，徐泽滨和王金生住同一个宿舍，关系很好。有一天晚上，学校组织看电影《文天祥》。看完电影回到宿舍，徐泽滨对王金生说：“我要向文天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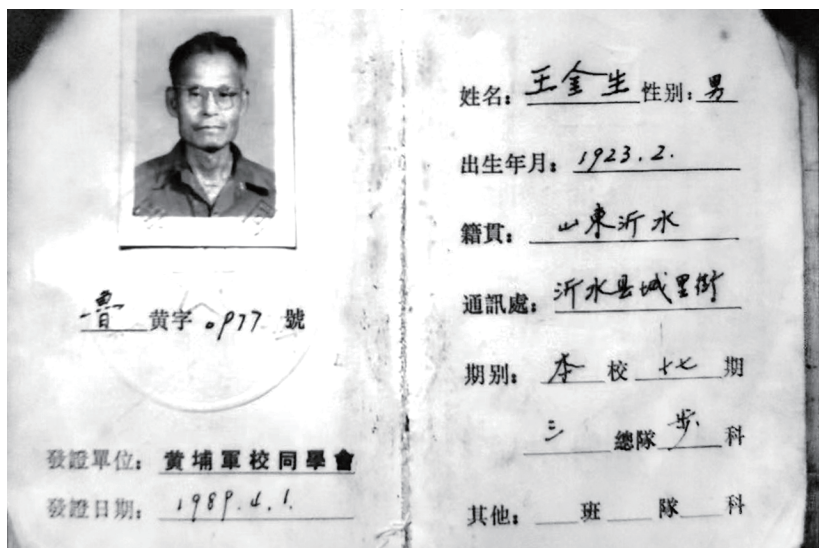
学习，将来如果战死沙场，拜托你照顾我的父母。”

王金生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一直牢记徐泽滨的嘱托，此后也一直在寻找徐泽滨及其家人。2015年，王金生还曾在《黄埔》杂志上登过“寻人启事”，打听徐泽滨的下落，但至今没有音讯。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49年，王金生考取开封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分到开封市第十二小学任教。王金生课讲得好，所教班级学生的平均成绩总是全校第一，校长和学生们都喜欢他。

同事曹某妒忌他，给公安局写信检举他在抗战期间强占民房和拉壮丁。公安局找王金生谈话，了解情况。王金生说：“当时军情紧急，确实有过强占民房之事。”再问他“拉壮丁”的事，王金生说：“拉过几次壮丁，洛阳保卫战期间，我是刘茂恩的少校副官，那一仗，洛阳城里伤亡过万，外围阵亡的官兵更多，不拉壮丁，没法打仗。”王金生被判刑入狱。为了不连累家庭，他主动与妻子离婚，儿子、女儿被王金生的哥嫂带到沂水抚养。后来，王金生的儿子去阿勒泰打工，在阿勒泰因煤气中毒身亡。服刑期间，他立了两次大功。一次是农场失火，王金生



王金生的黄埔会员证(出生年应为1922年)。

奋不顾身从危房中救出农场负责人8岁的女儿；还有一次是夏天暴雨导致涨水，王金生积极抢运粮食。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下午，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到王金生家。王金生一看，是当年给公安局写信的曹某。曹某见到王金生有点尴尬，断断续续地说：“这些年，我一直打听您的消息……最近，听说您回沂水了，特地过来看您……”

王金生听说曹某是从开封坐火车到临沂，又从临沂乘汽车赶过来，赶紧让女儿给他准备吃的，自己忙着为他收拾床铺。第二天，曹某从包里掏出一沓钱要留给王金生，王金生拒绝了，曹某感到愧疚，拉着王金生的手，声音颤抖：“当年我不应该给公安局写信，害得你家破人亡。”王金生摆摆手，话语平

和：“如果是现在这个时代，你的那封信也不会使我坐牢。那是个特殊时期，没有你的那封信，我可能也会因政治身份坐牢。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人要往前看！你以后可以常来玩。”王金生真诚地留曹某在沂水住了几天。曹某眼中含泪：“今生能认识您这样的朋友三生有幸啊！”

后来，曹某每年都到沂水住上几天。王金生的女儿一直奇怪，父亲怎么会有这么重情重义的朋友？曹某去世后，王金生的女儿才慢慢知道他和她父亲之间的故事，她为父亲博大的胸怀而自豪。

谈起这件事，王老问我：“你听说过曼德拉吗？”我说：“我知道您要讲什么。”王金生接着说：“告别仇恨最佳的方法是宽恕。”

张光荣所经历的滕县保卫战

□ 赵凤玲

1916年8月29日，张光荣（原名张廷荣）出生于四川苍溪县槐树驿张家沟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中共有兄弟5人。1931年，由于生活无着，被迫由四叔儿子张天骥介绍，为四川平武县一个法官太太照顾小孩，张光荣坚决不干，决心回家种田。在回家途中的三台县，他看见国民革命军29军教导团学生队招考学生，立即报名并考入29军军事教导团学兵队步兵科学习。

1935年，他又考入了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1期。毕业后，张光荣被分配到川军第22集团军41军124师372旅744团炮兵连任少尉排长。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抗战拉开了序幕。10月，张光荣随部队开赴山西太原，在正太同浦铁路沿线集结。日军向太原进攻时，张光荣随部队在晋东北一带（山西省平定县以东）与日军作战，因作战有功，不久升为中尉排长。

1938年，张光荣任41军124师372旅743团82迫击炮连（4门迫击炮）（配属一个步兵连）代连长。2月，日军进犯山



1949年12月参加起义的张光荣。

东，南渡黄河。为了防止日军南进攻徐州，张光荣所在的第22集团军第41军（下辖第122师和第124师）被调至滕县御敌。接到命令后，大家马不停蹄地奔赴前线。第22集团军属于川军，部队的装备非常落后，主要是四川土造的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土造的机枪。兵额也不足，川军原本就属于乙种军的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加上第22集团军在晋东战场上同日军作战时已伤亡过半，所以，他们到达滕县时，集团军的总兵力不超过两万人。到达滕县后，122师师长王铭章被

任命为第41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2师和第124师。王铭章临危受命，抱定以死报国之心，激励将士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破败的武器，担当了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不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

1938年3月初，占领邹县的日军分数路沿津浦路东西两侧向南进犯。同时，济宁的日军向太平桥、大岗进犯。124师372旅743团奉命跑步赶到滕县西北微山湖东岸的池头集，占领池头集正北石墙附近横亘东西的石头山。张光荣和他的战友们阵地尚未部署好，敌人就急速发起进攻。敌人先以飞机轮流轰炸扫射，数十门火炮不断炮击，再以步兵进攻。张光荣他们除用步枪射击外，就靠手榴弹居高临下向冲锋的敌人猛烈轰炸，炸得敌人死伤累累。敌人发动10余次冲锋都被打退，743团官兵伤亡很大。

正当双方在池头集以北激战时，敌人的主力沿津浦路南攻占两下店、白沙河、刘庄，直

逼滕县北郊，与守城部队发生激战。

15日黎明，滕县城北各主要阵地虽然遭到日军多次进攻，由于各守军顽强固守，各主要阵地均牢牢掌握在中国守军手中。日军见在正面阵地很难突破，便改变战术，以一部分兵力将中国守军主力紧紧吸引住，另以主力绕开正面阵地，直接进逼到滕县东北城下，战火很快迫近滕县城。

3月16日早上8时至下午5时，日军多次调集几十门大炮、十几架飞机分别向滕县城的东关、西关、南关、城内以及城西火车站实施密集轰炸。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经过一天的激战，终于保住了滕县城，但自身伤亡也十分惨重。王铭章知道日军占领滕县县城的贼心不死，而滕县城内的兵力已十分空虚，便决定将据守大坞一带的第370旅、第372旅调入滕县城内。第370旅、第372旅在回援滕县县城途中遭到日军阻击，经过猛烈冲杀后，终于于当晚10时，扫清了滕县西火车站附近之敌，由西关入城。

17日晨6时起，敌人由邹县用汽车拖来重炮10余门到达城北附近，开始最猛烈炮轰。一时间，尘土飞扬，硝烟弥漫，房屋倒塌，火光冲天。炮弹飞越空中的呼啸声、炮弹的爆炸声、



/ 日军第10师团赤柴部侵入滕县城。

轻重伤员的哭叫声连成一片，响彻天空。2小时炮轰后，敌人利用各种火炮掩护向城东南的城墙缺口冲锋，先头部队100余人冲入缺口。紧急关头，王铭章一面命令守城部队官兵坚守阵地，一面亲自指挥手枪连向冲入的敌人猛射猛冲，很快把冲入的敌人大部消灭，其余的赶出缺口外。

下午2时左右，日军见城东南难以突破，决定转攻正南门。日军首先集中几十门大炮轰炸南门，同时集中20余架飞机轰炸南关，南关的城墙几乎被夷为平地。守卫滕县城南关的743团的两个连，因掩体简陋，在敌

人的炮火下死伤过半，剩余部队已无法在南关存身，只好向西关转移。下午3时半，日军占领南城墙后，又相继占领了滕县城的东关、西关，最后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和他的幕僚随从无法在市街内存身，乃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与敌周旋。王铭章命令在他身边的师部特务连仅有的一个排，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之敌猛扑，想夺回西城门。但这个排尚未接近西城门楼，即全部被敌人的机关枪打倒。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王铭章此时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而且也没有招架之功

了。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王铭章迫不得已准备退出城，到火车站指挥124师372旅继续与敌搏斗。但他刚刚走到西关电灯厂附近，便被西门城楼之敌发现，随即遭到敌人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王师长和他的参谋长赵渭宾、124师参谋长邹慕陶以及随从10余人当场牺牲。敌人冲入城后，又向西南两门及城外街道、民房和火车站猛烈轰击，中国守军死伤惨重，滕县失守。

滕县保卫战历时三天半，毙伤日军2000余人，而张光荣所在的第22集团军牺牲7000余人。

虽然滕县保卫战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对台儿庄大捷却有重大影响。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临沂、滕县两役都是台儿庄大捷前最光辉的序幕战。”

张光荣率领突围出城的士兵300余人到达微山湖东岸的夏镇后，被同样从城内突围的124师372旅旅长曾甦元收容。

此时的夏镇，渔民几乎都坐船逃到微山湖中的小岛上，湖边看不见一条船，而湖宽三四十里，没有船根本过不去。旅长曾甦元命张光荣带两名士兵化装成渔民前往临城、韩庄侦察敌情。经侦察，临城、韩庄都有敌人重兵把守，沿湖地

区河汉纵横，地形复杂，部队通过非常困难。当此绝境，大家决定，每个人自己找横渡微山湖的渡湖工具。寻找过程中，张光荣和几名士兵忽然在湖边一间小房子内发现一位老人，即进门向老人问好。张光荣说：“老人家您好，您是夏镇的渔民吧？我们部队是从滕县战场过来的，现在我们的伤亡很大，滕县城已经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准备渡河到沛县去，可是湖那么大，宽几十里，水深浪大的，我们想请老人家帮忙找十条船，不管要多少钱一只，我们先交钱后上船。说话算数，绝不失信。”怕老人不信，他又告诉老人是旅长让他来找船的，可以请老人一同去见旅长，只要有船，旅长肯定会给钱。


老人听了，说：“老总们是从滕县来的，咱们听见成天成夜的炮声。最后你们打得很好！可是城被鬼子占了，请老总们放心，我一定给你们找到船，但是绝对不能收钱。”说完，老人便和张光荣等人一起来到了湖北边。曾甦元正坐在一间小屋门口，看见这位穿长棉袄、腰系布带的老大爷很高兴。经过一番交流，老人对旅长说：“走，叫船去。”老人在前面走，曾旅长和一大群士兵跟在后面。老人走到湖边一个土坡上，用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牛角，面

向湖面“嘟……嘟……嘟……”三声吹了两次，然后冷静地向湖而坐，收起牛角取出烟袋，装好烟丝吧嗒吧嗒地抽起了旱烟。

大约半个小时，老人用旱烟杆指着湖中说：“船来了。”

大家急忙向湖中望去，只见湖面上，由远到近、由小到大点点白帆从四面八方夏镇飞驰而来。转瞬间，夏镇湖边已靠岸大小渔船几十条。曾旅长高兴得把老人紧紧抱住，很久都不松手。

3月20日午后6时左右，大家临时组成班排连营，开始横渡微山湖，由老人同曾甦元旅长坐一条船领航。船到湖中心时，敌3架飞机凌空盘旋侦察，但是没有轰炸射击。大约晚上8时，到达西岸码头。上岸后，曾旅长招待老人，又设法凑够几百元钱请老人转发给船主。老人坚决不要钱，表示向旅长要些枪支弹药，准备以后在微山湖打日本鬼子用。曾旅长立即同意。午夜前后，大家与老人告别，向沛县前进。

后来，李宗仁视察川军，看见和曾甦元旅长在一起的张光荣（当时，他叫张廷荣），问过他的名字之后，感慨道：“半壁江山，廷何以荣？戮尽倭寇，吾族方荣！”并给他重新取名为张光荣。

父亲和母亲的情感之路

□ 边宏

1951年的春天，沈阳新民县城光明照相馆摆放着一张青年男女的合影，照片里的男士英俊帅气不失儒雅，女士文雅秀气透着贤惠。男士名叫边长泰，是黄埔军校第23期毕业生，来自县里大多数人都熟悉的老边家，当年街坊邻居过年所贴的对联、福字以及店铺开业所挂牌匾上的字大多出自边家人之手。女士名叫程慧英，来自一个经商家庭。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 1951年，边长泰的订婚照。

母亲每次提及与父亲的恋爱颇有些自豪。母亲告诉我，他们是在新民银行工作中相识。那时，母亲高中毕业，属于有文化的女青年，身边不乏追求者，是父亲身上特有的那股干练、坚毅深深地吸引了她，为此，18岁的母亲与20岁的父亲私定终身去拍了订婚照。

结婚后，为了让父亲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母亲做出惊人之举，由她工作挣钱资助父亲外出求学。在母亲的支持下，父亲凭借扎实的文化功底考入东北财经学院。4年后，父亲毕业留校（此时称辽宁财经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北财经大学）任教。那时，

我还未满周岁，母亲带着我来找父亲，由于学校尚处在建校初期，设施简陋，条件差，但终于可以和父亲团聚，有了稳定的家，母亲心满意足。记忆里，母亲是教职工大院里为数不多的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的职业女性。父亲回到家有永远看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家里的一切几乎都是母亲在操持。在黄埔同学圈子里，认识父亲的几乎都知道，他有个热情、开朗、勤劳、一心成就丈夫事业的了不起的贤妻。

20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我们一家人吃不饱饭，父



/ 1949年，边长泰的毕业照。

亲便学农民到校园外的山坡上开荒种地，至今还记得他挥汗

如雨耕作的情景。自6岁入学读书以来，父亲从未干过农活，一切从头学起还真是有些难为他。后来，他经常被邀请到校外企事业单位讲课，每次讲完课后，邀请单位会请他吃一顿晚饭。父亲自己舍不得吃，就带个小菜盒把好吃的带回来给我们，这也成为我们改善生活的小期盼。几十年后，母亲仍保留着这个小菜盒，对她来说，这是患难中见真情的物证。

母亲管教孩子严厉是出了名的。在这方面，父亲和她的态度非常一致，少有意见分歧。记得有一次，我贪玩回家晚了，不情愿地伸出手接受母亲打手板的惩罚。当我以乞求的眼光投向父亲时，父亲“视若罔闻”，以此告诉我错了就得自己承担后果。

“文革”时期，父亲的名字被列入下乡名单，母亲属于教辅人员本不在被下乡之列，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随母亲留在城里。谁知当母亲得知父亲被“下放”的消息后，她又一次做出惊人之举，竟然主动报名要求陪同父亲一起到农村去。下乡是别人躲都躲不及的事，母亲却主动申请放弃工作，带着3个未成年的孩子随父亲一起去农村，学校“军代表”求之不得马上批准。无奈，我们只得整理行装登上了去农村的卡车。记得全家落脚村里的第二天，行李还没有打开，母亲



/ 1956年，边长泰夫妇与作者(中)合影。



/ 边长泰在看书。

就带我们姊妹去办理入学手续。得知我们就读的学校太远，村里没有可结伴同行的学生，为了让我们继续上学，母亲立刻去公社找领导请求转到离学校较近的小队。下放初期，父亲天天劳动，精神压力很大，母亲极尽全力安慰他，并向当地政府举荐父亲。终于，一段时间后，父亲被委派到其他公社从事案头

工作，母亲带领我们担负起种菜、养猪、拾草、出工的繁重劳动。后来，我们提及此事时，仍有埋怨母亲自找苦吃的念头，可是母亲始终认为那虽然是“无奈之举”，但不可不为。父亲和母亲的老同事们提起这段往事时，对母亲当时与父亲共患难的举动都是赞不绝口。在母亲眼里，父亲就是她的天，为了父亲，她吃

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她好像为父亲而活着，这可能就是他们的爱情吧！

那段日子，父亲在家里尽量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有时候即便我们感觉到他在“强颜欢笑”，但也还是为我们带来了安全感。父亲与母亲相互理解和支持，相互关心和照顾，让我们全家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峥嵘岁月。如今回想起来，我打心里钦佩父母的感情，感谢父母的不离不弃，给予我们一个完整的家和此后的幸福时光。

改革开放后，父亲一方面施展才能，潜心教学著书，桃李满园，学术成果丰硕；另一方面积极参政议政，从区市政协委员做到全国政协常委，一干就是几十年，经常出现于电视、报纸等媒体。母亲依然默默无闻地在背后支持父亲，为父亲做好后勤工作，并把父亲的成就视为她的最高荣誉。

后来，父亲从教学岗位退了下来，也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开启了每天看书、读报、剪报、写读书笔记的晚年生活模式。尽管不再讲课，但父亲的读书笔记依旧写得认真有条理。晚年的父亲最关注的就是祖国统一，他为此去过台湾与黄埔同学会面。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的《海峡两岸》，与我们晚辈聊得最多的也




／ 2008年夏，边长泰夫妇在大连滨海路合影。

是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父亲家里兄妹7人，母亲家里兄妹8人，他们在各自家庭里都是排行老大，二人的结合是名副其实的两个大家族的结合。在双方家族三代人中，接受过母亲资助而完成大学学业的有几十人。如果说父亲教过的学生是桃李满天下，那么母亲资助过的亲友也是桃李遍家族。就在母亲离世前病重昏迷的10天里，每天到医院探望她的亲友是周边病人中最多的，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从外地赶来探望，这让照顾母亲的护士很是疑惑，想不出一位普通老人

为什么会这么晚辈牵挂和感恩。

母亲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此后，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常看着挂在墙上的母亲照片发呆。是啊！曾几何时，每每开会出差，是母亲帮他整理行装，目送他出家门；每每出差归来，是母亲做好一桌可口的饭菜迎接他回家。可如今，他和母亲阴阳相隔，怎不叫父亲伤心。父亲和母亲的情感之路，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大富大贵，没有惊天动地，有的仅仅是携手并行相濡以沫，共同走完他们平凡而又温暖的人生。 

晃耀后人 一生光明

——追忆我的慈父陈晃明

□ 陈正烈

我的父亲陈晃明——黄埔4期生陈毅安之子，勤勉豁达、奋进乐观，一生历经战乱与和平，曾被家人称作“晃先生”。父亲幼时跟随祖母南北奔波，即便战乱纷繁，但他都未曾落下学业。成家立业后，父亲一边专心搞科研，一边四方收集我祖父的各种资料。一生从未享受过父爱的父亲从不自怨自艾，他对国忠诚、对家负责、对朋友谦让温和、对后辈仁爱有加。

父亲是我辈永远的楷模。

没有父亲但从缺少父爱

父亲生于1931年3月，那时祖父陈毅安已牺牲沙场半年有余。父亲一生从未感受过父爱，但幸运的是他从不缺少父爱。尊敬的毛主席以及彭德怀、刘型、韩伟等众多与我祖父并肩战斗过的革命者，都给予了父亲和我们家很多的关怀和照顾。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骑自行车驮着儿时的我去彭德怀爷爷家的情景。和蔼可亲的彭爷爷与父亲促膝而谈，家国天下、家常里短中，父亲体味到了父爱的温暖。在刘型爷爷家里，我更是



/ 陈正烈与父母合影。

被“特殊照顾”，吃饭时，我的碗中常比别人多两个肉丸。而韩伟爷爷最喜欢我妹妹陈小毛，指导她练毛笔字，还为此奖励她不少荣宝斋的笔墨纸砚。

红色基因连起革命家庭。一件军大衣、一袋大枣、一包花生、两条鲜鱼，从吃穿到住行，祖父的战友们数十年如一日地用

无微不至的关怀感动着我们一家。一封无字家书是祖父留给父亲最后的纪念，而父亲却从祖父的战友们那里感受到了父爱和亲情，使他的一生虽没有父亲却从不缺父爱。后来，彭爷爷生病住院，彭爷爷的侄女彭梅魁、彭钢去医院探视时，父亲总会让我去商场买些茶叶、果汁、牛肉

辣酱带过去。

做一个好父亲

父亲对我们很少说教，更多的是身体力行。犹记得上学第一天，父亲弯腰俯身教我系鞋带，那时候的父亲头发黝黑，身材笔挺，年轻帅气。白驹过隙几十年，那一幕至今仍记忆犹新。

“文革”期间，父亲依然忙着研究计算机。他认为科研报国是自己的本分，不能浪费一分一秒。工作之余，父亲喜欢读三国，每天都会读两三个章回，读完就给我讲解。正因如此，我三年级就熟知三国故事，无形中拓宽了我的视野和格局。毫无疑问，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盛夏时节，热爱运动的父亲常带我去八一湖、运河野游。在夏日的蝉鸣中，我和父亲在清澈的水中相伴而游，欢笑连连。父亲游得极好，曾在寒冬时节陪伴苏联专家冬泳。后来他77岁时还能下水游泳。

父亲一生热爱学习，他的英语和数学都很好，俄语也非常了得，曾是苏联专家的授课翻译。小时候，我们兄妹三人的数学、英语都是他辅导的。后来，75岁的父亲还能辅导我女儿的英语和化学。时至今日，我仍难忘大学暑假期间，父亲伏案为我辅导数学的情景。不仅如此，父亲还通晓音律。“越南

中国，山连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每当听到这首《越南中国》的熟悉旋律，我脑海中就会浮现父亲带我在收音机前练习歌曲的情景。在多才多艺的父亲的教诲下，我成为初中、高中全班唯一的全优生。父亲眼睛近视，所以非常注意保护我们的视力，每当我们三兄妹在光线不好的地方看书学习时，他就强烈制止。至今，我们兄妹的眼睛没有一个近视的。

一生做好两件事

父亲一生忙碌的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科研报国，二是收集先烈故事。身为工程光学专家，父亲一生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国家的国防工业付出了全部的青春热血。

作为烈士遗孤，在祖母的教导下，父亲从小就深知身上的责任，经常帮祖母整理祖父的事迹资料。祖母故去后父亲更是将此作为重要工作。父亲通过搜集的一页页书信、一行行笔墨、一张张照片，在心中描摹故去的祖父画像，以此告慰祖父母的在天之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父亲接受完有关采访后，就感到身体渐渐衰弱，便把祖父留下来的54封信和第九号烈士证书交到了我的手上，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一代。



/ 陈晃明(右一)捐献彭德怀赠陈毅安的亲笔题词。

晚年幸福生活

我退休回京后，经常带父亲、母亲到处走走，全国各地的山水之间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和美好回忆。平日里，我妹妹经常在网上团购一些餐券，时不时组织我们大吃一顿，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儿时，父亲很喜欢将我驮在肩上，一边走一边指给我看沿途风景。从前门到新华门，父亲的肩膀是那样的厚实温暖。等我做了父亲，将女儿驮在肩膀上时，猛然发现父亲老了。而今，我也过了花甲之年，有心驮起外孙女却已力不从心，更是时常怀念当初被父亲驮在肩上的情景。

2022年12月3日21时59分，父亲病逝，享年92岁。人生须臾，恍若朝露。我的父亲，此生已别，心有万般不舍，唯愿来生还能做您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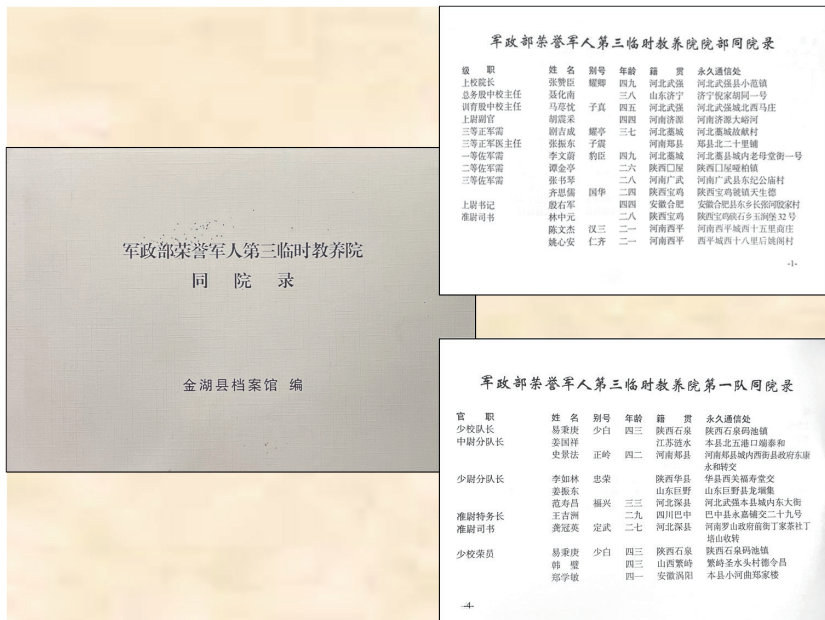
鲜为人知的宝鸡抗战荣誉军人教养院

□ 蒲元 王翀

自2022年第2期开始,《黄埔》杂志连续刊登了杨守礼、黄胜利伉俪关于抗战时期伤兵管理救助的系列文章。两位作者乃抗战将士之后,其父辈曾在抗战期间负责伤兵管理工作。文章既翔实可信,又饱含感情,令人印象深刻,收获良多。

凑巧的是,笔者最近也看到了一份与抗战伤残军人有关的史料。早在2015年9月,江苏省金湖县档案馆征集到一本1946年初编印的《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同院录》,当时这个消息并未引起笔者注意,直至不久前经友人提醒才发现,该同院录虽被征集于江苏,但这所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却正好位于笔者所在的陕西省。

经与江苏省金湖县档案馆联系,笔者得到了这本同院录的复制品,它记载了该教养院2448名因战致残将士和35名行政人员的相关信息。笔者感到,尽管这本同院录的内容只限于一地一院,但却能以小见大,成为杨、黄两位撰写的抗战伤残军人管理救助系列文章的一个很好注解,有助于《黄埔》读者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这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 《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同院录》(复制品)封面及部分内文。

这也成为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动因之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其艰苦卓绝而著称于世。抗战期间,中华民族为抵御外侮做出巨大牺牲,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记载,中国军队共计阵亡1319958人,负伤1761335人。事实上,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伤残军人收容、教养及谋生技能培训等问题就逐渐凸显,加强军队伤残问题的应对,成为当务之急。

有关全面抗战期间陕西伤残军人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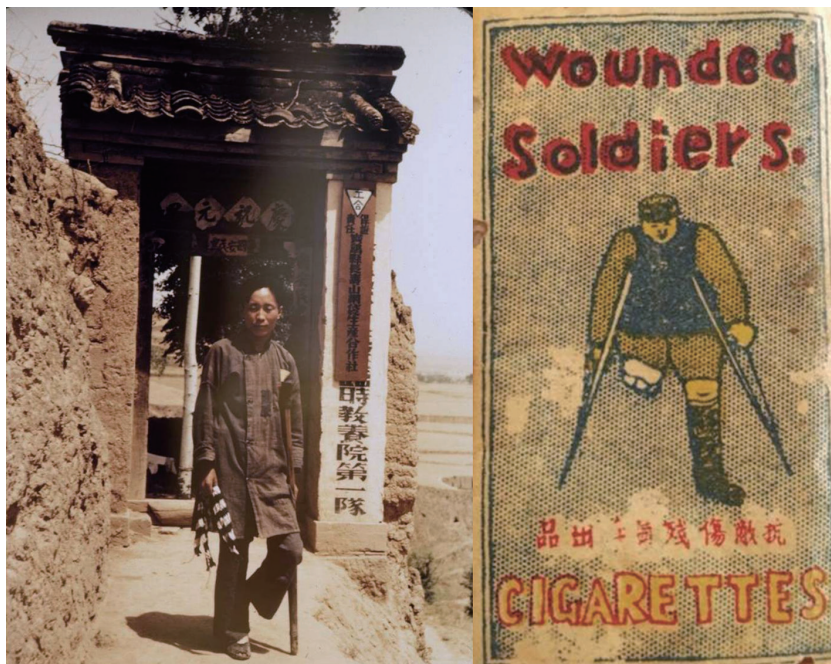
守礼、黄胜利向笔者提供了如下信息:“1937年10月,陕西党政军伤兵管委会成立,负责人董钊(黄埔1期),编制官佐6人,士兵13人;1938年7月起称西北伤兵管理处,编制官佐58人,士兵31人;1940年7月改组为陕西荣誉军人管理处,负责人李家鼐、李圻,编制官佐49人,士兵22人。”

在组建伤兵管理机构的同时,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通令大后方相关省市成立各类残废军人教养机构,负责收容教养那些因有残疾

而无法重返战场及劳作谋生的官兵。军政部残废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就成立于此时。教养院设院长1名，辖总务、训育、工艺股；另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派驻指导员1名。院机关位于宝鸡西大街城隍庙巷，下辖8个队，分驻城郊各地，其中长寿山牛头观是第一队驻地，也是目前该院旧址中仍有原建筑保存的唯一一处。

牛头观位于宝鸡西北紫草塬的长寿山畔，因山势状如牛头而得名。牛头观始建于元初，全真教七真之一马丹阳、明代高道张三丰均曾于此修道。将教养院设在位于西北大后方的陕西宝鸡，这不足为奇，但为什么会在建院之初，选择牛头观为其所辖首队的队址呢？

首要原因是牛头观地理位置优越。抗战期间，日军的空中力量处于绝对优势，对我军民造成巨大威胁，让伤残军人有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是重中之重。长寿山位于宝鸡西北台地，林木森森，牛头观依山而建，殿宇亭阁皆隐于山峦苍翠之中，隐蔽性极佳。同时，这里距位于宝鸡城区的临教院机关及陇海铁路车站，仅数里之遥，交通便利。其次，牛头观有庞大的建筑群可资利用。唐宋时期，牛头观的香火已颇为兴盛，之后规模不断扩大。至民国时，建筑群落包含了玉皇阁、东华阁、元帝殿、太极殿、



/ 一位荣誉军人站在第三临教院第一队门前(迈登斯夫妇摄)，其形象与当时伤兵牌香烟盒所画如出一辙。



/ 正在编织网兜的荣誉军人。(迈登斯夫妇摄)

韦驮殿、观音殿、大佛殿、镇江王殿等30多座殿宇庙廊，殿后山崖上还有吕祖洞、丹阳洞、药王洞、月光洞等。这为设立教养机构提供了基本的居住条件。

需要注意的是教养院名称的变化。最初，其名为军政部残废

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当时的中国社会，习惯用“残废军人”一词来称呼伤残军人。虽然词典里对“残废”一词的解释都是中性的，但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残废”多少带有一些贬义色彩。

伤疤是军人特殊的勋章，中

国军人因奋勇御寇而伤残，理应受到世人的尊敬。在中国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途经郑州时看到大批身受枪伤的中国伤员，后来他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不无敬意地写道：“这表明这些战士曾冒着日军防御工事的机枪冲锋，中国人是在进攻！”这种背景下，“残废军人”的称谓不仅对伤残者的情绪带来负面影响，更难以表达对抗战将士的崇敬之情。

鉴于于此，1940年4月18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函请军政部代电全国各军政机关，将涉及伤残军人有关事务中的“残废”之称一律改为“荣誉”。一词之改，其意迥然，受到广大伤残军人的热烈拥护。“军政部残废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也据此更名为“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以下简称第三临教院）。

八年全面抗战，第三临教院共收治了2448名荣誉军人。那么，驻牛头观的第一队收治了多少荣誉军人呢？

经笔者统计，第一队有校、尉级荣员53人，荣誉军士57人，荣誉士兵133人，此外还有病残军官、军士及各等病兵70人，共计313人。人员籍贯涉及全国20个省份，人数最多的是河南籍，次之为陕西籍，再次之为四川籍，此三省者占全队总人数

的51%，这一数据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面抗战期间各省的出兵情况。在第一队全体荣誉军人中，年龄最大者为56岁的江西籍准尉荣员刘学林，最小者为18岁的河南籍二等荣兵张占营。经测算，全队平均年龄为42岁，这一结果颇令笔者意外，如果该数据具有普遍性的话，是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抗战时的中国士兵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年轻。

在牛头观生活休养过的第三临教院第一队荣誉军人中，有三位比较特殊。

第一位是少校队长易秉庚，他是少校荣员的身份充任队长的，在第三临教院所辖各队中，仅此一例。

第二位是中尉荣员刘武仲，在他的记录栏内，注明其别号为“荣誉道人”。与其他战友的别号——如第一队中尉副队长史景法别号“正岭”、准尉司书龚冠英别号“定武”等相比，“荣誉道人”显得与众不同。1946年3月，第三临教院组织编写同院录，刘武仲为之作序，落款赫然便是荣誉道人刘武仲。这些都不禁使人们对他的身份产生了诸多联想。

第三位是上尉荣员武世勋。武世勋，山西黎城人，原任晋绥军第196旅某部连长，1937年10月参加山西原平保卫战，身负重伤，先后在太原、西安医治，经鉴定为三等残废。1938年8月

20日，转入第三临教院第一队。在离开第三临教院后，武世勋留在了宝鸡，他日后写下一篇《抗战时期的宝鸡第三临教院》，被收录于《宝鸡文史资料》第5辑，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据武世勋回忆：凡被认定为二、三等残废者，不分战区，不分部队，亦不分经治医院，只要持有转院证，均可收入休养治疗。入院后，每人发给被、褥各一条，夏季发一件道士式深蓝色粗布军衣，冬季发一件棉衣。衣服上均标有红色“十”字，称“荣誉服”。每星期组织看戏一场，洗澡一次。荣誉军人薪饷及生活补助，则与现役官兵相同，由军政部按其原级别支給。

尽管国民政府建立了一套荣誉军人服务保障系统，但随着战事的旷日持久，在物资奇缺、货币贬值等因素影响下，荣誉军人的生活质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根据《四川省志》的记载，全面抗战八年中，少尉（含荣员）的月薪增长了416倍，而1944年7月，“重庆的物价比抗战前上涨了532倍”。官兵薪饷的增幅抵消不了物价的涨幅，尤其是低级荣员和荣兵的处境相当困窘。四川的这种情况应当不是个例。

由于生活清苦、营养不继，再加上医疗设备简陋、药物匮乏，至1941年，宝鸡的第三临教院已有40多名从枪林弹雨中

闯出的将士因伤情复发或罹患其他疾病去世。经军政部拨款，院方在长寿山牛头观下的荒坡建起一座简易墓园，四周以洋槐为界，园中竖立了一座5米高的四方尖顶纪念塔，塔身四面各砌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其中一块为陈诚的题词“浩气长存”。遗憾的是，这座纪念塔今已不存了。

也是在这一年，美国记者卡尔·迈登斯夫妇接受著名杂志《生活》周刊的派遣，抵达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开启了一段长达数月的抗战采访之旅。

在宝鸡，迈登斯夫妇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牛头观内外的一切，拍摄了大量关于第三临教院的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位拄着拐杖的荣誉军人凝望着拍摄者，他身后大门一侧写着一行字，上半段被一块红色木牌遮挡住了，下面露出的是“临时教养院第一队”，而那块红色木牌顶端有一个三角形的“工合”标志，下面写着：“宝鸡县长寿山网袋生产合作社。”

在另一张照片上，16名荣誉军人在一座大殿上或坐或站，他们正在编制网兜。迈登斯夫妇给这张照片的英文注释是：Disabled soldiers working at a temple as part of the cooperative，大意为：伤残士兵在道观里劳作，这是合作社工作的一部分。

这两张照片清楚地显示出，

第三临教院的荣誉军人们，已不仅仅是被国家救助的对象，还成为工合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工合是工业合作的简称，即以个体劳动者（主要为手工业者）为基础集中组合而成合作社进行生产。1938年8月，关心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斯诺和艾黎主导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争取国际援助为重要途径，以创办工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组织广大民众积极生产，自救救国。1938年8月23日，我国农村合作社事业创建者之一的卢广绵等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之命来到宝鸡，不久即挂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的招牌。到1939年4月，又成立了西北区宝鸡事务所，在陕西宝鸡、汉中、安康、沔县（今勉县）、榆林、延安，甘肃兰州，山西阳城、晋城，河南镇平，湖北老河口等地，推动组建了一大批工业合作社，源源不断生产军服、军毯、鞋袜、帽子、纽扣、布匹、药棉、铁器、砖瓦、木器、食用油、皂烛及简单机械等各种产品，满足百姓日用，供应部队所需，增强物质力量，促进后方安定，以利长期抗战，作用不可忽视。

而第三临教院工合活动的发展，则与时任院长的原上校荣员张赞臣有密切关系。张赞臣目睹战友们日益艰辛的生活，一方面积极向伤兵之友总社牵头组建的

荣誉军人生产事业委员会争取资金支持，一方面发动广大荣誉军人集资，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先后创办网兜、织布、鞋帽等20多个合作社，以尉级荣员为各厂、社负责人，以其他荣誉军人为主要劳动力，“自给自足，虽残不废”。

第三临教院的荣誉军人们生产的网袋、鞋帽等日常用品，货真价实，买卖公道，颇受当地百姓欢迎。官兵们不但因此增资添收，改善生活，还为国家减轻了负担。度过了那段最艰苦的岁月后，身处西北的他们最终迎来了抗战胜利的喜讯。

正如《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三临时教养院同院录》序言中所指出的，“在此八年艰苦抗战，无异以血肉作长城，以头颅为堡垒，为国家民族之存亡斗，为全人类之幸福斗，为公理正义之伸张斗。欣逢良机，参与杀敌，虽未成仁以流芳，而牺牲一己，断肢成残，此我荣军实亦无上是光荣在焉”。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背后，有着千千万万荣誉军人的奉献与付出，他们为抗战做出的重大贡献，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四万万同胞千万兵”的真实写照，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感谢江苏省金湖县档案馆周政先生为本文提供史料）

黄埔军校初创最困难时，张难先做了什么

□ 张铭玉

张难先，1904年在武昌组织成立湖北省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5年在湖北武昌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24年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历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等职。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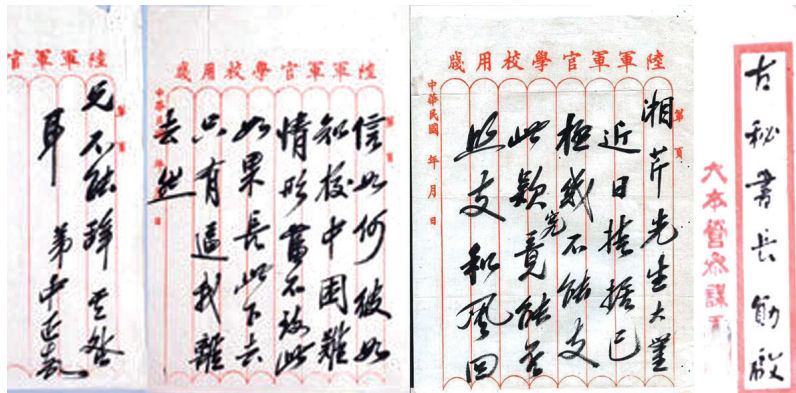
黄埔军校初创时最困难的是什么？缺钱！缺枪！缺人！

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第十次会议，决定了要设立一所国民党军官学校。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始筹建，因为校址是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所以这所学校亦称黄埔军校。

3月1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

5月5日，正式录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入学。

几百名学生来到，就需要



蒋介石给古应芬的信。

解决学生吃饭的粮、菜。但是由于缺钱，饭菜不够吃，米饭里还有沙子，李仙洲等提出异议，政治部主任说：“这就是好的。当军人连这种苦都吃不得，还当什么军人！”第1期学生每人每月伙食费仅6元毫洋，根本不够，有一段时间以萝卜苗充饥。

廖仲恺先生为筹钱十分辛苦，实在没有钱时，夫人何香凝把自己的首饰当掉换钱给学生买米。

面对军校经费筹措困难，蒋介石亲笔给古应芬写信。古应芬，字湘芹，1905年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筹办的同盟会，后来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长。

湘芹先生，近日拮据已极，几不能支，此款，兄竟能否照支……彼如知校中困难情形，当不致此，如果长此下去，只有逼我离去，然兄不能辞其咎耳。

弟中正

孙中山先生曾经特批过300支粤造步枪给黄埔军校使用，由于军阀干扰，黄埔军校最后只拿到30支，这个数量就算是分给卫兵站岗都不够。负责黄埔军校筹建以及经费等事情的廖仲恺，亲自出面进行斡旋，也还是没能够要到一杆枪。

苏联答应援助的武器由“沃罗夫斯基”号商船在1924年

10月运抵黄埔岛，共有8000支步枪和400万发子弹。由黄埔军校1大队、2大队分别负责警戒、卸船。这已经是6月16日开学3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

在“沃罗夫斯基”号到达黄埔军校前，军校最困难时期，代理筹备委员长廖仲恺请李济深出手相助。李济深慨然允诺，当即表示支持。他不但对创办黄埔军校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而且从粤军第1师、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子弹3万余发交给军校筹备处，使筹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此后，国民党梧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梧州市党部，李济深、黄绍竑、张难先、李血泪、何翼剑、李天和等9人为执行委员，李济深为常务执行委员。这是国民党改组后广西第一个国民党党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领导。

这时，李济深、黄绍竑忙于高层军务，梧州许多重要事项，如大力支持黄埔军校等，委托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张难先具体办理。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的日子，孙中山到会场给军校的青年军人进行了激情澎湃的演讲，并举行阅兵。学生肩扛步枪行进。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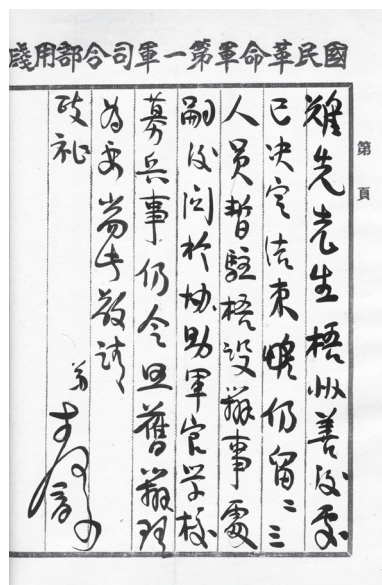
枪不是10月才运到的苏式步枪，而是主要来自粤军第1师和西江讲武堂的。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后，百感交集地对李济深说：“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第1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做了支持，谢谢你！”

黄埔军校注重政治教育，除常规的政治课外，常请校外知名人士到校演讲。每当学校请到张难先时，他都接受邀请，到校演讲。

初创时军校缺教官，张难先让长婿林薰南到黄埔军校任第1期上校教官，第3、4期升任步兵科科长等职。

廖仲恺在1月30日大会上强调：“请各代表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委托出席大会的各省代表要积极支持创办军官学校，推荐优秀青年入学。张难先得知孙中山先生这一重大决策后，鼓励长子张少勤，由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报考陆军军官学校。他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编入第3队，由邓演达及第3队队长金佛庄介绍加入国民党。（金佛庄从苏联回国参加中共“三大”后参加黄埔军校工作，历任黄埔军校第1期第3学生队队长，教导第2



1 李济深将协助军校募兵等事委托张难先办理。图为李济深给张难先的信。

团第3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团长，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等职。1926年12月2日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

张难先与邓演达还推荐西江善后督办公署有志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如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军务科书记员韩德照，他祖辈务农，家境贫穷，耕读为生，当时已年过30，张难先保荐他人黄埔第1期第3大队，加入共产党。另外还有西江善后督办公署上尉测量员林朱梁，李济深保荐其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学习。



（作者为辽宁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委员、张难先长孙）

关于熊雄与黄埔军校研究的几个问题

□ 曾庆榴

熊雄是黄埔军校的著名共产党人，对黄埔建校、建军，对党的早期军事、政治干部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周恩来，宣传黄埔，要宣传熊雄。加强对熊雄的研究，意义重大。

熊雄的业绩，主要体现于黄埔军校。研究熊雄，应在研究熊雄对黄埔军校所做贡献方面多下功夫。对此，我提几点想法，供朋友们参考。

关于留欧、留俄

熊雄早年留学法国、德国，后又经德国到苏联，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熊雄留学海外，与一般青少年出国求学不同。赴欧之前，他快30岁了，参加过学生军、学兵团，投身于反袁斗争、护法运动，到日本学习过军事，见过孙中山，并参加过中华革命党，可谓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对中国的问题，有相当的体察和认识。他之留欧、留俄，应当是带着思索中国问题、寻找中国出路的目的而去的。从1920年1月至1925年8月，熊雄在欧洲、俄国居留6年多时间。这是熊雄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熊雄留欧、留俄的经历，与

他回国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有三点：

一、在学习方面。在欧洲和苏俄，熊雄加入了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的故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史料特别说到，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熊雄“被派去学习苏联军队中开展军事政治工作的建制经验”（饶来杰）。熊雄过去读过军校，从事过军队工作，是一位军事干部；经过6年多的刻苦学习，他成为既懂军事又懂政治，在军事、政治两方面都抢手的人物，在早期党的干部中，这样的人才不可多得。这为他到黄埔军校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旅欧、留俄6年间，熊雄结识了大批在海外的革命者，如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熊锐、孙炳文、张伯简，鲁易、李合林、穆青、傅烈、袁庆云、饶来杰、吴明、罗汉等等。他们是旅欧、留俄中共组织的骨干。熊雄人际关系广泛，在这批人当中，他是有影响力、号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人物。熊雄在广州工作时，这批人先后被党派至广州，投身于中国大革命的洪流，有的成为中共广东区

委的领导者（周恩来、陈延年），有的与熊雄一道在区委、黄埔军校工作，成为他朝夕与共的同事。熊雄旅欧、留俄所交往的革命者，为他在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开展工作，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准备。

三、在莫斯科，熊雄与1923年秋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俄的蒋介石有过接触。蒋介石的访俄“日记”虽未提到熊雄之名，但写到了他与在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学生见面、一同庆祝双十节的事；“日记”又明确写道，赵世炎（共产党员）是“青年有为之士”“殊可贵也”；有史料还说，蒋介石这时向熊雄提出要参加共产党（饶来杰）。这些至少表明，蒋当时对共产党员是有好感的。熊雄原本是孙中山营垒之人，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斯科与蒋介石见面，熊雄这时给蒋留下的印象，自然非同一般。这是熊雄与蒋介石打交道的开始，也是熊雄后来进入黄埔军校工作的因缘。方鼎英说，熊雄到黄埔军校工作，出于蒋介石的“延揽”。这一点，显然与两年前他们在莫斯科的会见有关，是那次异国他乡之

相遇所留下的伏笔。

1925年1月，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致信在俄的陈乔年等人说：“熊雄兄望他早点回来，国内工作需人孔急，去年他未回，真失计之至。”熊雄人还在苏俄，广州就远隔千山万水，呼唤着他早日归来。所以，熊雄之留欧、留俄，与他到黄埔军校工作，有着无缝对接的联系。熊雄的这一段经历，毫无疑问，是他到黄埔军校工作的准备、预习和热身的时期。

对熊雄这段经历，学界已做了许多研究，然而，仍可以深入发掘。莫斯科东方大学有一项活动是小组会报，每周都要进行，这可能是校方为掌握学生的经历、社交、学习和思想状况而规定的一项必做活动。因这项活动而产生的报告、小组会议、组员之间谈话的文字材料，保存在俄方的档案里。目前所知，熊雄是某个学习组的组长，他写的报告及组员之间的谈话材料等等，都可以看到一些。这些材料，现在还很少人提及。我认为，研究熊雄，应补上这一课，加强对有关史料的征集和整理。这也与黄埔军校的研究有关，是考察黄埔军校有关人物及办学前期因素应做的功课。

关于增设“政治科”

熊雄1925年秋天到广州，

不久即进入黄埔军校，经历了第4、第5和第6期，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是主持该校政治部时间最长的一位。熊雄对黄埔军校的贡献，最值得一说的是主办该校的“政治科”。

这要从黄埔军校的改组讲起。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的一项决定，是将“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引人注目地在校名上，添加了“政治”两个字，因为这一点，黄埔军校从一所单一的军事学校，变成军事、政治并重的学校。读有关的史料可知，改组之动议是“去年”（1925年）提出来的，当时，蒋介石还在汕头，并不知情。这虽然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该校“党代表”的名义提出来的，然而共产党人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与党组织为培养革命军、政干部，从实际出发，通过统战关系的提议与推动有关。这正是熊雄到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工作之时。国民党二大后，熊雄又担任该校“改组筹备委员”。很清楚，这个以提升政治教育地位为主旨之军校改组，熊雄是站在第一线的一位关键性的人物。

黄埔军校改组后，政治工作的力度大大加强，政治部的地位很快提升：组织机构健全，教学队伍充实，师资素质提高，课

程设置扩展，课时增加，教辅配备完善，如此等等。政治部拥有黄埔军校的“半壁江山”，是在该校举足轻重的一个部门。增设“政治科”，就是在军校改组，政治部的地位、作用提高的前提下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

黄埔军校前3期，没有“政治科”之设。增设“政治部”，等于在校内增设了一个二级学院。主要看点是：

一、该校第4期招收政治专业学生500名，单独编队，下设一个大队，三个队（史料上还出现了“第4队”一词），专门授课。第5期的政治科有多少学生未详。

二、在教学组织上，设置了“政治部主任”——“政治主任教官”——“政治教官”的三层架构，并形成了熊雄（政治部主任）、恽代英（政治主任教官）的二人组合，从而将政治教育的列车，推进至既有领导保证又有名师负责专责的轨道上。

三、从事政治教育的是一批学有专长者。共产党员有聂荣臻、萧楚女、王懋廷、张秋人、陈启修、熊锐、安体诚、孙炳文、李求实、欧阳继修、罗懋琪、陈日新、黄松龄、于树德、韩麟符、施存统等。此外还有一批拥护国民革命的进步学者。熊雄说，这些人“皆来自国内外著名大学”。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

教学团队。

四、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多达 20 多门，大大扩展了教学内容，既讲授三民主义，也讲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在教学方针、方法上，有许多创新和改进。

“政治科”的创设，盘活了黄埔军校整个教育。须知，黄埔军校的强项并非军事教育，蒋介石当时说过，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只是“陆军中学”水平；黄埔军校的强项，就是政治教育！这是黄埔军校办学见成效、出人才的根本原因所在。

应当说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不是在旧军校和国民党的传统中派生出来的，而是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经过艰苦的实践而开创出来的。这一实践包括了三项开创性的举措：一、军校政治教育；二、军队政治工作；三、战时政治工作。周恩来是伟大的开拓者，特别是在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和战时政治工作方面，他走在时代和全党的前面：国民革命军建立后，他担任师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军副党代表，是共产党人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先行者；两次东征时，他担任国民党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和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之地实行建党、建政，是共产党人实际从事战时政治工作的第一人。这是

周恩来对黄埔军校和革命军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而在军校政治教育方面，当周恩来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时，因第 1 期学生临近毕业，接着开始了第一次东征，限于客观条件，这一工作当时还刚起步。揆诸史乘，在黄埔军校，通盘筹划和全面铺开军校政治教育，并将这项工作做到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佳，是黄埔军校改组之后，在熊雄主持该校政治部、增设“政治科”的时候才实现的。

我在 2004 年出版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中写过，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意义重大，等于在该校内办了个二级学院——政治学院。这句话得到不少朋友的认同，他们的文章、著述，多处引用了这句话。当今研究黄埔军校的历史，对这个“政治科”的地位和影响，我认为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这个“政治科”，不仅对黄埔军校来说是个新事物，开创了该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新局面，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中国，在当时的国民教育中，可能也具有超前性。其办学规模之大、教学团队之强、课程设置之切合实际、教学水平之高，不是很领先吗？特别是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革命理论武装人、提升人方面，“政治科”旗帜之鲜明，投入力度之大，别处也难

以比及；其培养人才之多，更为世人所瞩目。试问，当时什么地方、哪一所高校办过这样的“政治科”（政治学院）呢？黄埔军校“政治科”之创办，显然为后来办党校，办干部学校，提供了先行一步的实践经验；对当前高校办“马院”，也有启迪、借鉴的意义。因此，对这个“政治科”的历史地位，对它在党的干部教育方面和政治理论研究方面的开创意义，是值得深入探讨、研究的。

关于黄埔军校党团

黄埔军校党团是“中山舰事件”后成立的。是中共广东区委为应对突发事变而采取的一项组织措施。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组织，原称直属支部，第 4 期称特别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中共广东区委授权成立的黄埔军校党团，是这所学校党的“核心组织”，在党内起核心领导作用。熊雄是黄埔军校党团的负责人。

当时，蒋介石以造谣、诬陷、非法出兵的手段，肆意打击、迫害共产党人。事变发生后，党内难免有惊慌失措、茫然不知所向之人，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为挫败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统一领导下，黄埔

军校党团开展了大量工作。

一、加强党内教育，制止党内惊慌失措、鲁莽急躁行为的发生；对激于义愤，不顾一切，盲目而动的党员，及时予以批评、劝阻和正确引导；从而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稳定和巩固了党的组织。

二、坚决抵制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退党诱逼。当时，蒋介石以作“纯粹党员”为由，抛弃孙中山“党内合作”的决定，千方百计引诱、逼使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军校党团坚决执行广东区委下达的指示，对此予以有力的抵制。当时，“黄埔系统”有中共党员500多名（周恩来语），蒋介石诱逼的结果，仅39人退出共产党，却有250多名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党，同时离开了黄埔军校和蒋介石所掌控的第1军。蒋介石的退党诱逼，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自伤、自残，自己削弱了自己。

三、坚守舆论阵地。人心波动的时期，端正舆论导向至为重要。“中山舰事件”后，该党团在黄埔军校大抓办报、办刊工作。《黄埔日刊》《黄埔潮周刊》《先声旬刊》（《民众的武力》）《黄埔旬刊》《革命画报》等，如雨后之春笋，应时破土而出。特别是《黄埔日刊》，日发行量一度突破4万份，散发于校内和校外。该“日刊”由政治部主办，

由有办报经验、善于写作的共产党员任编辑；校内各种期刊的编者和作者，许多也是共产党员。很清楚，主抓舆论导向，致力于办报办刊，是黄埔军校党团为驱散“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阴云而采取的有力举措。

四、调整策略，有退让，有坚守。为挫败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办校，党对斗争策略作了适当的调整，例如，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退让，以顾全大局，避免统一战线破裂；对蒋介石为达到自己目的而成立的“黄埔同学会”，不直接、当面进行抵制，而是有选择地参与其中的工作，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活动空间有所拓展；接过蒋介石提出的某些口号，然后予以革命的解释，以反面正用，化不利为有利，变害为益。军校党组织还抓住各种时机，利用各种条件、各种场合，加强正面教育，以提高教官、学生的政治识别力，辨明大是大非。结果，虽然阴风阵阵，黑云压城，但黄埔军校内仍然正气张扬，左翼阵营的力量与声势，仍节节提升。

五、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军校党团不但抵制了蒋介石的退党诱逼，稳定了党的组织，而且发展了党

员，壮大了队伍。大批革命青年面对险情，逆势而上，毅然申请入党。党经常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先后在黄埔军校工作、学习过的中共党员，达千人以上，目前能查到姓名者，有800多人，比“中山舰事件”时的500多人增加了数百人。这里，一部分是新入学的第5、第6期学生中的党员，另一部分就是中山舰事件后入党的新党员。党组织日益健全，在政治部、入伍生部、各期各科成立了支部，史料上还出现了总支一级组织。

有的人以为，经过“中山舰事件”，中共在黄埔军校已经一蹶不振了，其实不然。事实是，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逆流，作了有力的抵制，政治上站稳了脚跟，组织上得到巩固和发展。北伐出师后，在革命潮流高涨的形势下，在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的控制出现松动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逐步驱散了笼罩在广州上空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阴云，走出困境，越出了低谷。在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又打开了一片新的局面。后来，蒋介石不惜通过发动流血政变，绞杀了中国大革命，也破坏了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但是共产党人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办校所作的努力，则是不容抹杀的。

黄埔军校党团的活动，在党建实践方面具有开创的意义。在前进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前进中遭遇风浪、思想混乱、人心动荡之时，党内应大力加强统一领导，抓紧党的建设，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党纪、党风上，切实管好党、巩固党和发展党。只有这样，才能化解危机，战胜困难和敌人，推进党的事业。“中山舰事件”风波后，黄埔军校党团在该校的党建实践，其所昭示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正在这里。

关于黄埔军校著述

黄埔军校政治部重视理论研究和出版工作。据粗略统计，恽代英任该校政治主任教官时，出版了《政治学概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国国民党与农民运动》等多部论著和讲义，发表文章40多篇；从1926年10月至次年4月，政治教官萧楚女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社会主义概要讲授大纲》等多部论著和讲义，发表文章20多篇；共产党员、第1期毕业生游步瀛在《黄埔潮周刊》发表的论文，共达20多篇。此外，政治主任教官孙炳文，军官政治研究班主任教官韩麟符，政治教官王懋廷、安体诚、张秋人、施存统、欧阳继修等，学

生蒋先云、杨其纲、陈赓、曾中生、郭化若、李逸民、袁国平等，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报刊林立，出版物多，文章著述多，是黄埔军校的特色之一。经过政治部的努力经营，这所学校堪称文章之渊薮，精神产品之高产区。

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当时出版的论著、讲义和文章，有的正面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有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探讨中国革命之理论和实践问题；有的对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的种种问题，作了认真探讨；有的批判“戴季陶主义”和“孙文主义学会”，激浊扬清，指误正谬，有破、有立；有的文章，是动员、鼓舞军民参战助战之檄文。在党的幼年时期，许多共产党员辛勤耕耘于黄埔军校的讲坛、文坛，他们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理论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之作；是共产党人参与黄埔建校、建军时，在文化、思想、革命理论研究方面大有建树的体现。这也与熊雄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有关，是该校政治部工作的一个亮点。

熊雄主持军校政治部的全面工作，但仍勤于写作，当时发表了10多篇文章。署名“铁血余生”的《惠州战役日记》已公认为是

熊雄之作。《黄埔潮周刊》连载多期的《列宁主义与孙文主义之比较观》一文，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联系实际阐述革命理论的重磅之作，目前所读到的前4章，已洋洋数万言，尚有3章只刊出目录，而未见全文。该文从第二章开始，署名“铁血”，这是不是熊雄之手笔呢？值得查考，但至少是熊雄主持的政治部策划、布置，或者是他组织的写作班子撰写出来的文稿。

对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理论成果，包括对熊雄的文稿，我们当然应深入研究。尤其要加强对文本的研究，认真阅读、钻研、弄懂这批文章和著作，深入发掘其思想、理论价值，并对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恰切的评价，以鉴往知今，启迪未来。推进熊雄研究和黄埔军校研究，这也是应该做的一项作业。

综上所述，熊雄在黄埔军校，致力于军校政治教育，通过增办“政治科”，并在抵制反共分裂逆流，维护国共合作的斗争中，在不长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这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在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熊雄生平业绩，聚光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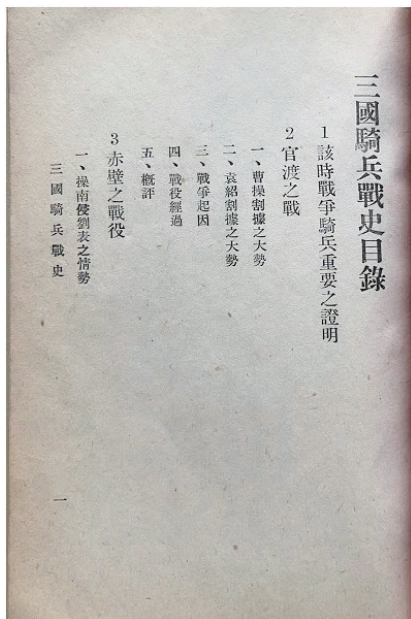
浅谈黄埔军校骑兵教育沿革

(上)

□ 单补生

举凡图书馆之古旧书籍，均钤盖一枚或几枚藏书章。其形状除正方和长方以外，还有圆形、椭圆、三角、菱形等。取材为金属、木质、石料多种，印文常为朱文篆刻，精美圆润，繁简宋体，庄重工整。藏书章一般盖在书名页的下方正中，也有固定的某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下方正中各盖一章。期刊及其他资料则盖在封面上。它不仅是图书馆的典藏标识，而且记录了藏书与文化机构的变迁，这对于研究文献的收藏与流传，以及鉴别书籍版本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者在旧书店淘得一本《中国骑兵战史资料》，封面钤盖着两枚藏书章，一枚是蓝色正方篆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图书馆藏书之章”，另为红色圆形宋体简字“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航校军事科学研究处图书馆”，两章分明，流传有序，见证历史。此书编者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1946年8月由南京军用图书社印行，内容包括前汉、后汉、三国、北魏、辽代、金代、宋代、元代、清代骑兵战史资料。其中《三国骑兵战史》为黄埔8期上校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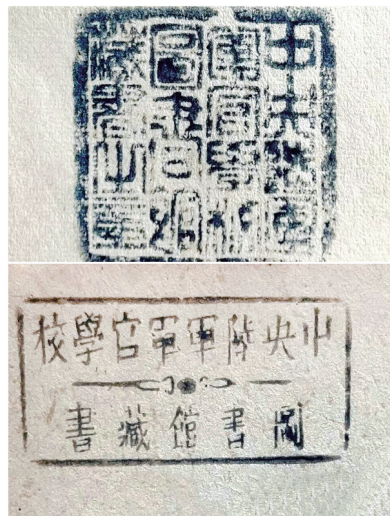
/ 中国骑兵战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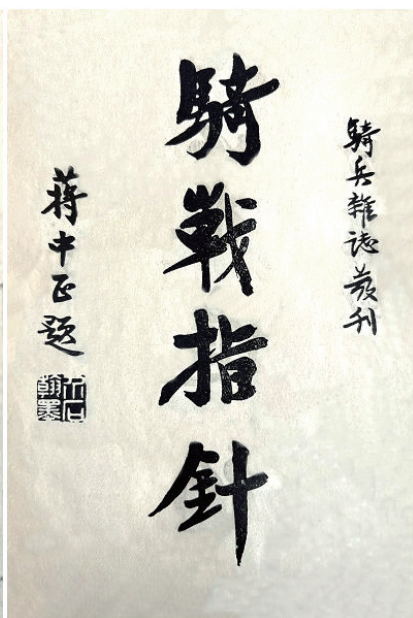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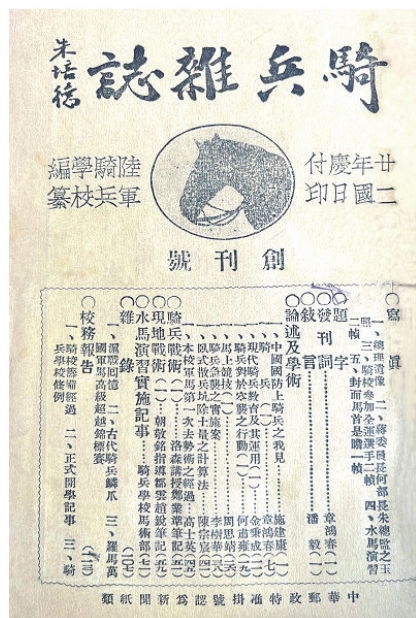
教官孙秉辰（别号耀北，河北景县人，保定军校1期骑科）编拟，曾于军校骑兵科讲授，使学生受益匪浅。

黄埔骑兵军官知多少

古称武事曰兵马，总揽其事者，曰司马。盖马为活兵器，为大军原动力，无马即不能成军，故以兵马二字统一言之也！民国时期各国陆上军队，皆有军马，而骑兵仍占五大兵种（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之第二位，可见兵中之有马，为用大



/ 黄埔军校藏书印章。



/ 《骑兵杂志》创刊号与蒋介石题字。

矣，骑兵之为军，亦重且要矣！

黄埔校史记载：黄埔军校设骑兵一科始于1925年第3期骑兵队，时学生总队计编10队，共1200余人，其中一队为骑兵队，计有学生谷黎光、李汉杰、陈甲三等36人。少校队长张鼎家，别号绍和，安徽秋浦人，保定军校2期骑科毕业，曾任黄埔2期少校战术教官。

1926年10月初，黄埔第6期录取入伍生4400余人，编为步兵两团，骑兵1营。营长孙振亚，驻地沙河。1927年6月，骑兵营奉命经海运迁移南京小营训练，遂于1928年在马标编为校本军官团骑兵队1、2连，共有学生沈宪章、朱钜林、杨龙天等250人。队长章鸿春，江苏吴县人，日本士官学校14期骑科毕

业。

至第7期教育处正式设骑兵科实施德式教育，上校科长为俞寿鹤，江苏江都人，保定军校2期炮科毕业，曾任黄埔6期炮兵大队上校大队长。本期1总队骑兵队计学生116人。

到第8期时，骑兵科与辎重科合并为骑辎科，少将科长为关义之，别号循章，湖北江陵人，保定军校2期骑科毕业，后连任黄埔9至12期骑兵科长。本期1总队骑辎队计学生96人（骑兵48人，辎重兵48人）。

第9期骑兵队计学生樊礼等91人，队长韩恩瀚。

第10期1总队骑兵队计学生萧敏颂等80人，上校队长洪绪辅，别号初平，安徽宿松人，保定军校2期骑科毕业。2总队

骑兵队计学生张永淦、舒国华等79人，上校队长韩恩瀚，别号海波，河北丰润人，保定军校9期步科毕业。

第11期1总队骑兵队计学生66人，上校队长李钟龄，别号九我，河北武清（现属天津市）人，保定军校9期辎重科毕业。2总队骑兵队计学生70人，队长沈宪章，湖南醴陵人，黄埔6期骑科。

第13、14期骑兵科长为谭辅烈，江苏高邮人，黄埔1期、日本骑兵学校毕业。第13期骑兵队计学生贺家麟、陈启欧等94人。第14期2总队骑兵队计学生71人。第15期骑兵队计学生70人。第13至第15期骑兵队长由杨龙天（湖南长沙人，黄埔6期骑科）任少校、中校队长。

第16期1总队骑兵队计学生70人，中校队长苏若水，别号安澜，黄埔7期骑科、骑校1期。

第17期1总队骑兵队计学生73人，少校队长王锡烈，辽宁辽阳人，黄埔9期骑科。

第18期少将骑兵科长萧平波，别号唯元，湖南浏阳人，黄埔6期骑科，后连任19至21期骑兵科长。18期1总队骑兵队计学生73人，中校队长张剑冲，辽宁铁岭人，黄埔9期骑科。2总队骑兵队计学生65人，少校队长萧敏颂，别号会昭，湖南新

化人，黄埔 10 期骑科。

第 19 期 2 总队骑兵大队长苏若水。骑兵 1 队计学生 77 人，少校队长萧敏颂。骑兵 2 队计学生 84 人，少校队长张永淦，别号释泉，四川成都人，黄埔 10 期骑科。

第 20 期骑兵独立第 1 中队计学生 76 人，少校中队长刘铸九。

第 21 期本校骑兵大队中校大队长樊礼，别号文智，绥远包头人，黄埔 9 期骑科。骑兵 1 中队计学生 97 人，上尉中队长贺家麟，北平人，黄埔 13 期骑科。骑兵 2 中队计学生 97 人，上尉中队长陈启欧，别号渐东，江苏如皋人，黄埔 13 期骑科。

第 21 期西安督训处骑兵 3 中队计学生 105 人，少校中队长刘瑜。

第 22 期骑兵上校科长苏若水。1 总队骑兵大队长萧敏颂。骑兵 1 中队计学生 100 人，少校中队长成若萍，别号其美，四川重庆人，黄埔 14 期骑科。骑兵 2 中队计学生 104 人，少校中队长卓介予，别号仁廉，黄埔 14 期骑科。

第 23 期骑兵上校科长苏若水。1 总队骑兵大队中校大队长萧敏颂。骑兵 1 中队计学生 97 人，少校中队长成若萍。骑兵 2 中队计学生 87 人，上尉中队长谢瑞兰，别号云峰，青海互助



1 军校门前黄埔骑兵之影。

人，黄埔 14 期骑科。

以上黄埔本校 3 至 23 期骑兵科毕业生计 2000 余名，除分发各骑兵部队服务外，余者留校任职，或任助教、教官，或入骑兵专科学校深造。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起义骑兵军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进者颇多，如萧平波（1909—1984），别号唯元，湖南浏阳人，黄埔 6 期骑兵科毕业，继入骑兵学校一期深造。在抗日战争中，于 1943 年保送美驻印军官战术学校 1 期学习，结业后委派中央军校成都本校服务，历任骑兵科少将科长、21 期少将督练官、22 至 23 期 1 总队少将总队长。1949 年 12 月 25 日同教育处少将代处长李永中率全校官生起义，随之进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教

研组长。1955 年转业到江苏省政协任常务委员；尔后参加民革，被选为中央委员。1984 年底因病离世，终年 75 岁。

陆军骑兵学校缘起

1930 年春间，训练总监部依据训政工作分配年表之计划，决计举办各兵科专门学校。阅时三载，步兵、炮兵、工兵三校依次完成，唯独骑兵学校筹备稍晚。1932 年 7 月间，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下令以陆军骑兵教导队及骑兵第 1 旅改办骑兵学校，并调骑兵第 15 旅旅长章鸿春为陆军骑兵教导队队长兼骑兵第 1 旅旅长，同时奉发骑兵学校筹备方案五项。是年 8 月 15 日，章鸿春接收骑兵教导队及骑兵第 1 旅，即于 9 月 1 日在小营新营房就原骑兵教导队办公地址，设立骑兵



/ 校长章鸿春与其爱马镇安号。

学校筹备处开始办公。

筹备处自成立之后，悉遵照训练总监部颁发筹设骑校计划书之步骤，及采纳德国顾问洛森上校之建议，顺序推进。自1932年9月1日起至1933年2月底止，其筹备事项如下。

（一）经费之筹划：按照方案之规定，军政部月拨筹备骑校经常费两万五千元（练习队经费在外）。

（二）马匹之选购：常以选购马匹为重要之要求，所以迭次派员在京沪一带购得洋马5匹（其中1匹阿拉伯乘马是在上海跑马厅以高价购得，能做各种高等马术动作，取名黄龙号），中国马24匹，并于绥远举行马种比赛大会时，特派研究委员梁鸿藻，筹

备员苗庆年、蒋志奇三人前往参观，藉可选购良马。当时呈准军政部拨发购马经费2万元，费时数月，始购到乘马95匹。此外，由骑兵第1旅移拨军马404匹。军政部指拨骑兵第13旅刘凤岐部寄养30匹，及骑兵1旅2团拨来（即现在本校练习队）374匹，前后合计共有马骡932匹。唯由骑兵1旅拨来马匹中，颇多年老患病残废不堪服务者，业经报明军政部派员会同分别处置。

（三）教育之预定：本校遵照颁布之条例及教育纲领，并顾虑国军骑兵团队之状况，学员（生）之素养与程度，特就教育各项事宜，详加规定以作教育实施之准备。

1. 教育之方针：遵照教育纲

领之旨，趣学行并重，即一面注意将校之修养，一面力图学术之增进，以期躬行实践，意志整备，获得教育美满之成绩。

2. 教育之主旨：不论马术科及战术科，均遵本校设施之目的，及教育纲领所规定者分别实行，在使召集之骑兵现役军官专习本兵科诸种之学识技能，由其原有之素养，益见修得之完成，以立将来研究高深学术之基础，俾归队后，各自对于本职能胜任愉快，藉收改善军队普及教育之效果。

3. 教育之要领：以教授原则同时诱导其应用，并以注入及启发二者并用，以图达成教育之目的，唯原则之教授，以现行典范令及本校教程为基础，并与实施相伴而行，俾有明确之标准及统一，并引证战史或其他之实例，使其确实领会为要旨。

4. 教育之手段：勿使墨守旧章，宜取適切之计划，并按前条之要领，就各课目范围内，由易而难，由浅而深，对于一课目及一问题之讲授，或摘要行之，或详细讲解，务将原理原则使其彻底了解，且能移诸实用，以令学员（生）之好学心与研究心提高向上，藉图发挥教育之功能。

（四）教材之取择：筹备期间，由担任课程的各教官选择编订各项教材，其已印成有战术学、筑城学、骑兵阵中要务令、

三民主义释义、骑兵战法、重机关枪操典草案等 17 种。

(五) 各种兵器器材装具之领购: 对于应用各种兵器, 均向军政部请领, 唯教育器材及鞍具等, 因顾虑研究及改善, 计有自行购置者, 然以国家目前财力关系, 因陋就简, 不能有大规模之设备, 殊引为遗憾。

(六) 马厩马场之修理建筑: 查新小营原有骑兵第 1 旅之马厩, 容量既小, 且复损坏, 不适应, 经雇工修理, 尚称完整。此外, 复建筑芦苇马厩 2 座, 马夫卧室 1 座, 露天马场 4 座, 均已完工。因尚不敷分配, 仍拟建筑芦苇马厩 2 座, 隔离厩 1 座, 麸料房 1 座, 蹄铁工场 1 所, 各马厩联络交通碎石路 6 条, 并增筑露天马场 1 座, 雨天马场 2 座, 洋灰地系马场 1 座, 时待拨款施工。

(七) 各种规则之订定: 依据本校条例订定服务规则, 并学员(生) 遵守规则及各项办事细则, 业经分别印订成册公布施行, 以资遵守。

1932 年 10 月间, 训练总监部奉令骑兵学校须在 1933 年 1 月间开学, 筹备处即加紧工作, 旋因校址马匹器材等等, 一时不及筹备齐全, 仍请展期; 迨至 2 月底学校规模粗备, 筹备处遂告结束, 将所有校址、马匹、器材、装具、文卷、经理等项, 逐

一移交骑校接收。骑校及练习队遂均于 3 月 1 日在小营新营房正式成立矣! 骑校主要官长如下: 校长: 章鸿春; 教育长: 潘毅; 秘书: 董圣俞; 研究部首席委员: 周孝培; 德国顾问: 洛森、薄丁、史脱斯纳、包尔; 战术部首席教官: 周孝培兼; 马术部首席教官: 胡靖; 教育处主任: 陈宗宸; 副官处主任: 王从喜; 军需处主任: 王枕洲; 军医主任: 王永安; 兽医主任: 高士英; 军械委员: 秦雅硕; 学员队长: 徐益柟; 练习队长: 樊颐(别号如松, 浙江兰溪人, 保定军校 3 期骑科); 第一厩长: 周思靖; 第二厩长: 黄震。

骑兵最高学府成立之后, 由训练总监部通令各骑兵部队, 依照《陆军骑兵学校条例草案》, 按规定名额, 选送相当军校出身、服务 1 年以上之军官, 计召集马术科(班) 第 1 学期学员 55 员, 其中有黄埔第 6 至第 7 期骑科毕业生贺迪光、周梦周、云大机、萧澍祺、姚黎天、陈世炳、赵国雄、石剑勋、吴锡照、姜翰卿、钟公毅等 10 余人。本期于 4 月 1 日开学, 同时筹备战术科学员之入学事宜, 预定在 12 月初开学。

开学盛况政要莅临

1933 年 4 月 1 日, 陆军骑兵学校马术科第 1 期学员在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是日各长官及

来宾参加者, 计到中央党部代表贺耀祖, 国府代表朱文中, 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 军政部次长陈仪, 训练总监朱培德, 训练副监周亚卫, 步兵监张华辅, 炮兵监张修敬, 军校教育长张治中, 军校教育处长徐国镇, 参谋本部高级参谋刘骥, 军委会高级参谋李青, 第 87 师师长王敬久, 步校校长王俊, 炮校校长周斌, 工校校长林柏森, 陆军署副署长项雄霄, 陆军事务处杨漱川, 首都警察厅长陈焯, 江宁要塞司令钱伦礼, 骑兵监汪镐基, 及监员陈谟、卢达淇、陶熙光, 训部教务科长顾邦杰等数十人。本校参加者, 计到全体教职员和学员, 及练习队连(独立排)长以上军官等数百人。

兹将当日本校人员职务之分配, 以及开学典礼之仪式, 分志于后。

(甲) 职务分配: 主席(骑校校长) 章鸿春, 总招待梁鸿藻, 招待员吴农华、王枕洲、周思靖、蒋志奇、苗庆年, 大礼堂指挥潘毅, 辅助官陈宗宸、狄临渊, 司仪陈甲三, 记录朱元瑞, 摄影布置汪翻振。

(乙) 典仪仪式: 1. 全体肃立。2. 奏乐。3. 唱党歌。4. 向国民党旗暨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5. 主席恭读总理遗嘱。6. 主席报告学校筹备经过。7. 中央党部代表训词。8. 国民政府代表训

词。9. 军委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训词。10. 军政部长训词。11. 训练总监副监训词。12. 骑兵监训词。13. 顾问致辞。14. 来宾训词。15. 校长训词。16. 奏乐。17. 摄影。18. 礼成。

典礼上，官长们以各自立场发表讲话，摘要如下：

校长章鸿春主席报告云：骑兵学校为中华民国史以来之首创，今在此短时期内，学校即告成立者，不过是第1期筹备终结，第2期开始进行耳，以后仍须继续筹备，以臻完善，并盼各长官，各来宾多赐指导。

中央党部代表贺耀祖训词：民国成立，已数十年，练兵亦数十年，军官学校早已设立，唯骑兵学校乃为新创。今天骑校成立开学的第一日，可以说就是骑兵树立干部的第一日，许多关于骑兵的问题，都待骑校来研究解决。目前骑兵在中国为最需要，因为骑兵在战场上，长于冲击进展，世界各国战事之进展，都赖骑兵以达到其目的，我国骑兵尚未能尽量发挥其性能，希望各位教职员及学员，努力研究训练，现在敌人把我们东三省夺去，犹以为未足，最近又占领我热河，进迫不已，其野心可以想见，所以我们训练骑兵是最需要的。

国民政府代表朱文中训词：现在我们中国，要抵御外侮，必须要有实力。实力就是军事、经

济两项。军事就是人力，经济就是物力。有人力没有物力固然不行，有物力没有人力，更是不行。物力是飞机、枪械之类，有时可以购买；人力则必需训练。我们能够切实训练，把人力造成，最后的胜利必归我们。世界上有两种战争，一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战争，压迫者物力当然充足，然而结果往往被压迫者得到胜利；二是新旧两派的战争，旧派的基础完备，然而结果亦往往为新派占胜利。还有是不可贪污及怕死，国民党员都是总理信徒，一定可以做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的地步，各位学员学成之日，望本此精神，力图自强。

军委会蒋介石训词：自从欧战以后，各种火器的进步，飞机战车等项的发明，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于是骑兵之任务，大受影响，一般识见浅陋与神经过敏者，几视骑兵为不甚需要的兵种。然在实战时，依其所有之运动性与火器之威力，每能担负重大的责任，我们看看欧战中骑兵的战史，就可明白知道的。

故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国，并未见有一国把骑兵废去的，而且仍甚重视。如日本在前年九一八之役，以几天时间，占领我东北三省，最近又以几天时间占领我热河等处，除使用飞机外，就是运用骑兵的效能。故抵抗日本，

防御敌人，没有骑兵是很大的短板。中国土地，面积广大，交通不便，如无强大之骑兵，欲谋东北西北边防之巩固，实在是很难的；抵御外侮，更不必说了。各位要知道，今天骑兵学校开学，可算是准备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复兴民族的第一天。中国幅员广大，东北西北边疆辽阔，非有强大之骑兵，不足与敌相周旋。在历史上如元朝的武力征服欧亚，法国拿破仑的威力征服欧洲，且及于我亚洲，都是骑兵的功效。吾国现在机械不发达，交通不便利，更觉有强大骑兵的必要。各位学员要抵御外侮，完成革命，必须把骑兵学术精密研究，充实本身的能力，然后才可办到的。章校长以及各位教职员都是学习骑兵科，有相当学识经验的，希望上下一致努力向前做去。在此国难严重时期，要收复失地湔雪国耻，必须一心一德，大众努力，才能完成革命的使命。

军政部次长陈仪训词：国家对于骑兵，有重大的希望。

第一求学要虚心，能够虚心，各种教训，才能灌注得进。尤其是骑兵，骑兵最重要的是马匹的喂养调教等等，随时都有新的改良，不把旧观念取消，新的决不能灌注进去，旧的取消了，新的才能够灌注，日求进步。

第二是注意小动作，骑兵动作很多，对于一个士兵的动作，

先要学好，如对于士兵动作没有学好，绝不能训练士兵。故对于骑兵各种小动作，必须做好，如演习行军时，不可带马夫随从，要一官一马；实行演习完毕时，马匹仍能健壮良好，毫无损伤。如能做到如此，方不愧为骑兵军官。马匹为骑兵最重要之活兵器，马匹之能用不能用，全视乎用马者之爱惜不爱惜。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购买补充已属不易，故须特别爱护。对于马之运动、调教、喂养、刷洗，很为重要，都要亲自处理，即蹄铁一项，亦须能学到自行装钉，不假手掌工才好。精熟细小动作人员，政府极感缺少，这一点希望各学员必须注意学习，实行做到。

第三是要有研究心，骑兵操典是外国译本，中国马与外国马能力不同，我国马的持久力怎样？喂养怎样？校长及各职员务须共同研讨，以求进步，不可专信外国书籍，要能够自己改良编订。这一点，希望各位要有研究。以上虚心求学、学习小动作、有研究心三项，如能切实做到，方能不负委员长的要求和希望。

训练总监朱培德训词：今天骑兵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是国家扩张骑兵的第一天。我们希望骑兵此后定有很光荣的表现。骑兵的重要和中国现在危险的情况，委员长及各位长官，已说得

很详细，不要我再说了。我国现在是建设基础的时期，各学员在部队中，已有相当军事知识，此次来校求学，要晓得完成训练的目的，必须要建全干部，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各位同志在此求学，不可忘了军人的责任重大，我国现在的内忧与外患，同样严重的，就是有了二百万军队，没有很好的整理，也要亡国的。希望各位把学术练习好，还要把责任负起来，军人道德，至为重要，国家如此危险扰乱，都是无道德军人造成的，我们要用道德来感化他。一方面求学，一方面陶养道德，这是一种。还有军人要有纪律，现在各军队纪律太坏，以致人民对于政府对于军队多方责难，我们凡是一个军人，都要守纪律，尤其是学员，更须注重。学校负责人员，必须随时指导，不可轻忽；教官职员，亦当时时注意遵守，以为标式而资观摩。平时不养成纪律，到军队中何以训练士兵？以上各点，希望各学员切实做到。

骑兵监汪镐基训词：今天委员长及各位长官的训话，我们要时刻记好，不可以为是一种仪式。凡是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的性能，骑兵学校是专门学校，与一般的军校不同，我们应当注意骑兵之所以为骑兵。部长说，骑兵军官对于国家建设关

系甚重，凡为骑兵教官的，应当时时刻刻注意到如何教育，如何保育马匹，如何建设国家，方不辜负国家设学育才的宗旨。

纳逊顾问致词：诸位，今天骑校开学典礼，总顾问因为事忙，不克亲临参加，特派纳逊代表出席，很为抱歉！而在我个人尤为荣幸。现在华北作战情形，是不是一种运动战？是不是运动战的动作？我们在此一点，可以注意到贵国北部地形之辽阔，骑兵到处可以活动。骑兵是运动战的主要兵种，担任骑兵的军官，须时时注意，努力于运动战的原则。借此机会与各位略说说骑兵的关系，中国骑兵必须有强大的团结和娴熟的骑术，并且要精通骑兵战术。同时有一种希望，贵国今后有很好的骑兵，在战争时，始能得到很好的收获。

最后为校长章鸿春答词：各位学员，今天本校开学典礼，蒙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委员长、部长、各长官莅校训导，非常荣幸。各长官给我们的训导和使命，以及虚心求学，学习小动作，有研究心，注重道德，遵守纪律等。指示我们很好很光明的道路，希望根据这个标准，这个目的，切实努力去做，同时并代表各学员，以十二万分的诚意，谨谢各长官来宾，并祝健康。



1926年5月11日， 黄埔军校在《广州民国日报》 刊登《血花剧社紧要启事》， 宣布对血花剧社改组

□ 贾晓明

1926年5月11日，血花剧社以社长蒋介石和筹备改组委员王君强、李超、余洒渡联名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血花剧社紧要启事》，阐明剧社成立以来的成绩和改组原因，同时宣布当月18日改组大会举行，推定蒋介石续任社长，余洒渡、王君培、王慧生、俞埔、李超、关巩等人为执行委员，蒋先云、张维藩、李靖源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伍翔、廖开、赖刚、顾仲起、黄天玄5人为监察委员。血花剧社除每月演剧一次，其业务范围从演出话剧扩展到制作电影。隶属关系不变，仍由黄埔军校政治部管理。关于血花剧社发展过程的相关文章，本刊此前多有刊载，不再赘述，今特整理血花剧社轶事数则，以飨读者。

活跃在黄埔内外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学生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成立宗旨是“将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用革命艺术来实现孙中山的“唤起民众”。剧社直属于黄

埔军校政治部领导，教官萧楚女、恽代英“实际上是剧社的总顾问”。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曾亲笔书写“先烈之血，主义之花”锦旗一面，赠予血花剧社。

早期的血花剧社是以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中坚力量。剧社在李之龙、蒋先云、陈赓等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日常事务主要还是由李之龙负责，剧社演出的大多数剧目都是李之龙等人自编、自导、自演，他们经常将革命斗争的生动题材，如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军阀怎样摧残百姓和资本家怎样压迫穷人等编成活报剧演出。

血花剧社成立之初只在黄埔军校内演出，以宣传革命思想、丰富军校师生的文化生活。每逢革命纪念日或学校中举行的大规模文娱晚会，在校本部大礼堂或者在操场露天举行演出。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经常抽空亲临排练场看望剧社演职员，对工作进行指导，每当剧社创作一台新剧目，在开排前，他都亲

自审阅剧本，“提出剧本、导演和表演的具体修改意见”，甚至亲自对剧本进行润色、修改。校长蒋介石对剧社的活动也很满意，认为演出有助于扩大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

血花剧社成立一年多来，曾在“校内各纪念节日及为校外各友军，学校、民众团体演出五十多场次”，随着影响不断扩大，名声渐渐传出校外，广州市的许多集会活动也纷纷请血花剧社去助兴，经常在市南关戏院或在东校场和省议会的空地上搭棚演出。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及其后的北伐，剧社都随军做宣传工作。剧社还随东征军深入潮州、梅县一带，把演出带到潮、梅各地。1926年7月21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誓师会后，由血花剧社举行盛大演出，以鼓舞军心。

当时，黄埔军校尚未招收女生，故血花剧社在演出时，女角由男社员扮演，李之龙、陈赓、曾扩情就常常在戏剧中装扮革命的女性。其中，陈赓的演技可

谓“出神入化”。血花剧社曾演出讽刺剧《皇帝梦》，由陈赓饰演袁世凯的五姨太。登场后，陈赓“脸施粉黛，头上插花，双手捧着袁世凯的皇冠，柔声对袁世凯不必和怒斥他的章太炎计较”，“还时不时向台下挤眉弄眼，暗送秋波”，观众被逗得大笑不止。又一次，陈赓参演哑剧《还我自由》，扮演一个拆散男女自由恋爱的地主婆。登台时，他“头顶一块花毛巾，身穿一件满是大花的绸缎女罩衫，那拼命裹紧了的脚上，还分别插有一朵小花”，当演到指使家丁（由胡宗南和黄维扮演）将“女青年”拉至院子中拷打时，看得台下同学群情激愤，以致竟然有人站起高呼：“还我婚姻自由”“不许封建地主欺辱、霸占妇女”。

当时，黄埔1期生胡宗南也加入了血花剧社。胡宗南很想演主角，扮英雄人物，但由于受自身形象限制（身高不足1.6米），故在分配角色时，总是演反派，不是演北洋军官就是演土豪劣绅甚至是家丁，加上缺乏文艺才干，演出时经常忘记台词或忘记动作。有一次，他演一个北洋军官，结果在台上又忘词儿了，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同台的演员急中生智，急忙给了他一“枪”，于是他“啊”地叫了一声，就倒下了。此后，胡宗南就去学编剧，像其他演员一样自己编写

剧本。他写了不少剧本，但一个也没能通过。于是，胡宗南借周恩来来到剧社指导工作之际，请周恩来提出指导意见。周恩来认真看了一下剧本，先对胡宗南的认真和书法表示赞赏，然后告诉胡宗南：“在革命的年代，我们还是需要用革命的口号来鼓舞士气的；但作为文明戏，就必须有艺术成分。要让大家看下去才行。”并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

李之龙曾带着剧社去广东省女子师范学校演出，获得一致好评，据说还由此引发了“女子投考军校的风波”。当时，女师的一些同学想进黄埔军校学习，做革命的女军人，为此曾多次上书军校领导，但都未得到答复。于是她们在演出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李之龙。李之龙便把这件事向本校苏联女顾问尼罗夫夫人反映，还在军校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吁军校招收女生。

借“调和”说“效忠”

黄埔军校里，由于“在政治信仰方面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逐渐演变成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师生和国民党右派师生的矛盾和分歧。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经常攻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时制造事端，为此双方曾有过多次打斗。在血花剧社，同样呈现出激烈交锋。就以“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这副对联的含

义来说，双方各有各的解释，左派师生解释为“新三民主义之花，是由新三民主义的血灌溉出来的”，而右派则笼统地解释为“孙文主义之花”，对“血”这个字，右派分子解释为“赤”，由此将“血花”解释为“赤化”。孙文主义学会曾要求血花剧社改变演出内容。在一次演出中，血花剧社演员正在台上上演地主豪绅虐待打长工的剧情，突然台下一阵骚动，原来是贺衷寒带着几个孙文学会成员冲上台来，说这是丑化他地主父母的形象，并称自己父母“对长工很好，没有这么虐待的，搞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要剥夺他们的劳动果实”。此后，孙文学会成员又派杨引之等人抢夺“血花剧社”的领导权，因血花剧社成员据理力争未能得逞。

孙文主义学会还成立了青白剧社（有人称为“白花剧社”），社主任是倪弼。青白剧社成员包括军校师生，主要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林振雄、吴铁城等人。青白剧社往往在血花剧社演出时，也在附近表演京剧、话剧、杂耍。

当时，血花剧社属于校长蒋介石“直接领导”，逢年过节，蒋介石都会将剧社成员邀请到他家中聚餐，以示关怀。

第二次东征出发前，血花剧社和青白剧社联合在北校场对出征官兵搞了一场慰问演出，双方

节目穿插进行。这是蒋介石硬性安排的。有研究者指出，此次演出是“两个剧社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联合演出”。

演出结束后，蒋介石照例邀请演员到家中聚会，意在“调和两派学生之间的矛盾”，两个剧社的领导成员均参加。在校长的调和之下，两派学生均表示：“愿意在校长领导之下，团结合作。”蒋介石听了十分高兴。聚餐结束后，蒋介石对同学们提出，自己的房间中放着“三件宝”，如果谁能最先找到，“本校长给予特别奖励”，并叮嘱大家，“内室也可以进”。

两社成员得到允许，便找了起来。

蒋先云走到蒋介石的办公桌前，见桌上有孙中山的三封信，是孙中山去北京后写给蒋介石的，认为三封信是蒋介石的“三件宝”，于是拿起三封信去见蒋介石，但蒋介石予以否认。

陈赓拉开蒋介石办公桌的抽屉，发现三支镀银小手枪。陈赓知道这三支小手枪是苏联送给黄埔军校第一批枪械中的一部分，非常有纪念意义，有一次军械库里这种手枪有一支找不到了，蒋介石曾大发雷霆，严令找回。于是陈赓用手指着手枪喊道：“宝贝在此。”但蒋介石立刻予以否认。

贺衷寒看到房间墙壁上挂

着几张照片：一张是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合影，另一张是蒋介石和母亲的合影，最后一张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合影，于是宣布自己“找到了”。但蒋介石仍然否认。

大家经过冥思苦想，有人认为“三宝”是蒋介石爱穿的黑大氅、精武带和佩剑；有的拿来纸、笔、砚台；有的拿来了放在厨房的几样宁波土特产；有的拿来放在窗台上的兰草花木……结果也都被蒋介石一一否定了。

李之龙走到蒋介石的内室，把枕头翻开，发现下面藏有三本书：《俾斯麦传》《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其中，《曾、胡治兵语录》是蒋介石亲自从曾国藩、胡林翼关于治兵、修身的著述中，精心摘录编撰的。他立即把三本书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一见，笑着说：“我希望同学们熟读这三本书，这是军人之宝，尤其是《曾、胡治兵语录》一书，更要认真阅读。”但陈赓却问：“校长，曾国藩不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吗？”蒋介石回答说：“他的功过是非，尽可由后人去评说，我们是军人，我现在只要你们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去学习古人治军带兵的要旨。”

蒋介石高兴地对李之龙说：“你很聪明，我一定好好奖励你。”

后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教材，被印刷了数千册，发给

黄埔同学每人一册，并在大操场举行了发行仪式。在发行仪式上，何应钦特别强调：“做军人的第一要义是忠诚、服从……在目前，就是无条件地服从蒋校长，听从蒋校长的指挥。”对此，邓演达曾说：“蒋介石企图使黄埔军校的师生，像湘军忠于曾国藩那样，永远效忠于他。”

从“剧社”到“世界”

1926年3月，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中被蒋介石逮捕关押，在狱中创作了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国魂兮归来》，反映鸦片战争的《此恨何时灭》等剧本。血花剧社也被蒋介石改组。

北伐开始后，血花剧社除一部分社员留在广州，组织“血花剧社黄埔分社”外，大部分人员随军出发，负责对前方将士和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蒋介石在邓演达和张治中的劝说下释放了李之龙，安排他到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兼任新改组的血花剧社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李之龙和血花剧社沿途排练，登台聚众表演，又新招了一批素质较高的演员。北伐军夺取武汉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决定接收汉口新市场，定名为中央人民俱乐部（血花世界），成为血花剧社在武汉的固定表演场所。李之龙也随之被任命为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在这里领导血花剧社频繁

进行革命剧演出活动，先后公演了《国魂兮归来》《此恨何时灭》《二七惨案》《革命军来了》《三个商会会长》《工厂主》《夜未央》《弃妇》等众多剧目，受到各界好评。在准备上演《中山先生伦敦蒙难记》一剧时，为了寻找合适扮演孙中山的演员，李之龙登报重金求贤。结果上演日期临近还无人应征，他只好亲自上阵。不料演出效果非常好。该剧讲的是，孙中山旅居期间，面对当地政府的绑架和引渡，孙中山根据国际公法不引渡政治犯的规定，据理力争，最终转危为安。该剧剧情跌宕起伏，生动地刻画出中山先生面对着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时所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深得观众喜爱。当李之龙扮演的“中山先生”脱险、出场谢幕时，观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血花剧社成员还将血花世界布置一新，使血花世界成为武汉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在当时的血花世界大门口、舞台上悬挂马克思和孙中山等人的大幅画像以及“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等革命标语，墙上贴满了有关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多种图表；雍和厅改为总理孙先生纪念堂，成为武汉革命政府要员讲演的地方，宋庆龄、邓演达以及共产党员吴玉章、李立三、刘少奇、董必武、苏兆征等人都曾多次在这里开会或发表演说。血花剧社除

了专业演出活动外，经常有群众性的宣传演出。有政治宣传，有与人民同乐的联欢，有慰问士兵的演出以及援助工人罢工、救济灾民、支援北伐、筹办公益事业的募捐演出等。

在北伐军克复南昌之初，蒋介石就想“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作为他政治独裁的工具”。当时在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均坚决反对，认为武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中央政府应该留在武汉，继续执行北伐大计。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从南昌来到武汉，和徐谦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会晤。其间，街上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并有“反蒋示威运动”发生，使蒋介石感到“此间形势不可久留”，但蒋介石还是抽空前往血花世界，召集了武汉黄埔军校数百名学生代表训话，以求得黄埔军校师生的支持。训话当天，蒋介石全身戎装，缓缓走向讲桌，举目扫视，静立片刻，随即把脚一顿，大声说：“我究竟是逃跑吗？还是自杀呢？”此话一出，让全体听众惊讶不已。蒋停顿片刻又说：“万万想不到，我在前方率领将士浴血奋战，而后方出现种种谣言中伤我。我是校长，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很伤心。作为老师、校长对待学生跟父母爱护子女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有个老兄，他年轻时不成才，我母亲

把我们两兄弟喊在一起，干脆分了家，声称分了家后再不管我哥哥了，但是却常常喊我偷偷地去看我哥哥嫂嫂，看他们有没有饭吃。以后，我留学日本回来后，老婆告诉我说：‘你留学走后，母亲一端起饭碗就念你，时常流泪。’可见当父母的人，不管儿子成不成才都是一样爱护的。可惜，一些学生丝毫不尊敬爱护自己师长，真使我感到痛心疾首。”训话结束后，蒋介石还应血花剧社之请，题写了“血花世界”的匾额。

时隔不久，在血花世界举办的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大会上，发生了黄埔军校学生间的冲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州的血花剧社结束”。7月间，随着汪精卫集团叛变，武汉的血花剧社也随之“落下了帷幕”。

虽然如此，但血花剧社和它所创造的艺术形式，在民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抗战期间，各地纷纷成立剧社、剧团，其中很多直接以“血花”命名，沿用血花剧社开创的艺术形式开展“救亡图存、积极抗日”宣传教育。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迁到成都后，“军校血花剧团”积极与活跃在当地的剧团、宣传队合作，创作并演出了《军民合作》《民族公敌》《胜利号》等作品，对鼓舞士气、发动群众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中山书法艺术探析

□ 李务起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常年忙于革命事业和政治事务，实际上参与的文学艺术类活动并不多，在文艺方面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他文艺天赋极高，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和把握，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和赏析，都独具慧眼。其文章、诗词、楹联和书法均达到很高水准，尤其在书法艺术方面，有大量流传于世的墨迹，一直被后世所推崇。

文艺思想和书法艺术经历

作为一位深具传播意识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敏锐地认识到文化艺术对于发动、鼓舞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早在1899年，他就派人赴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机关报，同时兼出《中国旬报》，其中即有专载文艺作品的《鼓吹录》。1905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样重视以文艺作品来宣传和鼓吹革命。1908年，广东粤剧界组织“振天声”剧社到新加坡演唱粤剧，积极为革命义演募捐，激发华侨爱国思想，

时在新加坡的孙中山得知后极为高兴，认为戏曲是启蒙民众、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特地在“晚晴园”接见并鼓励剧社成员，还写信给缅甸仰光同盟会负责人，介绍粤剧在新演出盛况。1911年，上海戏曲界排演《新茶花》等新戏为革命募捐，并直接参加上海反清起义，孙中山亲笔题词“急公好义”“热心劝导”“警世钟”，高度赞赏上海戏曲界编演新剧、激发国民的义举。

孙中山早在幼年求学时期，即开始接触和研习书法艺术。1875年，幼年孙中山在广东家乡入村塾读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据说他在私塾中曾学习颜体字帖，经历严格的描红习字训练。1879年，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受长兄孙眉资助，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式教育。虽受西学，但他很重视中华文化，常到辅导华侨子弟的夜校修习中文。他认为，汉字记载、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艺术形式，故而临池不辍。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期间，他跟随道济会堂长区凤樾补习国

文，在中华传统文化和书法等方面，都受到较深影响，并创作出楷书对联“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和草书《后出师表》等书作，令师生们赞叹不已。《后出师表》书作后被潮州华夏历史博物馆收藏。

存世书作及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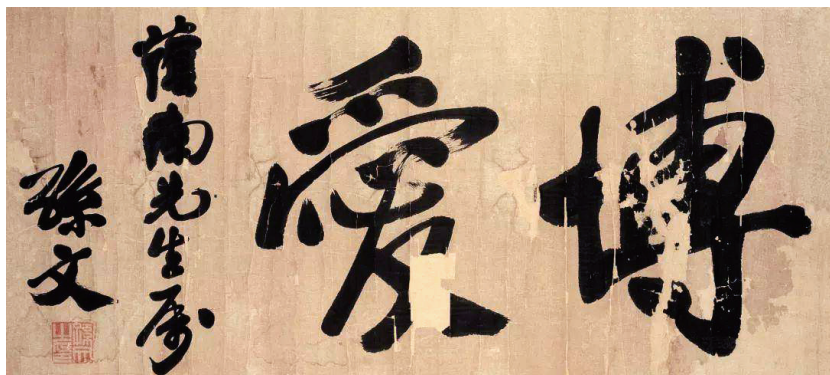
因投身革命事业，中山先生对于艺文之事似应无暇旁及，但他在作文、诗词、韵文、楹联等方面，均有超凡的见解和表现，对中国古典文学、诗学，均有精当的理解，显示出极高的文学鉴赏能力。他虽没有多少时间去专门习帖、练习书法，但其一生可谓是“上马杀贼，提笔赋诗”，手书了大量书信、电报、文稿、手令、手札、委任状和题字题词以及著述手稿等，不仅留下珍贵的革命史料，也是难得的墨宝。

中山先生的书法作品，按照内容和形式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书赠友人或专门题字的楷书、榜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字数较少、独立成篇，字形较大、章法简明，辟窠巨构、气势

恢宏，显示出其胸襟开阔、雄心远大、沉毅豪迈的精神风貌。其二，公文书信手札。这一类多是案头小牍，字体介于行楷之间，字数较多、篇幅较长，字迹流美清秀、章法俨然、韵味绵长，字里行间显现出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两类书作均体现了其书法艺术风格：笔画宽博厚重、开阔雄浑，笔力雄劲、力含字中；结体取法颜鲁公，中宫宽绰，四周紧密，寓巧于拙，朴实无华；用笔北碑体貌、方圆并重，自在从容、浑然天成，简净平和、刚柔相济；笔势舒敛有致、收放自然，劲健俊朗、坦荡磊落；整体气象正大浑穆、冲和渊雅，大璞不雕、美感独特、自成一家，既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溢其间，又示人以亲和温润、韵味绵长。

从字体角度来看，中山先生书作主要有楷书和行书两种。他虽在早期曾创作过略微稚嫩、具有草书雏形的书作《后出师表》等，但在此后之革命历程中，多以楷、行两体挥毫，其书法以正楷居多，较少见有篆书、隶书及草书等书体。《孙文学说》手稿及许多榜书和对联作品，皆以楷体、行体面世。

中山先生擅书楷、行两体，与其日常书写习惯有关。在长期从事国民革命过程中，他有一特别习惯，即在书写手令、信函



/ 孙中山题赠邓荫南“博爱”横幅。(作品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孙中山书赠杨寿彭“天下为公”横幅(1913年)。

时，为求节省时间，往往不用石砚磨墨，直接用毛笔沾墨水书写，取其便利而省去磨墨工夫。但他在题词赠送同志、鼓励仁人志士革命斗志时，使用的是毛笔、砚台、墨条和宣纸，以示严谨、正规和郑重。

中山先生最具有书法创作意味的书作，是为友人及社会各界名流的题词。作为一位终生以革命为己任的政治家，与一般墨客书家不同，他往往将其政治主张蕴含于题词中，以寄托伟大情怀、显现思想倾向。中山先生喜题词并赠书于人，意即在于使其思想和理念得以传播，同时兼具鼓动勉励之意。

中山先生平生最爱书“博爱”及“天下为公”，二者都凝集

了他高远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天下为公”四字，是他政治理想的中心所在，是他立志为中华民族谋福祉、为人类做贡献的心声，所以他对此四字情有独钟。中山先生不同时期、为不同人所书之“天下为公”，用笔凝练，从容豪迈，气势磅礴，渗透着一种正大、沉毅、豪迈的阳刚气质和恢宏独特的美感。孙中山常书写“博爱”二字，他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一脉相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而对此二字倍加钟爱，将其贯穿于革命生涯始终，常书赠国际友人、爱国华侨或革命志士等，以使他的博爱精神广泛流传并以此勉励同志。早期蒋介石深得孙中山的厚爱和倚

重，他们之间有很多电报、信件往来，孙中山也曾多次以书作赠送，或应蒋之请求而书，其中即含有“天下为公”“博爱”等内容。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来说，获赠中山先生书作是极大的鼓励。

书法艺术特点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的实践者，其书法与其特殊政治地位和伟大理想自成一體。他的书法作品典雅精妙、别具一格，彰显功力、富有个性，从中可看到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博爱的胸襟。他的书法不是纯粹的写字，而是表达一种情怀、情操，从中可以看出其当机立断和敢做敢为的性格，加之其以文字书法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工具，所书内容体现着爱国主义思想，作品中显现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很有感染力。

中山先生写字十分认真，用字规范，笔笔交代清楚，一篇中同一字出现多次，也绝不删繁从简，而以一字数型来显其博。辛亥元老、时任《民国日报》社长邵元冲曾在《总理学记》中评价中山先生书法“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显示了中山先生为人光明正大、严谨不苟、刚强不屈的气质。

从中山先生所存大量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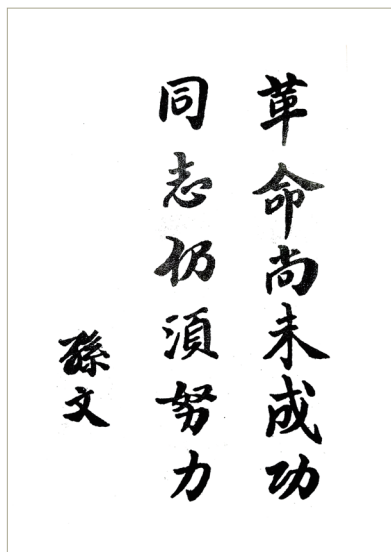
墨迹中可以窥见他对中国古代传统书法的继承与发展，但其书法又不拘泥于古人而自成风格。他曾在《孙文学说》中提及“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此也是其对书法理念的概括。曾任中山先生机要秘书的李仙根，就中山先生书法有诗云：“我信聪明自天亶，何曾总理学乌云。”意即中山先生书法似苏东坡，但不是学苏东坡的《天际乌云帖》，而是自发自创的。中山先生的字融会颜体和苏体等诸家，但却自成一體，风格舒展大方，气息醇厚自然，笔画圆融厚实，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著名书画史论家、书画鉴赏家单国强，在《书画鉴赏与收藏》一书中曾对孙中山的书法进行评价：“他的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不仅仅有博大豪迈、气势恢宏的榜书作品，也有儒雅、轻松、格调清新、韵味绵长的行书作品。从字法看，颜字特征仍依稀可见，但已作为一种风格转换到作品中，融化成一种精神或者说是境界。而魏碑的雄强也在作品中被淡化，在潜移默化中服从于行书作品的整体风格。从作品的风格看，儒雅风流，清新自然，更透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审美意蕴。孙中山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大家风范，这从他大量的题字和墨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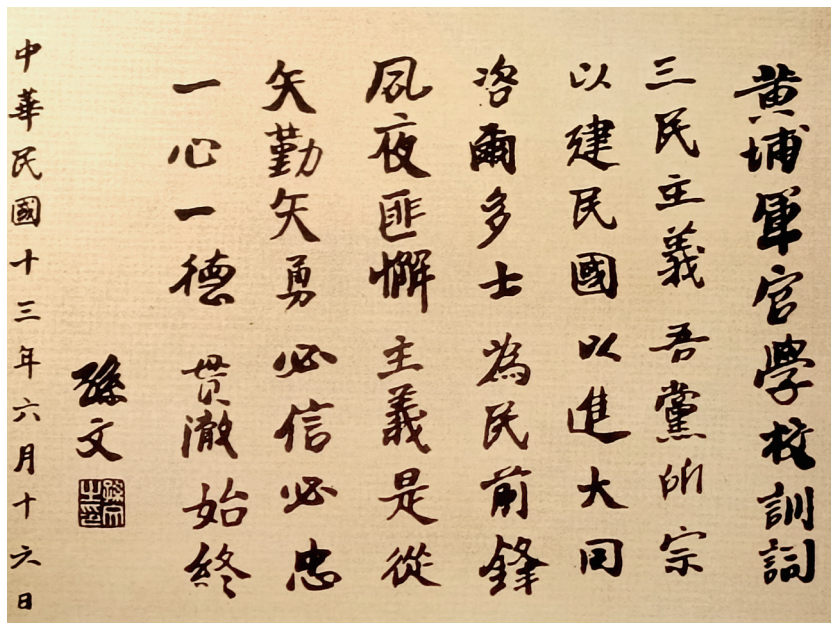
/ 孙中山题赠马湘“共和”中堂。

不是练出来的，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的，‘字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孙中山书法风格一脉相承，无论是案头小牍或挥椽巨构，多随意挥洒，气足神完，所书皆开阔雄浑，朗健清逸，笔势舒敛有致，字字独立却气脉浑整，在显现一定造诣的同时，也体现出有着不同寻常的品格和韵味。谭延闿是民国时期的书法大家，长期追随中山先生，他曾评说孙中山书法道：“故时贤谓总理之怪，深得唐人气韵，流美自然，非力学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诡不随，又适如其人焉。”又说：“其书不但似苏东坡，而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资聪明，凡夫须学而不能也。”谭之所述所评相当透彻和深刻，也成为评论孙中山书



/ 孙中山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黄埔军校史稿》)



/ 孙中山题黄埔军官学校训词。(乔育新摄于辛亥革命纪念馆)

法较为经典的论述。

书法艺术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精神

孙中山的书法墨迹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记录了民主革命历程，透过字迹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大道。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了黄埔军校。在与黄埔军校相关的题词或书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胸怀、气魄、眼光、学养以及政治思想、革命精神、斗争精神。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孙中山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宣布了“亲爱精诚”校训，并亲笔题写《黄埔军官学

校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他真心希望黄埔军校同学所学的武艺，能与革命的主义相结合，产生出矢勤矢勇的革命队伍，去横扫军阀、列强，使中国早日进入共和大同之境。此训词后来成为国民党党歌及第一首黄埔军校校歌的歌词。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政治和军事人才，在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孙中山亲题的军校训词也在黄埔军校历史上熠熠生辉。

孙中山先生的书作，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呈现，还是心理情

感的载体，更融入了他的智趣和灵性，有特有的精神气象和人文情怀，是其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特有的文化底蕴、文化思想的具体呈现。他的书法作品不仅有书法艺术本身的魅力，更可从其中看到其振兴中华的理想、不屈不挠的品质、坚毅卓绝的精神和天下为公的伟大品格，也能感受到其中闪耀着的炽热的爱国主义光芒和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孙中山先生毕生矢志不渝追求国家统一，以其书法艺术为载体呈现出来的爱国思想和革命信念，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凝聚全球华侨华人力量，推动祖国完全统一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十三)

□ 熊子杰

第十三章

湘军在淡水大败法军(淡水大捷)

1884年中法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在一片悲观主义弥漫下，迎来的一场难得的振奋人心的漂亮仗，无疑让当时已经被打得抬不起头的中国人对国家又燃起了希望。但不知是清政府地多钱多，还是“有钱就是任性”，明明打胜仗，也照样赔款。

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军先盛后衰，清军先衰后盛。尤其清军在淡水（古称沪尾）之役，湘军提督孙开华（湖南张家界人）重挫法军，老将冯子材（广西钦州人）浴血夺回谅山，清军士气大振，而法军信心尽失，法国民众极为愤怒，走上街头向法国政府抗议，法国国会因此搁置援军预算，迫使法总理茹力费理下台。

中法战争决赛下半场：淡水之役

法军这一次攻击行动，原本是胸有成竹的。法军司令孤拔事先用钱买通英籍领港人，取得他所提供的情报，已清楚掌

握淡水清军的防御布局，手中还握有清军淡水驻防图，对淡水清军的炮台、水雷等数量、布置和点火哨等都了如指掌，所以认为此役轻而易举就能攻下淡水。

淡水清军防卫部署由湘军提督孙开华负责。孙提督的兵力共约2000人，部署如下：孙开华率领三营（湘军）守南，刘朝佑四营（淮军）守中，张李成一营（台勇）守北。孙提督的部队是以湘军（即淡水居民俗称的“湖南勇”）为主体的擢胜右营、中营、后营。

9月30日，孤拔先派副司令列士皮率领3艘战舰前往淡水。

10月2日，清军先发制人，主动炮击停在外海的法舰，法舰德斯丹号受创，但损伤不严重。3艘法舰立即反击，猛烈炮击清军在淡水仅有的两座炮台。双方炮战一日，清军仅有的两座炮台皆被击毁，双方士兵并无重大伤亡。列士皮准备进行登陆战，向孤拔请调600名士兵支援淡水，主力军还是攻打基隆。

10月2日，从基隆撤守的



/ 法军将领孤拔。

章高元、苏得胜等率数百名淮军加入防卫淡水之战，章高元与刘朝佑共守中路。

当时，淡水鼻仔头的宝顺洋行老板英国茶商陶德（John Dodd）如此记述此场战事：“孙将军在整个炮击中都与他的部属在一起。当炮弹时而从他的头上嗖嗖掠过，他仍坐在树下享受丰盛的午餐。孙将军颇中意法国口味，尤其偏好香槟酒。”（《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战争台湾外记》陈政三译。）陶德号称“台湾乌龙茶之父”，他留下宝贵的日记，译名《北台封锁记》（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翔实记述了当时淡水之役、湘淮斗争、台湾官场、



/ 淡水之役法军登陆点,美丽的沙仑海水浴场。



林投树(叶子带刺)。



/ 黄槿树(枝干多且密)。

台湾茶叶产业、少数民族等，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淡水海关税务使法来格(E.Farrago)，也称誉孙开华将军带兵如神：“其兵久经训练，钱粮按月支领无亏，士饱马腾，且皆爱戴孙镇。”

淡水油车口村民则传说，孙开华提督的部队，几时开饭、几时出任务，甚至几时吃鸦片皆有纪律规定。

淡水之役的过程还可参考法军小水手尚(Jean L.)的日记(《孤拔元帅的小水手》郑顺德译)及相关史料。从这位当时参与

此次战事的小水手的角度来看淡水之役，更能看清楚当时法军的战略、战术，以及最后败阵的原因。

10月3日，章高元率四营从基隆移防至淡水，但战事尚未爆发。

10月4日，法军军舰全面炮轰淡水，共发射了将近2000枚炮弹，但仅造成10多名清军受伤。

10月5日，法国增援军到达淡水。法军原本计划以军舰长驱直入台北，但因为淡水河口已被孙开华派人以石块填



/ 淡水沙仑丛林(淡水之役清军就埋伏在此)。

港，并被布满的水雷封锁，无法得逞的法军只得先派遣陆战队及水雷兵登陆，企图攻下淡水炮台取得制高点，再掩护水雷兵清除河口水雷及障碍，以便军舰驶入淡水河。因此决定10月6日登陆淡水沙仑，但因天候不佳而延期。

10月8日清晨，法国舰队共7艘军舰排列成攻击队形，在淡水沙仑外海准备抢滩登陆。

8点左右，法军开始登陆行动。此次攻坚由雷诺堡号(Chatreu-Renaud)的舰长波林奴(Boulineau)担任指挥官。法军共600名官兵，各携带一日口粮、16包弹药和预备弹夹，在舰炮掩护下向前推进，准备抢滩登陆。

8点45分，600名法军官兵登上十几艘小艇，向淡水沙仑岸边推进。

9点30分，小艇抵达淡水沙仑海滩，法军官兵陆续登岸，指挥官波林奴召集整理队伍，准备进攻目标淡水油车口炮台。

9点55分，指挥官波林奴命令队伍向淡水油车口炮台推进，在沿海船舰炮火的掩护下，法军顺利进入淡水内陆，一路没有遇到阻挡。

法国官兵逐渐发现有异：从沙仑海滩登陆后，法军从沙滩到陆地已向前推进好长的一段距离，却不见岸上有任何清兵，岸边是静悄悄的，陆上也是静悄悄的，寂静得让人不解。清军躲到哪儿去了？骄傲的法军以为清军都被吓跑了。法军也太自信了，正所谓骄兵必败，这就是此役法军大败的主因之一。其实，孙开华让所有守军隐身岸边的防风墙密林里严阵以待，准备对进入丛林的法军来个瓮中捉鳖。淡水外海法军舰炮火虽然一直不断，十分猛烈，但未能破坏孙开华设计的防御计划，大批清军躲在防风墙密林中等待歼灭法军。

沙仑海边沿岸一带长满了林投树（又称金针，一种叶缘带刺的植物）及黄槿树（叶形像木耳，枝干多且密）。这两种滨海的原生植物是防风护岸的最佳树种，茂盛的树林成为清军的天然屏障。法军登陆攻打淡水势必要经过密林，孙开华的策略是利用茂密的林投树与黄槿树作掩护，法军一旦进入，长枪施展不开，加上敌明我暗，法军入林后各小队间无法联系、无法调度指

挥，如此必能各个击破，歼灭法军于丛林。

法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军跋涉，见到一片林投树及黄槿树的密林阻挡前进的路线，不免有点犹豫，但骄傲自大的法军并未多做迟疑，准备迈开大步勇往直前，像小水手这种较胆小的士兵，心中不免暗自担心，祷告法军舰的炮火能有效地驱除所有清军，希望密林里没有任何埋伏，并加快前进步伐，希望能赶快通过这片令人不安的密林。

当时，孙开华将军命令龚占埋伏于假港口；李定明埋伏于油车口；章高元埋伏于八台山后；张李成率台勇埋伏于北路。

孙开华获悉法军进入密林，立即命令清军出击，亲自指挥擢胜中营、后营的湘勇正面阻击密林里的法军。

10点10分，法军开枪还击，一场密林里的激战展开。

10点25分，孙开华率擢胜后营湘勇，从新炮台前方土堤斜坡直冲而下，正面攻击法军。但遭到法军的扫射，伤亡惨重，首当其冲的80名擢胜后营湘勇死伤多达70人。

此时，章高元率淮军从北八台山出击迎敌，与擢胜后营的湘勇连成一条战线，清军的联合攻击已打乱法军队伍。

此时埋伏于油车口的营官

李定明率领擢胜中营的湘勇，自炮台方向冲出，直接攻击密林里法军的右翼。

面对一波又一波不断冲来的清军，法军只能拼命向四面八方开枪射击，双方枪战愈来愈激烈。法军指挥官波林奴认为法军射击过密，想要法军停止射击，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因为枪战已进入了疯狂状态，清军就在他们四周，只要一停止射击就会没命。

法军攻势已完全被阻断，又消耗大量的弹药，战况对法军已相当不利。此时，埋伏在假港口的龚占率500名清兵，从高处丘陵冲下来，法军已陷入被清军前后夹击的困境中。

双方激战超过一个小时，法军所备弹药即将消耗殆尽，伤兵的数目迅速增加。第一中队、第二中队及第三中队的指挥官，全都因负伤而退出战斗。法军已乱了方寸，因无法联系而陷入极度恐慌，逐渐失去斗志。

11点30分，法军指挥官下令尽速撤出密林，向原登陆沙滩撤退。法军一边撤退，一边还要担心后有追兵，不断回头开枪阻挡清兵的追击。清兵一面追击，一面在密林中搜索尚未逃脱的法军，并立即将其格杀，取其首级换取犒赏（后因洋人抗议，孙开华下令禁止）。取得优势的清军士气大振，一路乘胜

追击，并逐步缩小包抄范围。

12点30分，法军小艇载上第一批撤退的法军，才刚离开淡水海边，清军就已追到淡水沙滩附近，此时法国铁甲炮艇蝮蛇号（Vipere）开炮阻挡清军的追击，否则登陆的法军可能全军被歼灭在淡水沙滩。在法舰炮火的掩护下，大部分法军登上小艇撤离淡水海滩。

下午1点30分，所有法军残余官兵都撤回到军舰上，一天的激战结束，短短的淡水之役就此落幕。

这场战事，双方死伤惨重，法军阵亡17人、负伤49人；清军阵亡约80人、负伤200多人。清军此役能取胜，归功于提督孙开华战术的成功。孙开华应战沉着稳健，身先士卒带动清军士气，是此役战胜的关键，功不可没。

法军经过此役挫败，已无意再战淡水，退守基隆外海，主攻基隆，此后也未曾再犯淡水。而中法战争的双方，也因淡水一役情势逆转，清政府态度转趋强硬，法国政府及民众却开始犹豫，质疑是否应再战下去。在整个中法战争中，淡水之役是极具关键性的胜利。

孤拔设宴劝降刘璈

法军自从1884年8月5日进攻台湾基隆，遭遇湘军曹志

忠所部顽强抵抗，基隆防线久攻不下。试图绕道淡水，又遭孙开华痛击。屡屡碰壁，一直无法突破台湾北部。孤拔将舰队驶向台湾南部安平港外，去面对他最不想面对的对手兵备道刘璈，看看是否能有机可乘。孤拔久闻刘璈治军严谨，又是常胜将军，士兵各个骁勇善战，孤拔此次想试探刘璈虚实，甚至想设宴说服刘璈不战而降。刘璈是左宗棠的嫡系，也是位大鹰派，岂会不战而降，即使战输战死都不会降。孤拔非但未如所愿，还被刘璈痛斥一番，最后落荒而逃！

连横在《台湾通史·刘璈传》中对这一段历史有详细记载，有关孤拔宴请刘璈的原文是：

光绪十一年二月二日，孤拔泊安平，介英领事请兵备道会见。璈欲往，左右谏曰：“法人狡，往将不利。”璈曰：“不往，谓我怯也。咄！乃公岂畏死哉！”至安平，戒尔台守将曰：“有警，即开尔击，勿以余在不中也。”孤拔相见甚欢，置酒飧，语及军事。璈曰：“今日之见，为友谊也；请毋及其他。”孤拔曰：“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璈曰：“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孤拔默然。尽醉而归。法舰亦去，而台南得以无害。（《台湾通史》下册，连

横，商务印书馆，2017。）

当1884年刘铭传抵达台湾后，即详细了解防卫部署，决定与刘璈分工，由刘铭传负责固守台湾北部，刘璈则负责南部防御。

中法战争初期，法军舰队在台湾北部踢到铁板，久攻不下台湾北部的基隆、淡水。法军司令孤拔想转往台湾南部试试手气，于是在1885年3月将舰队驶向台南，停泊在安平港外，并透过英国领事邀请当时驻守台南的兵备道刘璈上船会谈，其真实目的是想探探刘璈部队虚实，也意图劝降刘璈。

刘璈接到邀请后，所有的部属都怕是场“鸿门宴”，劝说：“洋人诡计多端，必有诈，不可去。”担心此宴凶多吉少，刘璈有去无回。然而刘璈毫不畏惧：“不去，法军会以为我惧怕，老夫岂是贪生怕死之人吗？”最后刘璈不顾部属的劝阻，只身前往安平港，并吩咐炮台守将：“如发现任何异状，立即开炮，绝不可因为我在船上，而迟疑开炮。”

刘璈上船后，孤拔原本以为刘璈不敢来，没想到刘璈竟如此爽快赴约，而且是只身前来，就高兴地招呼刘璈，热情设宴款待刘璈并套交情。席间也试图论及军事，刘璈立即制止，

表示此番前来仅是表达对彼此的尊重，两国正处交战之中，宴席上不得谈论军事及战役相关问题，孤拔见状便开门见山地劝说刘璈投降：“台南城池如此之小，你们兵力又弱，贵军如何能抵抗我强大法军呢？”

刘璈对于孤拔的言语嗤之以鼻，非但不从，还不卑不亢地说：“你说得没错！你们法军虽强，而我们的城墙也可能只是一堆土而已，兵可能像纸一样弱，但是我们保卫国家及人民的心却像钢铁一般强硬。”孤拔听了这番话，无言以对，心知是降不了这铁汉刘璈，原本的劝降宴也只好变成纯吃饭喝酒聊天宴，宴毕还亲送刘璈下船。

法军在淡水登陆失败，加上3月29日66岁老将冯子材痛击法将赫本哲（Herbinger）夺回谅山（史称谅山大捷），法国舆论哗然。法国国会否决军费预算追加案，总理茹力费理被迫辞职下台。法国无钱打仗，而中方担心北方朝鲜动乱及日本对朝鲜虎视眈眈。6月9日，在中法双方都无力无心恋战的情况下，中法签订了《中法新约》，双方正式停战。

6月11日，孤拔因患传染病，死于澎湖马公。另一说是他无颜面对国人而服毒自杀。

6月21日，法军撤离基隆。

7月22日，法军全部撤出

澎湖。

抗法将领反遭迫害

法国事后承认中法战役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败战”，并将战败原因归为清军取得了先进的武器，以及其他列强私下的资助。此役法军死亡约五六百人，同葬在基隆法军墓园，在澎湖还有一座孤拔（衣冠）墓。

可笑的是，此战役打了一年多，从境外的越南打到福建、台湾、澎湖，双方各有牺牲，法军死了六七百人（四五百人是病死的），清军也大概是此数（基隆约400人、淡水约200人），结果中法两国折腾一年多，最后还是回到原点。正如“中研院”学者许文堂所述：“北黎观音桥事件使中法两国徒劳虚耗一年，浪费两国无数人命、资源之后，又回到李福天津简约，万民膏血为李鸿章为朝廷所征‘帝仪戴’而已。”（许文堂《清法战争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学、史实及集体记忆》）清政府明明胜券在握，竟然最后还是割地赔款，怎么对得住为抵抗法国侵略而牺牲的将士，早知如此又何必打呢，直接赔款不就完了。

当时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

左宗棠不理解，笔者也不理解，相信所有中国人都理

解，明明法国打输了来求和，为何《中法新约》内容要确认《法安第二次顺化条约》，其中否定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也就是胜的中国还要让出越南给法国当殖民地，还要清军撤出越南，从此越南脱离中国，成为法国属地，真是丧权辱国。人民可体谅朝鲜有危机，可议和，但不能出卖祖宗的家业啊！

事后，李鸿章为报复左宗棠的批评及湘淮宿怨，在左宗棠仙逝后立即要刘铭传、潘鼎新等攻讦湘军将领刘璈、孙开华等，许多湘军将领也受到牵连，被降职、革职、抄家，甚至差点丧命。刘铭传还多次向刑部施压及关说，一定要将刘璈抄家、判死刑，由于许多重臣看不下去，出面为刘璈求情，对刘铭传提出批评，最后刘璈才未被斩首。这些先人保卫台湾还遭到迫害，真令人不胜唏嘘。如果没有刘璈等前置的防御准备及练兵，曹志忠、王诗正、林朝栋等将士的誓死抵抗，以及孙开华、章高元等智取法军，我等早已成亡国奴。所幸天佑中华，两岸同胞更应以此为鉴，不团结岂有家园。希望能在台湾为这些为抵抗侵略而牺牲的清军官兵建造一座纪念馆，以表彰他们的英勇，以慰忠烈英灵。

黄埔